中華遺産

2008.4

古地图

中国的印迹

大连：[illegible]

北大图书馆：存史之籍





地图如画 画如地图

撰文/黄秀芳

几年前，结识了一位研究古地图的朋友，她但凡给我介绍古地图时，先要强调一句："古地图很美观，但不精确。"言下之意大概是：你就把它们当画来看，不要太当真。

确实，人们对地图最普遍的要求就是客观真实，地图的精确度越高，对地物的反应就越接近客观真实，也就越便于人们按图索骥。而古地图在表现地物之间的距离、高差以及方位时，有时不甚讲究。大多数绘图者采用的是平面与立面相结合的形象表示法，而非现代的地图投影和经纬度法，其结果是中国传统地图就像是图画地图，地图如画，画如地图。有史实为证：在唐代，地图被认作是画的一种，唐张彦远编著的《历代名画记》，就将东汉张衡与西晋裴秀绘制的地图收录其中。

不过，像画的地图就不好吗？地图的功能只是表达地形、地貌、地物吗？如果我们能宽容一点，接受地图还有其他功效，换个角度，如山水画般的古地图，就趣味盎然了。比如，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3幅绘在帛上的地图。这3幅图分别是地形图、城邑图和驻军图。驻军图所包括的范围是汉代长沙国南部营浦县、龁道县（今湖南省道县、蓝山县一带）一部分，以及南越国与它们交接的地区（今广东省北部）。其主要内容为军事或与军事有关的驻地，还有居民地。图上的"乡里"，均以红色圆圈表示，以里为名的有42处，其中有21处注明了户数。没有人居住的村子上则写着"今毋人"。最有趣的是，有5个里注着"不反"，如"龙里百八户不反"、"经里五十七户不反"。"不反"是什么意思呢？

据专家鉴定，墓主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将军，图是他在某次战争中绘制并使用过的军事地图。经测定，其时大约为汉文帝时期。那时那一带发生过战争吗？据历史文献记载，在公元前187—前180年时期，在驻军图所标定的范围内，即汉初南越国与长沙国交界处，曾发生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南越军队进攻长沙国，后来在汉中央军队的协助下，才将南越军队击退，那些个"今毋人"的注记，述说的就是战争带来的恶果：许多村子因殃及战火而荒无人烟。而上述的"不反"两个字，描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南越国攻打长沙国时，有许多居民曾凭借着军事要塞，坚守不降，未曾反叛汉朝！这幅图当是南越军队退去后绘制的，绘图者大概不会想到二千多年后，还有人会与它相逢，并透过它身上的一笔一画，猜想汉时明月汉时风。

说到风，让我想起另一幅地图。1971年出土于河北省安平县一个东汉墓中的庄园图。图中描绘的是东汉时期地主庄园的庭院建筑，可谓庭院深深深几许。不过引起我兴趣的是位于整个建筑后部的一座有5层高的瞭望楼，其最上层西北角处，竖有一个高出屋脊的黑色旗杆，杆顶上有一只黑尾、头向着风的来向的鸟形物，杆子的中部和上部两侧均有绿色飘带顺风飘飞。翻阅注释方知，它就是史书上常提及的中国古代风向器——"相风鸟"或曰"相风旌"。我们应向古人致敬，为了他们的智慧。相风旌就是古人聪明才智的体现之一：每当风来，风吹旗飘，鸟随风转。鸟动百里，风鸣千里。多么富有诗意的创造！

中国用"相风旌"观风、测风的历史非常悠久。早自殷代，先民们就创造出了测风的方法，即在风杆上系布帛、茅草、鸟羽之类的东西，至汉代，测风器已极为普遍。当时汉长安城内建有双阙，阙上即安有铜雀或称铜凤凰，古人是这样描写它的：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轴，向风若翔……东汉时，张衡则制造了相风铜鸟，并将它置于汉朝的国家天文台——灵台上，与浑天仪如影随形。

"东风初报相风旌，后苑春深草色青。忽听鸣禽惊散去，谁从花下掣金铃。"这是宫词中对相风旌的描绘，以往读到时我从未曾想过它的模样，不料此次忽然就得了机缘窥见到它的真容——考古学家说，这是最早的相风铜鸟图形。而西方什么时候才有类似的测风器出现呢？直到公元9世纪（一说10世纪）才发明候风鸡（weather cock）。

美国华裔学者余定国在他的《世界地图学史》里表达了这么一种观点：中国传统地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换言之，也可以说是诗与画的产物。于是中国古地图超出了对地表状况表示的范畴，更强调地图的多功能性。因此，古地图这样来阅读最好：左图右史，或者，左画右诗。

中国养了一堆官方艺术组织，各艺术协会又养了一群不会下蛋的鸡。

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认为，美协、作协、文联、画院这些机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每年花掉多少钱，没有统一的数字。现在搞改革开放，应该取消这些机构，或者停止财政拨款，让它民间化，谁都可以办协会。这些机构对艺术没有什么作用，它提供不了服务，而是来养一些人的。有的地方甚至变成争官位、往上爬、争地位这样的机构了。


摄影/张锁庆

■ 76%的中学生从没进过美术馆。

上海美术馆教育部日前公布的一项历时5个月的调查显示：76%的上海中小学生从来没有进过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副馆长张晴认为："之所以形成今天这种状况，是和当前我们倡导的教育功利实用主义有关，学生都以升学考试为最终目标，肯定缺乏去美术馆、博物馆的动力。"

■ 强制京剧进课堂是个蠢办法。

《光明日报》评论员刘长锋认为，让青少年在课堂学习戏曲的想法是好的，但对于具体的教学内容，要视各地各民族的习惯来选择，而不能惟京剧独尊。事实上，一些比较大的剧种，诸如秦腔、豫剧、昆曲、越剧、粤剧等等，从各个年龄层次来看，仍是当地群众的最爱，群众对它们的认可度在某种意义上更高于京剧。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北方很多地方习惯吃面食，南方大部分地区习惯吃米饭，很显然，你不能强制性要求全国各地都只吃米饭或者面食。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也应如此。

■ 我们中国的很多传统文化在世界上，尤其是在西方国家，被当成日本或者韩国的文化了。

谈到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时，曾经游历数国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潘守永很是激动地说："我们的确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甚至对周边国家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在世界上却没有太大的影响。这让有些国家乘虚而入，大肆做宣传，成为了他们自己的东西，就连汉字也有人在大言不惭地说不是中国发明的。事实上，所有这一系列荒谬的事情背后，也给了我们很多思考和启示——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注重国际的交流和展示，要走出去，而不是自娱自乐。

■ 少林寺有两三千册宋代、明代、清代版本的古籍图书，佛经、武术散本、中医手抄本等，但大多由于历经岁月侵蚀、火烧、水浸、虫蛀而损毁严重。

河南嵩山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说："少林寺从2007年开始启动修复破损的古籍，目前已经投入几十万元。但古籍图书修复起来很贵，而且技术人员短缺，修护技术和资金投入是难点，因此要做到全面完好的修复难度非常大。"他希望国家针对宗教、寺庙的具体情况，制定古籍书修复计划，将散落在各寺院的珍贵古籍书进行系统修复登记。

北大图书馆的时光之旅

撰文、摄影／王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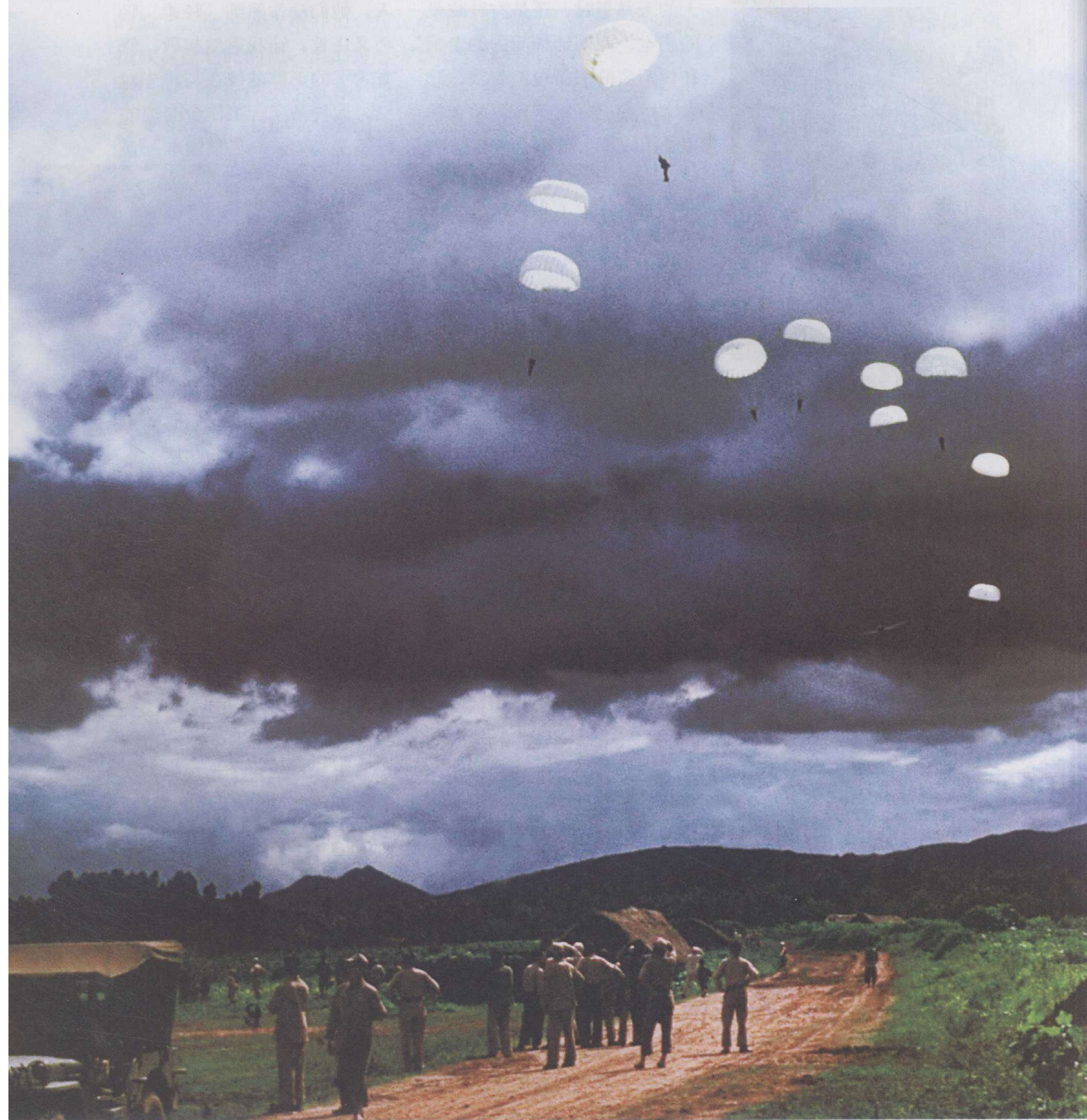

摄影师王凯在北大图书馆前

3月的北京春意盎然，去拍摄北大图书馆的那天更是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早就听说北大图书馆之大，然而当我们走进大门、穿过长廊、站在偌大的天井里时，还是有种眩晕的感觉，四周延伸而去的走廊和数不清的书籍包围着我，让人觉得自己好象落入原始森林里的蚂蚁那么渺小。

这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感受，同接下来进古籍部的震撼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了。在修复古书的“车间”，我见识了线装古书修复的情景。工作人员介绍说，古书修复需要先把书拆成分页，一页一页地展开之后，再补洞、喷平、倒页、捶平、压实、钉纸捻、齐栏、打磨、装订……由于古书的脆弱和珍贵，必须要全手工修复。工作台前的工人一点不像想像中老气横秋的手工艺人，她们动作熟练、轻柔、轻巧又庄重，让我肃然起敬，修复古书的工作就像在与祖先对话，太神圣了。工作台旁边的标签上写着——“梨园本”，很熟悉的名字，正是传说中550万元换来的《梨园本》！经过旧貌换新颜的一番修整，这套珍贵的绝版戏曲资料就将与大家见面，去讲述发生在几百年前戏台上的人间悲喜。

走出“善本馆”，看着周围阅读、上网、听音乐的同学们，仿佛经历了一场穿越千年的历史之旅，我在凌乱的思绪中捕捉着自己的位置，回味着这一次不寻常的拍摄。

援华美军眼中的



昆明旧影

供图/金飞豹　撰文/小今

60年前的家园是什么样？

谁能记住那战火飞扬时天空的颜色……

二战时期昆明曾一直是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由于美军飞虎队的拦截，日本人再也没有敢轰炸过昆明，这至今还让昆明人对援华美军饱含感激之情。美国《战争工作》记者保罗·伯彻以援华美军的视角记录下了昆明60年前战火纷飞的历史。右图为美军在昆明的机场进行降落伞训练。这张穿越一个甲子悠长时光的老照片，生动展示了当年昆明战区的真实面貌。下图为美军陆军中将史迪威在滇池边。1942年，史迪威奉命来到中国，参与指挥盟军对日作战，并于1943年主持改建了著名的史迪威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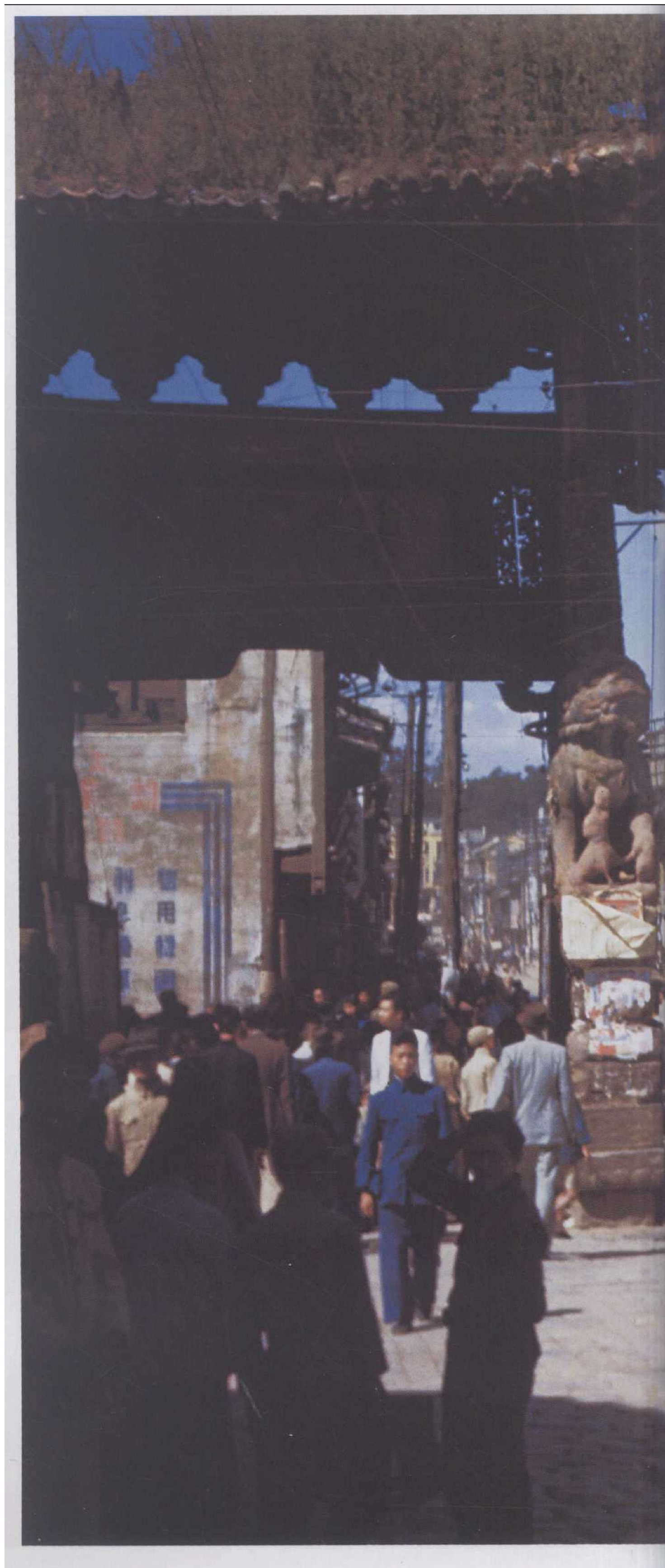
▶ 保罗·伯彻　*战地记者*

保罗·伯彻1915年6月2日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冷水镇，二战时期担任美国《战争工作》记者，1945年6月前往中国昆明，用他的Argus C3型相机拍摄了多卷反映昆明战区的珍贵照片。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我相信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地方。城里有石头铺的街道、土房、小店铺，每一条街上都挤满了人，他们肩挑大担的东西。通常还会有送葬的队伍、人力车、马车、牛车、自行车和小汽车……”这是克林顿·米勒特在家书中对老昆明的描述。60多年前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老昆明正义路与光华街、威远街交叉路口上的三牌坊——“天开云瑞”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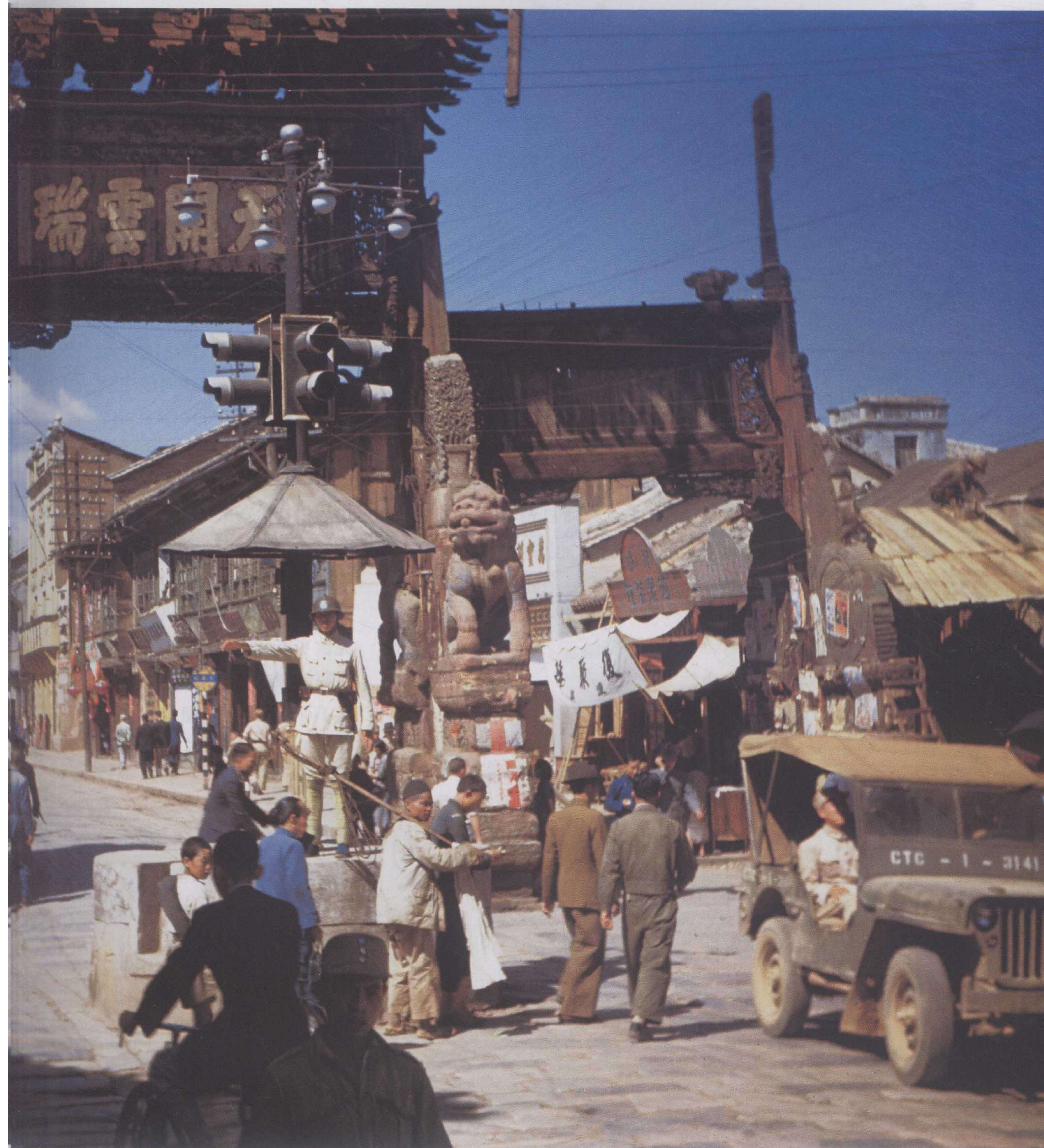
右：当时的交警在大火烧坏的牌坊前指挥交通。

下：永芳园烤鸭店，图中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永芳园创始人刘永芳。透过照片仿佛还能闻到当年烤鸭的香味。



▶ 克林顿·米勒特 中校，医学博士

1944年，克林顿·米勒特担任滇池之滨的昆明美国陆军第172医院副院长。在昆明期间，克林顿·米勒特用世界上第一代柯达彩色反转片拍摄了100多张昆明老街区的高质量的幻灯片，并以家书的形式记录下了当年的情景。


CTC - 1 - 3141

国内



福建东山关帝庙是台湾关帝庙的香源祖庙，每年都有很多台胞前来祭拜。摄影／张生贵

■ 汉武帝陵惊现两万余具修陵人屍骨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目前完成对汉武帝茂陵陵园的大规模考古调查。考古勘探表明，汉武帝陵的墓道是古代墓葬形制中规格最高的“亞”字型；陵园内埋藏有各类陪葬品的外葬坑四百座；包括陵庙、寝殿在内的大小建筑遗址十四处；大中型陪葬墓一百二十余座。同时，专家们还确定了为汉武帝守陵而设置的茂陵邑县城的地理位置，并发现修陵人的墓地，面积约四万平方米，估计埋葬屍骨有两万具以上。这次考古调查对深入研究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具有重要价值。据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期将对茂陵进行更细致的考古工作。

■ 中国涉台文物保护状况堪忧

据中国文物部门初步统计，大陆目前共有涉台文物1354处，但其中的许多文物因年久失修、基础保护工作薄弱、研究水平较低、维修资金缺口大，而濒临损毁的危险，保存状况十分堪忧。对此，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近日表示：国家将设立并启动“涉台文物保护工程”，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开展涉台文物保护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对集中分布于东南地区的涉台文物全面开展保护维修和环境整治，重点保护一批祖籍在大陆的台湾同胞的祖祠、祖居和历史文化村镇，制定涉台文物保护总体规划。

■ 四川发现三星堆“中转站”

经过半个月的发掘，成都市考古队最近找到了一处距今约4000年的“村落”，有可能是古蜀国从四川广汉三星堆向成都金沙转移的“中转站”。据介绍，该遗址范围约1万平方米，有用于祭祀的灰坑、小型木骨泥墙房址等遗迹。该遗址位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和十二桥遗址之间，同时反映了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特征，为研究古蜀文明传播走廊、研究长江上游古代文明发展进程提供了新线索，也为构建成都平原地区考古文化编年序列提供了可靠的地层依据。



被誉为三星堆“中转站”的古村落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摄影／邵兴

海外

■ 英国古塔从海边安全撤退

建于英格兰多塞特郡海滨的“克拉维尔塔”迄今已有178年历史了。据悉这座塔不仅拥有“无敌海景”，它还在英国近代文学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英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哈代曾在这里向其第一任情人埃利扎·尼古拉斯求爱；女小说家詹姆斯男爵夫人则在见到此塔后，灵感突发，写下了著名犯罪小说《黑塔》。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古塔身下的地基逐渐被海浪侵蚀，成了随时可能“坠崖身亡”的危塔。一年前，英国文保部门耗资90万英镑开始对古塔进行“安全撤退”。工程人员拍下了该塔每个局部的细节，小心翼翼地将总共16272块砖石一一拆下。然后，建筑工人在后退约26米的地方，将16272块砖石一一还原。经过18个月的艰苦努力，“克拉维尔塔”终于恢复原貌。专家评估，“克拉维尔塔”如今至少可以确保未来一百年内安然无恙。

■ 美国科学家揭开“古玛雅蓝”制作之谜

自从1839年人们在洪都拉斯的热带丛林第一次发现玛雅古文明遗址以来，世界各国考古人员在中美洲的丛林和荒原上共发现了一百七十多处被弃的玛雅古代城市遗迹。在神秘的玛雅文化中，玛雅人总是喜欢用蓝色来描绘壁画，即使是在进行祭祀时，他们也总是先将祭祀所用的人蓄染成蓝色。长期以来，科学家们甚是不解古代玛雅人是如何制成了色彩如此鲜艳且经久不褪的颜料。最近，美国的科学家宣称他们已经揭开了这一谜底。

大约自公元600到1500年起，玛雅人就会向井中抛入人和物作为祭品，这种井是一口天然形成的宽污水池，当时被玛雅人称为“圣井”。“圣井”首次发掘是在1904年，当时，研究人员在井底发现了一个4.30米厚的蓝色沉淀层，却未能知道它的来源。如今，经过科学家们的细致研究，知道制作玛雅蓝是祭祀仪式的一部分，而那个蓝色沉淀层可能就是经年累月被抛入井中涂有蓝色的供奉品留下的。这种蓝色含有两种物质，一种是靛青植物叶中的提炼物，一种是被称为坡缕石的粘土矿物。研究人员通过在电子显微镜下分析这些颜料样品，探测出玛雅蓝中关键成份的痕迹，他们认为是一种叫柯巴脂（即圣香）的接合剂在融合靛青提炼物和粘土矿物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使得玛雅蓝比其它自然颜料更为鲜艳持久。


考古人员在墨西哥南部发现的“玛雅蓝”壁画。摄影／Massimo Borchi



为何反对建设中华文化城？

撰文/张鸣　　摄影／徐飞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山东济宁一个号称投资300亿元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设想，在政协会场引起激烈争论，并引发一百多位政协委员签名反对和公众舆论的广泛质疑。这一宏伟工程，为何引起公众舆论的广泛关注？

据报道，这个中华文化城准备建在曲阜和邹城之间的九龙山上，还要被打造成中华文化标志城，成为中国的文化副都。中国以后凡是需要祭拜磕头的仪式，都挪到这里来办。有关人士说，中华文化城原本就是把曲阜和邹城包括进去的。我不信，如果建一个横跨三地的城，规模也太大了点，等于新建一个大北京城了，别说300亿，30000亿也挡不住。既然叫做中华文化的标志城，那伏羲女娲，尧舜禹汤，黄帝、炎帝，乃至关公、妈祖什么的是否都得搬来此新居落户？

然而，如此一来，不知道那些标志物的故里会不会有意见。孔孟虽然距标志城不远，但自然也得从几十里外的地方移民过来，不搬也得搬。领导意志，没法违抗。孔子是“圣之时也”，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且不说以后国家祭孔祭孟，不能在老地方了，孔林孟庙是不是也得改成养殖场或者种植场。而其他省份呢，能这么痛快“割爱”

吗？就算不迁坟动土，以后祭黄帝炎帝都到济宁，不知黄帝陵所在的陕西，炎帝陵所在的湖南能干吗？

因此，最大的可能是，此例一开，各地仿效。原来的陕西黄帝陵、湖南的炎帝陵，浙江的大禹陵，以及已经建成的假古董山西的尧城、河南伏羲台，纷纷扩张，你叫中华文化城，我叫中国文化城，或者炎黄文化城、九州文化城、禹域文化城，反正老祖宗留下的中国的代称很多很多，不愁起不出名来。如是这般，不知道又要吞噬多少个300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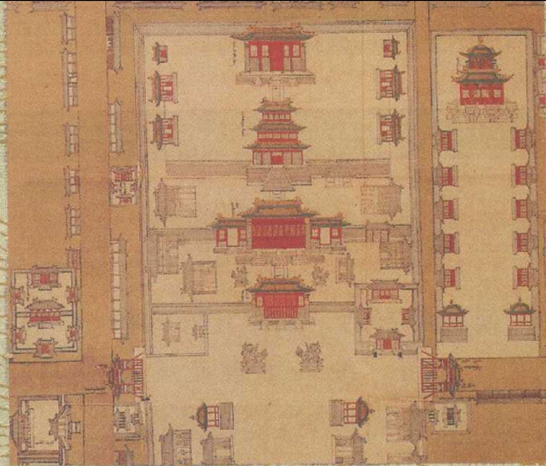
其实，我们中国人就有这种奇怪的爱好，一边说是提倡传统文化，一边硬是要把真正传统的东西扔在一边，烧大钱建新的，用钢筋水泥花岗岩堆出一个又一个貌似古人旧物的伟岸建筑来。山东有孔子，是山东的骄傲，但如今的曲阜却铜臭熏天，商铺满地，逼着热爱孔子的人，去爱孔府家酒，或者孔府的什么商品。没人乐意花钱修旧，却偏偏热衷烧钱建新，这样复兴传统，大概传统只好去见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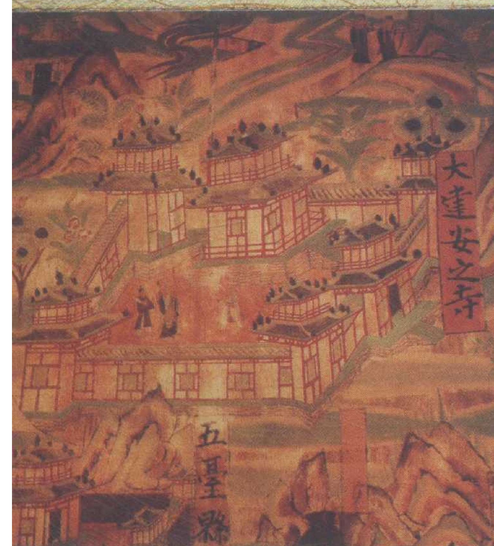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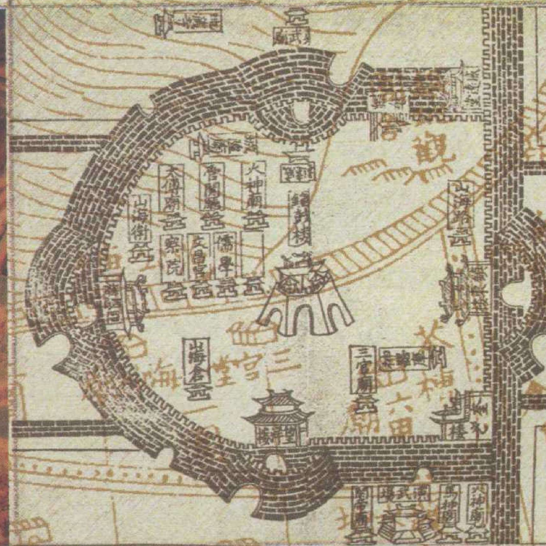
当然，钱肯定不会白烧，我们暂且假定所有建设大规模假古董的人，个个都有古君子之风，断然没有借机牟利者，成百上千亿的资金砸进去，一座座城池拔地而起，拉动了地方经济。在建设过程中拉动一地的经济，是可以肯定的，古人搭台，今人唱戏，唱的都是经济戏，是多快好省拉动地方GDP的好戏。至于建成之后能不能如规划者所料，游人如织，祭拜者相望于道，守城的人撑开口袋装钱，那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令我们倍感焦虑的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眼下还有几千万的贫困人口，今年遭遇雪灾的农民，还在苦苦挣扎，还有很多的人有病没钱看，很多的孩子没钱上学，政府花点银子玩文化也就罢了，还要建城。这种城，就算建得美轮美奂，有人会认它为文化遗产吗？就是打算蒙人家海外华人的钱，也得有点靠谱不是？既然将落入如此境地，何不如现在就把砸在文化城上的银子，给点没有社保和医保的农民，给点连书本都买不起的农村孩子们，给点城市里的下岗工人，可以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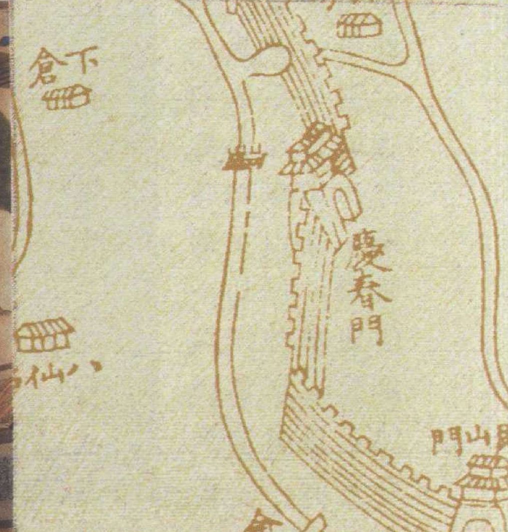
位于九龙山（左图）的文化标志城一旦建成，像这样原在曲阜举行的祭孔大典仪式恐怕也将成为绝版影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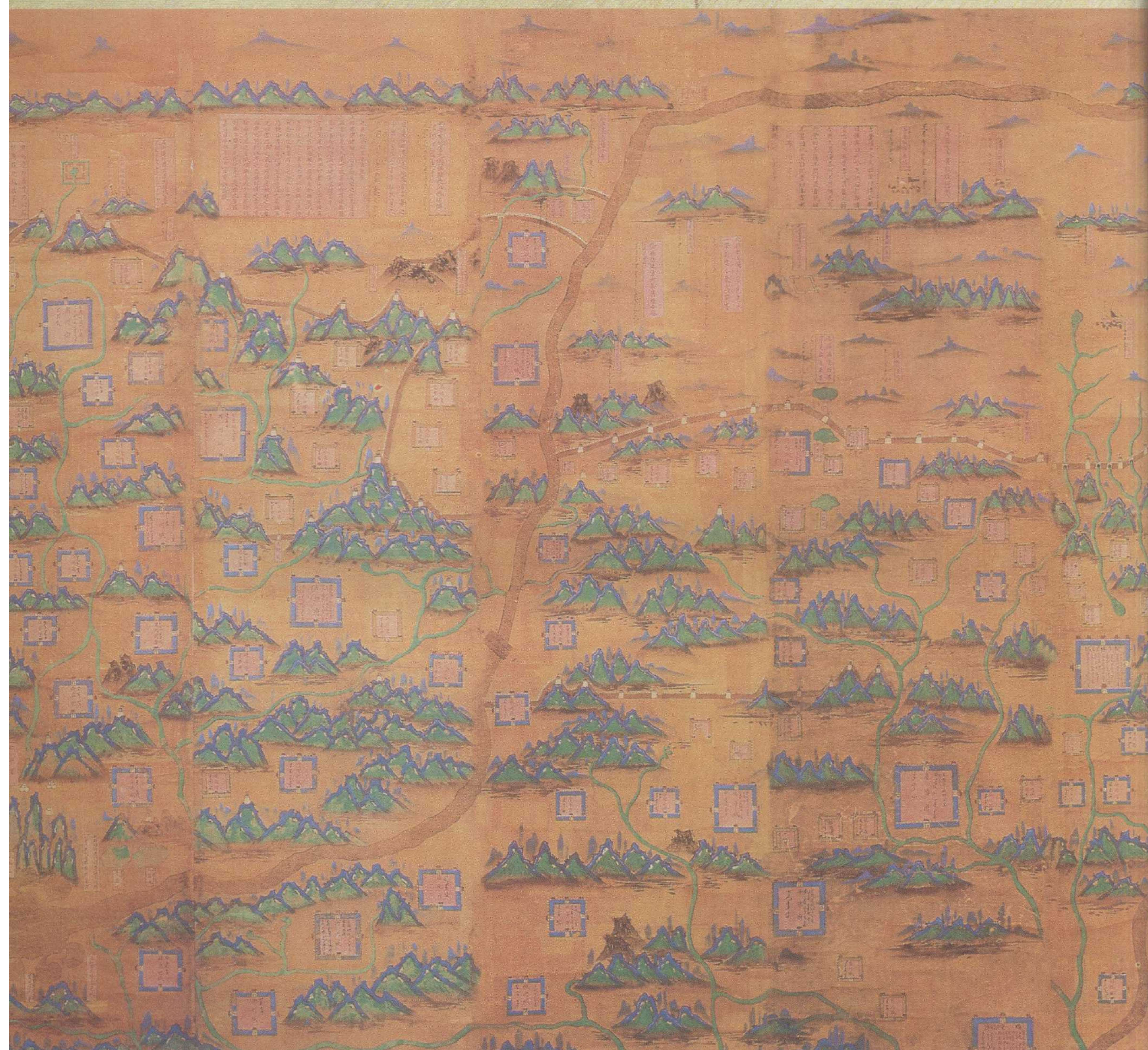





大達安之寺
五星縣



三圍
富地
倉房
倉房


下倉
慶春門
八仙



中国古地图

通常来说，中国清代以前绘制的地图被称为“古
多方位透视和主观示意者众，特别讲求与大量文字
曾以不科学之名被全面放弃的中国古典地图绘制方法，
本文是一篇对中国古地图的价值



《九边图》

飘逝的东方

撰文/于汐

地图”，其绘制普遍采用和中国山水画一脉相承的形象画法，
注记相配合……为何中国古典地图与现代地图差异如此之大，
对现今这个“地图数字化”的新变革时代，能否产生一些崭新的启示？
进行历史和文化双重思考的文章。

我站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二层走廊，明朗的阳光从巨大的玻璃窗投射进来，使挂在墙上的一幅用工笔重彩绘制的古典地图长卷——《黄河古地图》，格外醒目。

长915厘米，宽62厘米，要移步往复走上几趟才可饱览。它采用中国独有的长画幅构图，精细地描绘了西自黄河发源之地，东至大海的黄河及其两岸形势。如果不去留意上面纤细的字迹，只会觉得那是一幅由艺术家挥笔写就的气势磅礴的传统山水画卷。但细细分辨，图中自西迤东的巨龙上下，城池均布、名胜古迹云集，各自均有名称注记。此图根据收藏于地理所图书馆古籍方志馆的原图等比例复制而成，是一幅气韵流畅的清代绘本黄河形势图。

这幅地图让我关注的东西很多，其实注记在画卷上密密麻麻的字句已不实用，连同真实的地貌也随岁月变迁了很多，然而它此刻唤起的是我关于中国传统地图的某种追思，在凡事力求科学的当今社会，我们早已有了更多细致、精准表达地形，堪称巨细无遗的现代地图，但是从某一天起，古地图里那些让人心潮澎湃的中国元素开始缺失，并逐渐被现代制图者全面抛弃……

古地图的花开花落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岁末，一直在紫禁城里深居简出的皇帝朱翊钧，突然想起一份报告西洋传教士请求晋献贡品的奏章，自鸣钟、西琴、三棱镜等等令人饶有兴味的名字引起他浓厚的兴趣。后来随同这些贡品一起被呈进宫里的，还有件很特别的礼物——《山海舆地全图》。此后不久，万历皇帝又得到了比这幅地图更大、更新的一个版本，由12部分拼合成的屏风型“巨画”，总长3米，宽2米，也就是《坤舆万国全图》，它与我们今天所熟视的世界地图在形貌上已经相差无几。

然而，在当时，世界被以如此陌生的形状描绘出来，无疑于在挑战中国人天圆地方的世界观和唯我独尊的帝国观，这令地图的作





上图为《大明混一图》，是中国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世界地图。全图以明朝为世界的中心，各国间没有明显的疆域界限，它的绘制方法和内容沿袭了元代《混一疆里图》的制图风格。左图里，站在《黄河古地图》前的现代人为祖国的壮美山川所折服。

者——意大利传教士、历史上最伟大的汉学家利玛窦一直感到惴惴不安，担心这个古老国家的帝王会将这种“新地图”里的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没想到，万历皇帝欣然接受了这幅西洋舆图，还命人将其织成丝帛地图，镶入画屏，甚至希望赐给自己的皇子每人一幅。

1602年8月7日，也就是万历三十年，《坤舆万国全图》在北京刊行，残存至今的被认为仅有3幅：一幅在梵蒂冈图书馆，另一幅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此外还有一幅较完好的样品保存在美国克莱蒙特学院，但也有说法称：这幅地图当时曾印制了数千份都无法满足需要，结果1603年又再版多次。

在密布地图四角的文字说明里，我们看到利玛窦使用“地球”这个词多达12次，这是地图作者精心造就的一个新词汇，非常传神地表达了他所希望中国人认知的“知识”——世界是怎么样的。利玛窦献图的用意是很明确的，万历皇帝的欣然接受不知除了对新事物的好奇，是否还有其他想法。但改变是巨大的，它直接冲击和影响了中国固有的地图绘制方法。如今“地球”这个词汇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



坤舆万国全图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这幅由意大利人M. 利玛窦在中国编绘的世界地图被明宫廷艺人摹绘12份，有意思的是，图中在各大洋描画了各种帆船共9艘，还有15头鲸、鲨、海狮等海生动物，犀牛、象、狮子、鸵鸟等8头陆上动物也出现在了南极大陆上。

摹绘本大体上用了3种色彩：南北美洲及南极洲为粉红色；亚洲为土黄色；欧洲和非洲近于白色。少数几个岛屿



的边缘晕以朱红色，山脉用淡绿色勾勒，深绿色绘出的密密水波纹使海洋显得汪洋浩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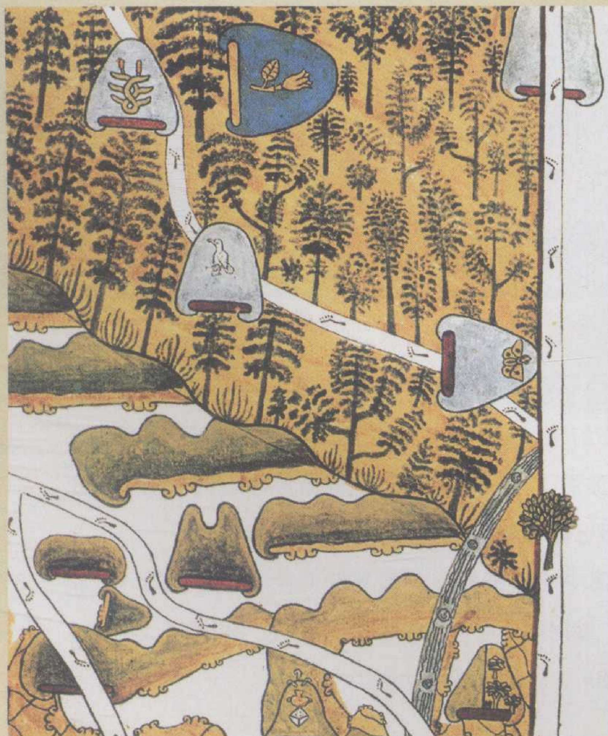
利玛窦编绘的世界地图，主要参考了奥尔蒂利等人绘制的地图。16世纪时，澳大利亚大陆尚未被发现，因此当时欧洲人绘的世界地图只有五大洲，为欧逻巴（即欧洲）、利未亚（即非洲）、南、北亚墨利加（即南北美洲）、墨瓦蜡泥加（即南极洲）。四大洋在图上则均有反映，它们是大西洋、大东洋（即太平洋）、小西洋（即印度洋）、冰海（即北冰洋）。图上大陆和岛屿的形状虽然不尽正确，但已基本完备了世界海陆轮廓。

图中的中国部分，则参考了罗洪先绘制的《广舆图》、喻时的《古今形胜之图》，以及《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杨子器跋舆地图》等。





上图分别是绘制在黏土上的巴比伦世界地图（12.2厘米×8.2厘米，公元前7－前6世纪，西帕尔出土），以及伊德里西绘制的圆形世界地图（1154年，牛津，波德利安图书馆藏）。下图这幅墨西哥土著地图绘于1583年，图中以平行波状线和小圆间隔表示河流，标记化的程度已经很高。



语言库里，但却很少有人去追问它的诞生。

中国国家图书馆有个部门叫舆图组，这是我国目前收藏和研究古地图的重要机构。舆图组副研究员孙果清曾经花了15年时间遍访中国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查阅那些堪称文物级的存世古地图，并且想方设法收集现存海内外的中国古地图的影印资料和文字资料，这使得他的脑海里渐渐有了一本厚厚的中国古地图名录。

作为“读图破万卷”的古地图专家，孙果清非常感慨地谈到了中国地图学史的分水岭时期——明末清初，利玛窦所绘制之图以及随后而来的西式地图，在中国人眼里呈现出另一种世界：天下怎么是圆的？帝国怎么这么不起眼？后来，让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扩展眼界的不仅仅是西方式的世界地图，还有先进的西方科技和洋枪洋炮的打击。

这位专家给我看一幅名为《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的古地图，据研究，它是以元代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公元1330年前后绘制）和元末明初僧清濬的《混一疆里图》为底本在朝鲜绘制的，可以算是当时中国人认知世界的反映。我发现这幅地图非常有趣：事实上包括欧洲、非洲、南亚和日本、朝鲜等部分都绘制得相当生动，不过非洲被非常夸张地缩小了数倍；中国部分处于地图的正中央且面积巨大；中国海岸线部分还算准确；再看日本，成了中国右下角远离陆地的一条小小的蚕……如果以此图来看，曾经纵横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几乎横扫过世界上90%以上的地方，这是不是可以表达分水岭时代之前的中国式世界观？

时过境迁，随着西方经纬控制法在绘图技术中的普及，以及光绪二十一年（1895）模仿西方测绘机构建立的中国第一所培养测绘人才的教育机构——京师测绘学堂的成立，中国地图的绘制慢慢全面西化。随着测绘科学的发展，中国也建立了大地坐标系统，这样也就和世界各国测绘者接轨。

其结果是尽管古地图学在中国已经以某种



明末清初，利玛窦所绘制之图以及随后而来的西式地图，
在中国人眼里呈现出另一种世界：
天下怎么是圆的？帝国怎么这么不起眼？

姿态兀立了数千年，但是在现代人心目中，似乎只有近代全面接受了西方的测绘与经纬定量的方法，将球面的地形“投影”到平面上制成的现代地图，才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产物，或者说是唯一可靠和实用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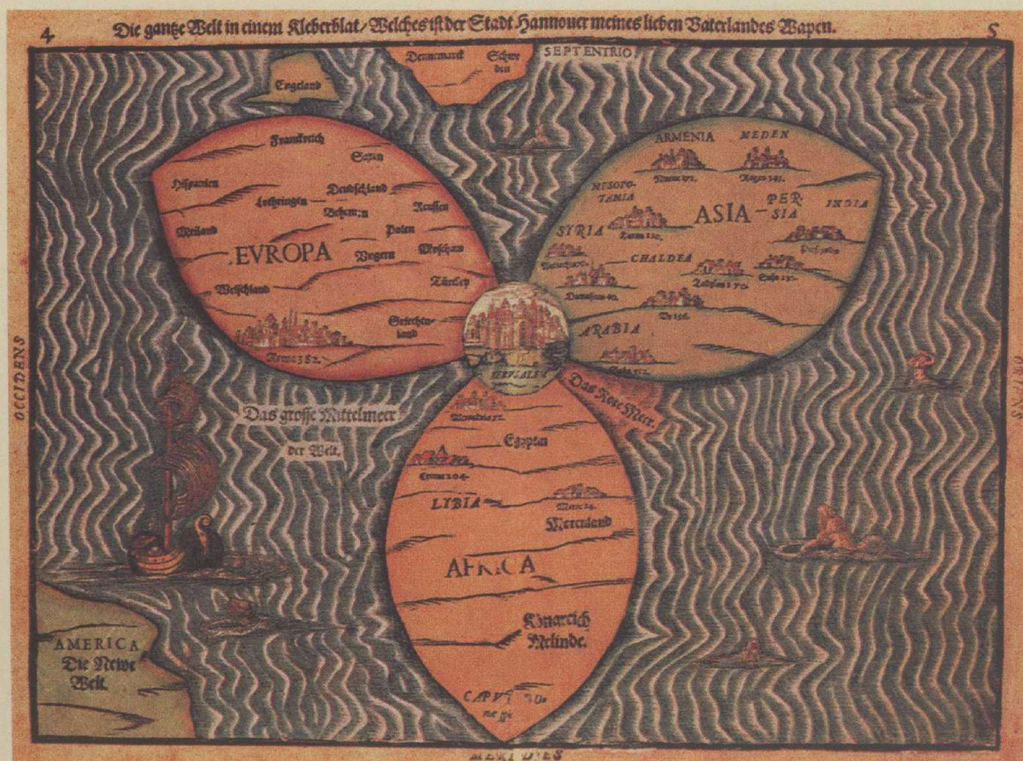
孙果清先生忽然很诗意地说：中国古地图只好是一株“曾经绚烂开放的鲜花”，在袭袭的西风中逐渐凋残，但是花开花落犹有余香，你看，它的根脉和种子不就藏在那些存世的古卷之中？这句话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早已被证明失去了科学意义的中国古地图，还有焕发出新的生命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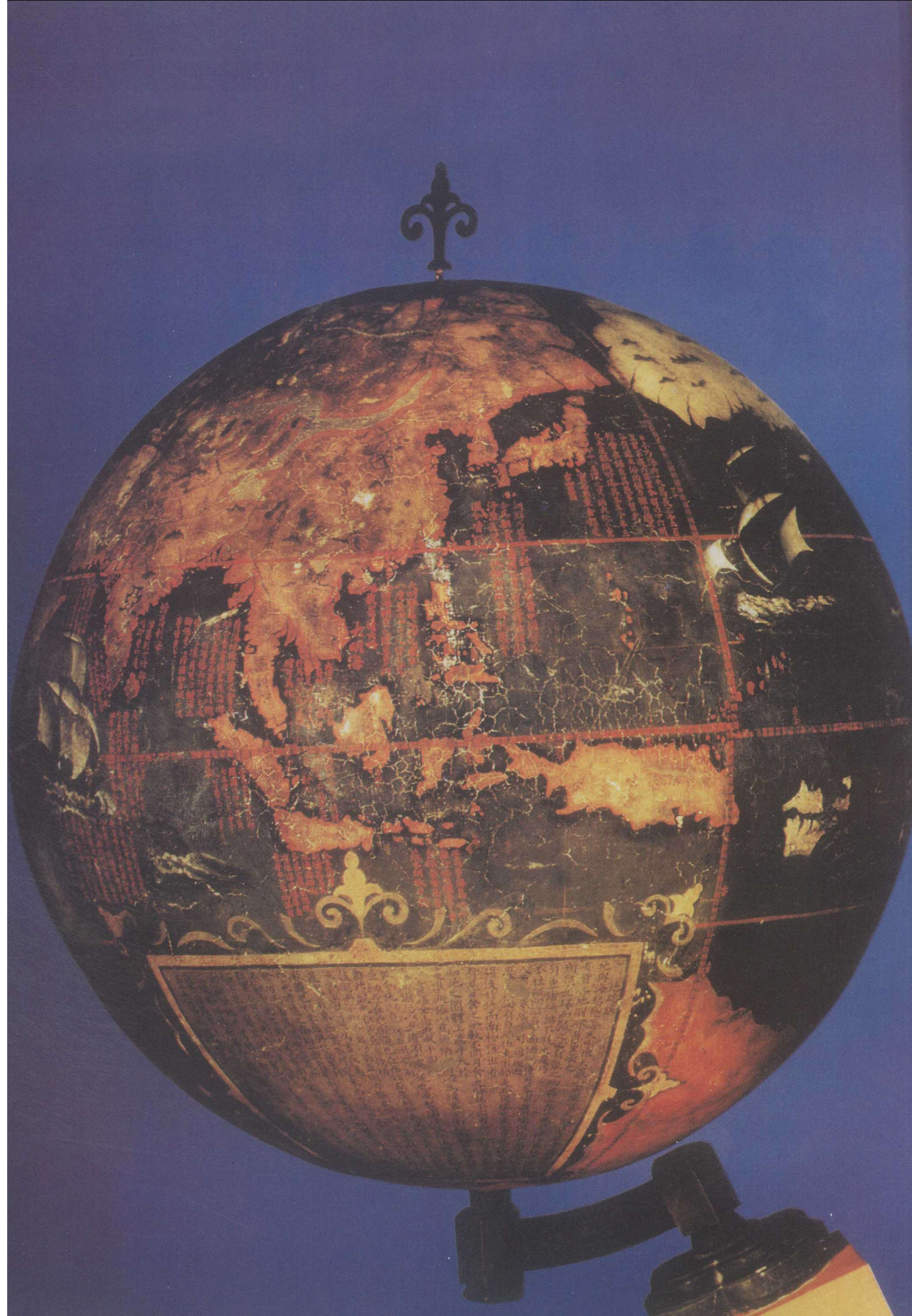
观念地图与长卷式文明

前面提到的《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从现代测绘学角度考量，无疑是落后时代的笨拙之作，但我很愿意将它归入观念地图，也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反映了当时人看待这个世界的一种眼光，如果这么去看待它们，中国乃至世界的很多古地图便都鲜活了起来。

我们都知道，在西方，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覆灭，一个新的社会公共机构不断壮大起来，这便是基督教会，因此，本来在西方早已出

下：1581年，汉诺威的神学教授海恩里希·本廷（Heinrich Bünting）绘制了这张三叶草形的世界地图。在此图上，非洲由正下方的叶子表示，欧洲为左上方的叶子，亚洲为右上方的叶子，叶子漂浮在海洋上，而三片叶子的会合点便是旧世界的中心耶路撒冷。那时候的美洲被认为是原有世界均衡结构的不谐音符，被安排在了左下角。







描绘与某些精神层面相连接的地图，
比如中国古代的堪舆（风水）地图和宗教地图等。
它们是表达人类内心与世界产生联系的图画。

现的托勒密经纬制图法和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都被宗教寰宇观取代，这就出现了大批的所谓T-O地图，这些地图把世界描绘成一个大圆盘，耶路撒冷位于圆盘的中心，尼罗河、顿河和地中海构成了有象征意味的T型十字架；15世纪德国木刻版本的世界地图，则把欧洲、亚洲和非洲摆成了围绕耶路撒冷的三叶草形状，这又让我想起古代印度所描绘的状如莲花的美丽世界……抛开准确的测距和比例不谈，如果你站在耶路撒冷或者德里来展开你的空间想象，世界的样子岂非真的很像三叶草和莲花吗？

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地图"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吗？既是也不是。地球本来是圆的，当它被人类绘制出来，就变成了平的，这中间有着无法消弭的天然差距，即使被我们认定是客观反应世界的当代"世界地图"，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去重新描绘，也会发现世界变成另外一幅模样。

我们的地图工作室曾经绘制过一幅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地图，为了展示全球各地向美国涌入的移民浪潮，我们尝试让地球从美国对面地方炸开，然后扯平成一个方形。当这幅地图完成之后，我们都惊讶地看着这个"陌生的世界"，惊叹背后是有着某种暗示意味的。

事实上，这种绘制法并不新鲜，早在1511年就出现过用心形图法绘制的希尔法努斯世界地图和1530年绘制的阿斯阿努世界地图，以及1538年的复式心脏形墨卡托世界地图等。

这里所提的观念地图，实际上还应该包括另外一种：描绘与某些精神层面相连接的地图，比如中国古代的堪舆（风水）地图和西方宗教地图等，它们是表达人类内心与世界产生联系的图画。这还让我想到，中国古代的"图"是不同于英文"地图（MAP）"的广大概念，有版图也有图画等多重含义。

中国古人不但把地图画在很多种介质上，比如用于占卜的甲骨、青铜礼器、用于陪葬的木板、丝帛和利于拓印和传世的碑石等等，人们还根据自己的思维方式把这些地图设计成多种幅面，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在西方和现代地图绘制中已不常见的"卷轴型"。

例如我们在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黄河图》，还有历代的"长城"、"长江"、"金沙"、"运河"等各类长卷地图。中国台湾文化大学地学研究所的姜道章曾在他的研究文章中指出：中国地图详于画水，而略于画山，也就是说对河流和内陆水系表示得很详细，而对地形地势则只简略表示，这与传统农业社会多沿水发展有关，所以中国人千年来就特别注重描绘大江大河，也自然把它们与国家的命运维系在一起来看，这也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长卷式文明"。

在观赏这些中国古代精美的长卷式地图时，专家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了在一幅绵长的画卷上让逶迤的江河、长城主体保持在中心位置，古代制图者大胆采用了变换方位的方法，比如北京大学唐晓峰先生在其考证梵蒂冈收藏的一幅清代长城图时就已发现，这幅地图虽然基本上是上南下北，但

左图为现存最早在中国制作的地球仪，于明天启三年（1623）在北京制成，画面上能看到的是其亚洲部分。同之前的《坤舆万国全图》相比，这个地球仪上的中国、朝鲜和东南亚的海岸线都更为精确。



在宁夏段就用“化曲为直”的近似画法使画面的方向约取向上东下西，这几乎可说是中国古地图所独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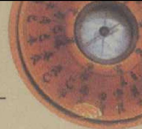
长卷式文明观对现代制图是有重要意义的，比如今天，重视大江大河、长城山脉以及资源廊道依然是我们的习惯。这种借鉴古典地图的手法或者画幅，以及电影式的移动视角，是否会带来一些地图表达上的新惊喜呢？

审美之眼看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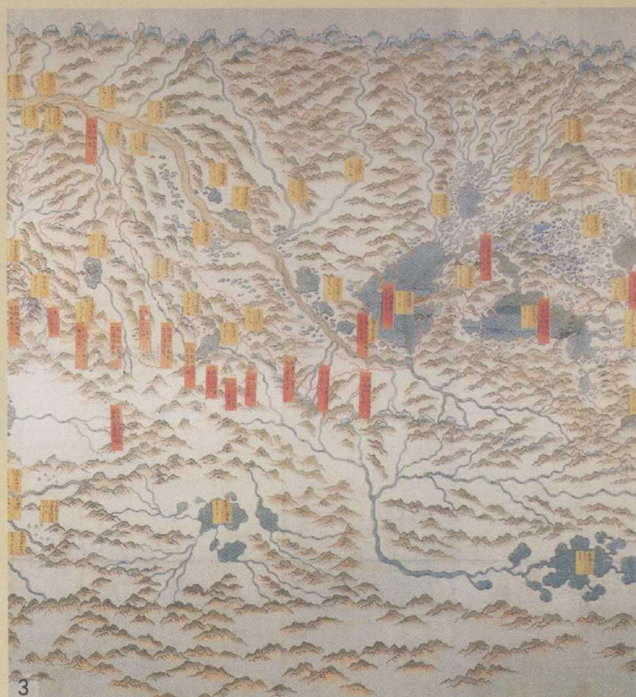
在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曾经使用过一种填图册，册里会将国家和省份的轮廓印制出来，让学生填色或者填地名。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训练，我们几乎能够非常准确地勾勒每个省的轮廓和国土的样貌，而且终生难忘。

然而在一幅幅地观赏中国古地图时，那些单一和刻板的形状在我脑海中慢慢变浅。“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一语道破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观，这恰恰也是中国古地图的心声。很多学者都在研究中指出：中国古代地图学不仅仅是一门技术科学，也是一门展示人文精神的科学，尤其是它与中国艺术史的关系，几乎从来就没有分开过。直到清代受西方的影响，中国地图学才完全脱离视觉与文学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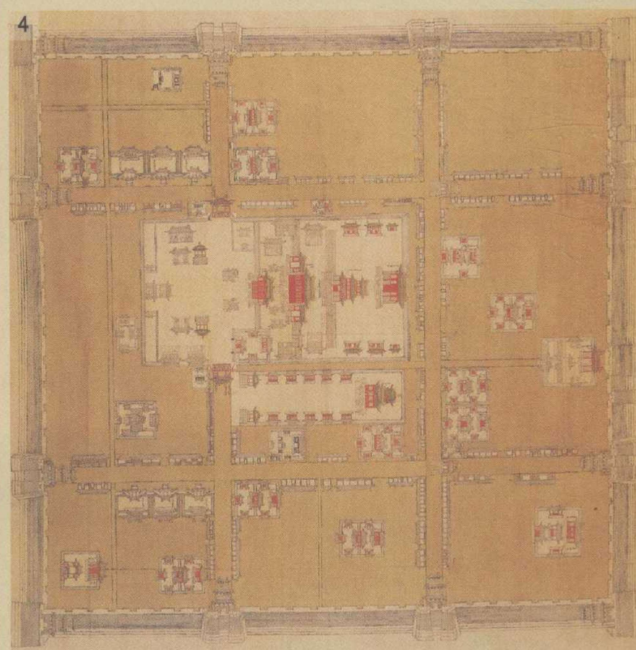
上图为宋度宗初年所制《舆地图》。以航海、山川、城池、军事等各为侧重的中国古地图其风格也不尽相同，时而气韵洋溢地借图抒怀、时而有板有眼地服务于实用。右页5幅依编号分别是：明《河防一览图》（局部）、清《泰山寺庙图》、清《星宿海河源图》（局部）、清《盛京城阙图》和清《封舟出洋顺风针路图》，它们展现了中国古地图的丰富与精美。




1


3


2


4


5



上图为清代界画《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万方安和》。下图为直隶长城险要关口形势图局部（沙坡峪和罗文峪）。在军事上有重要意义的形势图出人意表地采用了山水画法，将长城沿燕山山脉绵延起伏的雄伟英姿展现了出来。画与地图间你中有我、难解难分的纠缠关系，在这两幅作品里得到了精彩的演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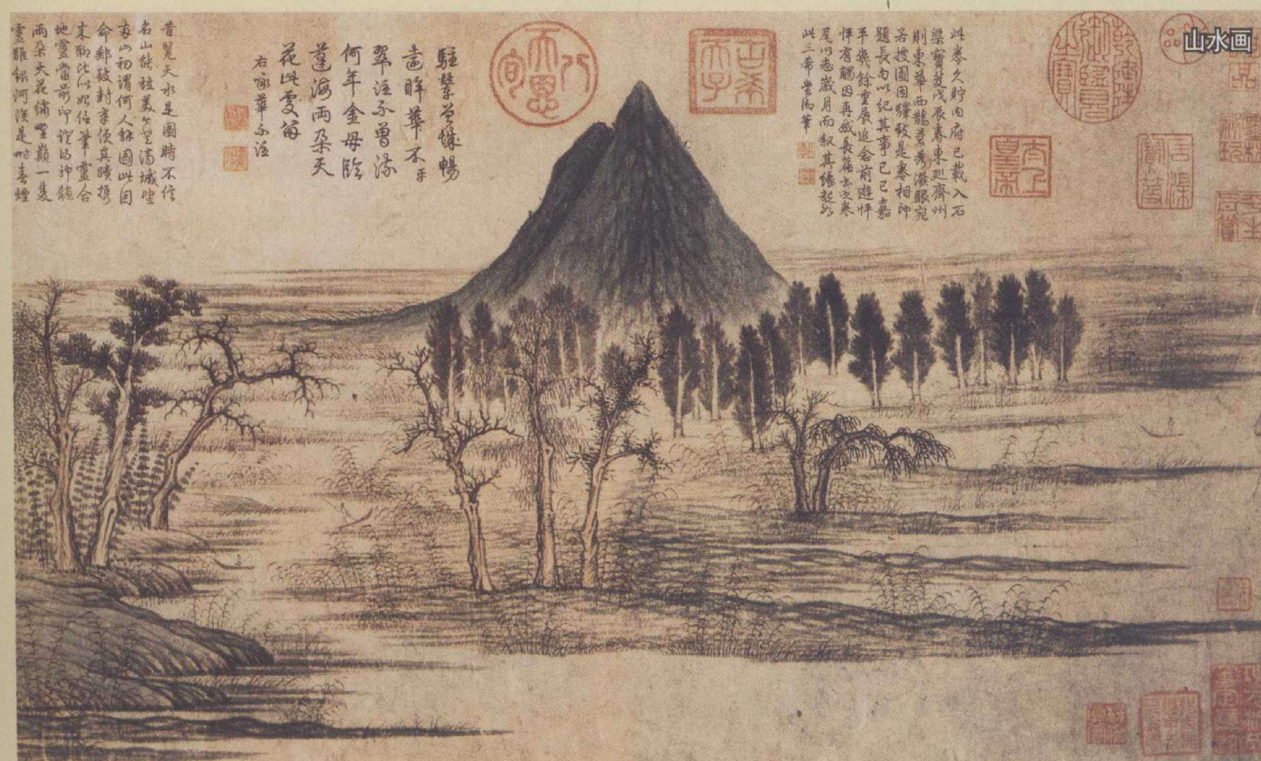






古地图

上面这幅地图为《九江府图》，出自清同治年间所制《长江图册》，图中景物均用立体写景法描绘，非常逼真。而赵孟頫所绘《鹊华秋色图》（下图）是为向他朋友述说济南风光之美而作。辽阔的江水沼泽之上，矗立著两座山峰，尖峭的是“华不注山”，左方圆平顶的是“鹊山”，地理空间感极强，与地图肖似。



山水画

看过越多的中国古地图，你越会产生一种感觉：
画即地图，地图即画，这不由
让人产生一种图画式“新地图”的想法来。

公元4世纪的画家顾恺之曾经试图这样表达作画的目标，他说：“形似而妙有气韵”，这项要求后来也在地图的绘制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形似和有气韵，就好像是客观和主观的关系，一幅过分追求形式的中国画往往会被指责“有匠气”。在宋代，绘画发展出一个独立的分支——界画，这是介于艺术和实用工艺之间的一种画，擅长按照比例绘制物体的详情，尤其是建筑物，画这种画所使用的工具甚至包括：直尺、圆规和三角板等，画界画者，常常被笑指从匠人那里借来了画具。

其实，有研究表明，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实际上是魏晋时期才从古地图的绘制中分离出来，它们原本同源，我们可以看看《说文解字》中“画”字的解释：“界也，象田四界。”所以我们说画的时候，有时候也说“图画”。

看过越多的中国古地图，你越会产生一种感觉：画即地图，地图即画，这不由让人产生一种图画式“新地图”的想法来。其实，不独在中国，西方古代的地图也是很讲究审美的。他们会在古海图四周布满罗盘和尺规之类的装饰，或者在大洋中布置鲸鱼和海鸟；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地图上有着大量的人像装饰，美轮美奂……

不过，西方画家的风景画，是焦点透视，非常静态；而中国的山水画，则是散点透视，是动态的，读者的眼睛就是摇动的镜头，所以要生动得多。此外，中国山水画有一整套独特的图式语言和构成符号，比如“丈山、尺树、寸马、分人”，是构图比例之法；比如“高远、深远、平远”，是架构空间之法；比如画树木形象，有介字点、垂藤点、胡椒点、攒三点等数十种点法；写山石的纹理结构，又有斧劈皴、雨点皴、马牙皴等数十种皴法。横抹一笔，便可表现千里云烟之势，再用一缕烟雾缠绕在半山腰，便可描绘出高山的巍峨气象，中国画的写意，是何等的高明，这些都曾在中国古地图的绘制中被应用得淋漓尽致。

即使是在现代，当我们偶然看到一幅为了某种专门用途绘制的鸟瞰图时，也会生出很多凌空飞腾的遐想，比如一些宏达精美的景区图。无论这些地图绘制采用的是航空摄影技术，抑或中国传统的手绘法，或者新时代的遥感图成像，视觉上给人带来的美感和冲击都是地图所需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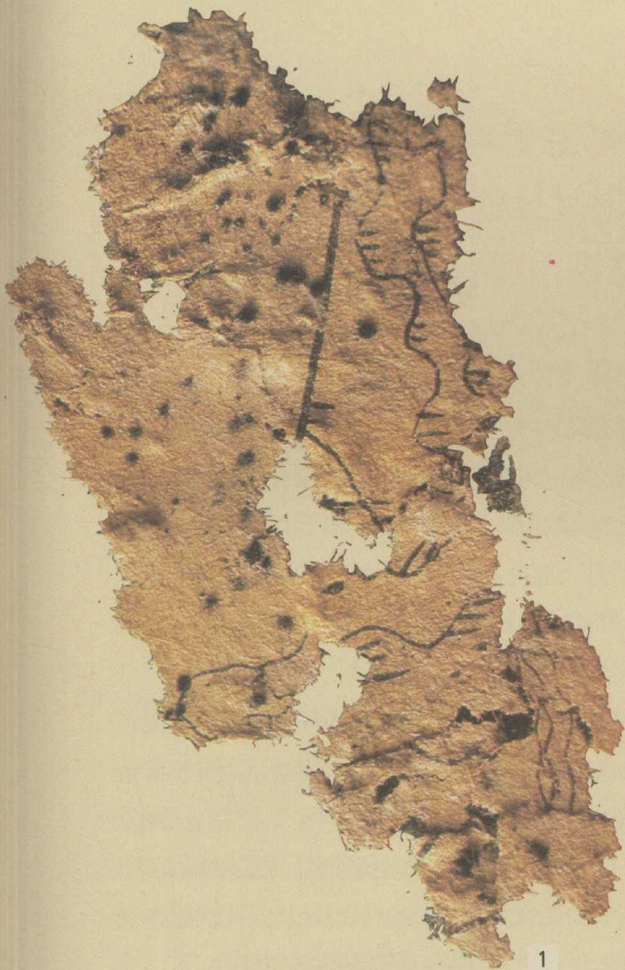
在杭州西湖文化公园里，我曾经看到过一片颇成规模的地图区，150米长、30米宽的步行景观桥上，用浮雕地图的形式描绘了30条世界著名的运河，浮雕两侧的黑色石材上还用线刻浮雕的手法，以中国古代地图为蓝本描绘了古运河流经的水系，历史感和艺术感扑面而来。

地图诉诸视觉，它所表达的内涵往往超过了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地图审美的意义就加强了这种内涵的表露。赏读着一幅山水画地图，侈山水、夸人物、辑诗文……让人感觉可以卧游，可以坐忘，甚而会让人想仰天长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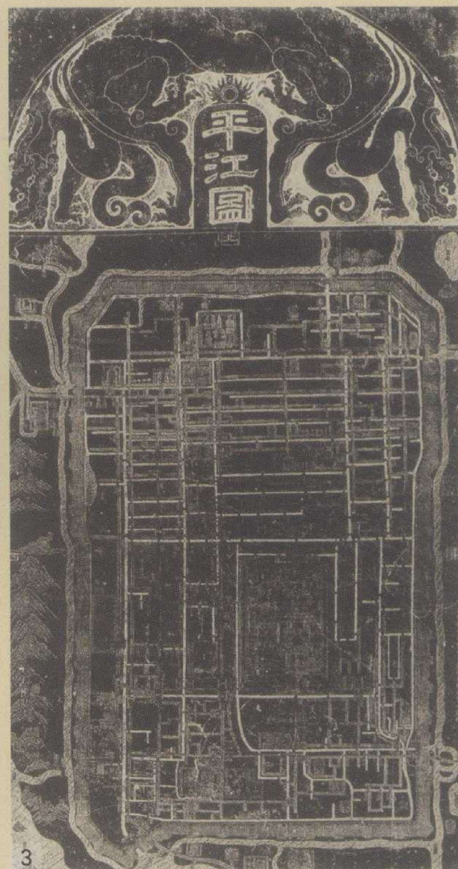
GIS与古代通儒

GIS英文全名是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顾名思义就是“地理信息系统”。GIS观念的提出，给了人一个新的看待世界的工具和方法。它和地图，尤其是中国古地图，实际上是渊源深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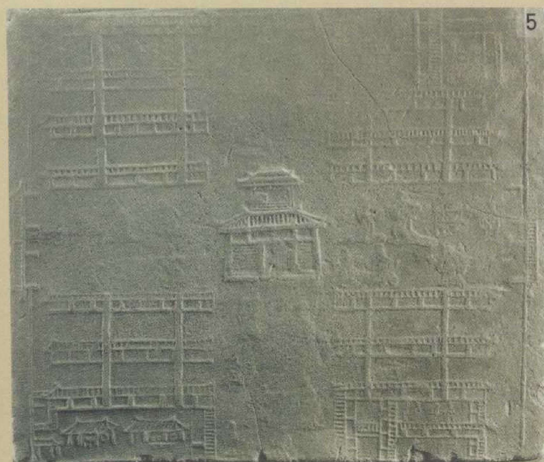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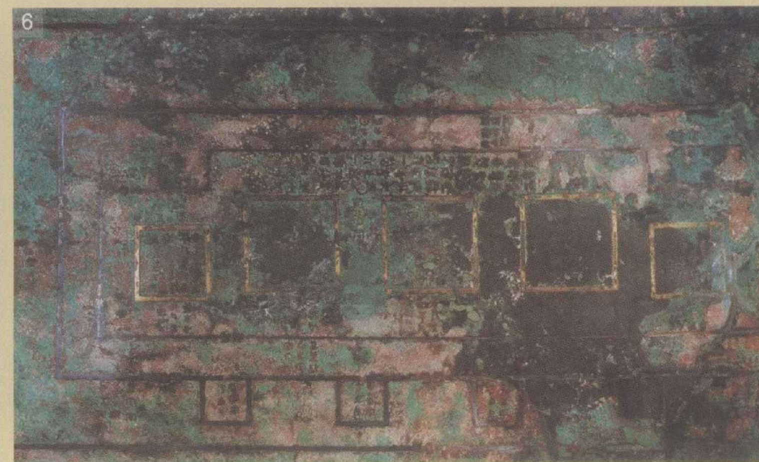




和人类文字的发展一样，地图的载体也不仅仅是纸张，丝绸、石板、竹、木甚至甲骨上都可以觅得古地图的踪迹。本页图依编号为：放马滩五号汉墓出土地图（纸图，残片）；灵岩寺田园记碑阴界至图图碑；平江图碑拓片；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地图（木板图）；东汉墓出土市井图画像砖；战国中山王墓出土兆域图（青铜板镶嵌金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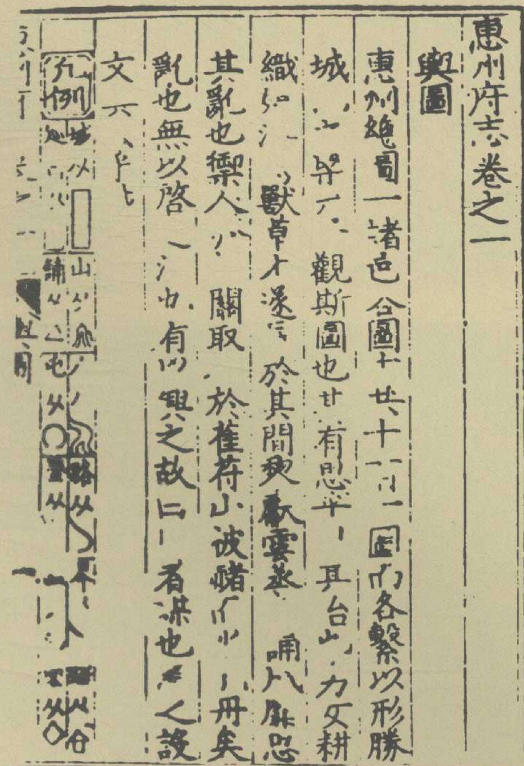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的地图绘制方法几乎是完全西化的，
人们已经渐渐忘记了中国古代描绘、同时又是描述世界的方法，
也不再关注祖先看待世界的特殊视角和着眼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中国古地图被称为“舆图”，舆的意思是车的底座，是用来承载物体的。中国古人注意到地图上载有山川、城镇、四方地物，就把地图叫作舆图了，这是非常形象的称呼，和西方地图观明显不同。

在这里我还想提到另外一个古地图的名词——“图经”，在“百度知道”里，“图经”是这样解释的：以图为主或图文并重记述地方情况的专门著作，又称图志、图记，是中国方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编纂形式。

的确，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重要历史文献群——“地方志”就是从图经发展来的。图是指一个行政区划的疆域图、沿革图、山川图、名胜图、寺观图、宫衙图、关隘图、海防图等；经是对图的文字说明，包括境界、道里、户口、出产、风俗、职官等情况……现知图经以东汉的《巴郡图经》为最早。

下图为明代《惠州府志·舆图》部分文字，它显示了罗洪先《广舆图》的深远影响和学术价值。


惠州府志卷之一

輿圖

惠州總圖一 諸邑合圖十 [illegible] 各繫以形勝

城 [illegible] 觀斯圖也 [illegible] 有[illegible] 其台 [illegible] 耕

織 [illegible] 獸草 [illegible] 於其間 [illegible] 雲 [illegible]

其亂也 [illegible] 關取 於萑苻 [illegible] 冊矣

亂也無以啓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之故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設

文 [illegible]

凡例 [illegible]

如果你留心观察中国古地图，就会发现，中国古地图上的注记特别多，往往密密麻麻布满整个画面。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在图上要表示的人口城镇或其他信息过多，还要贴签注记。这种方法使得中国古代的地图可读性特别强，也留给后人非常多可以研究的内容。

而反观西方的古地图，有学者认为它们是从插画发展而来，所以尽管具有很强的装饰性，也有一定的标注和记录，但是缺乏内容丰富的文字。比如万历年间由利玛窦所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就特意在中文版里扩大了幅面，以增加各种序文、注记等，来显示中国特色。

中国现代的地图绘制方法几乎是完全西化的，人们已经渐渐忘记了中国古代描绘、同时又是描述世界的方法，也不再关注祖先看待世界的特殊视角和着眼点，古地图里其实是藏着很多独特的“中国式记忆”的。直到有一天，关于“文化多元化”的讨论不经意间触摸到这个角落，翻开了这些发黄的古卷，露出几个模糊难辨的字迹：左图右史。

中国古代文人讲究的“左图右史”，可以用来形容典籍图史收藏的丰足，以及图与史不能分离。著名学者赵珩曾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治史者若没有地理知识，缺乏历史空间的方位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史地并称，正是这个道理……图与史分列左右，可以互相参补印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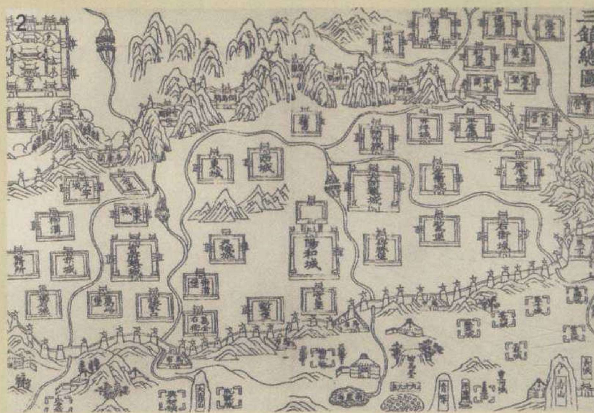
这种看待时间和空间的历史观和地图观，是不是和今天我们刚刚认识到的“地理”与“信息”的关系有些相似？但是中国古地图所带来的启示还不仅仅如此。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在这些古地图的背后，那些流传千古的地图佳作绘制者——古代地图学家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平凡的造诣和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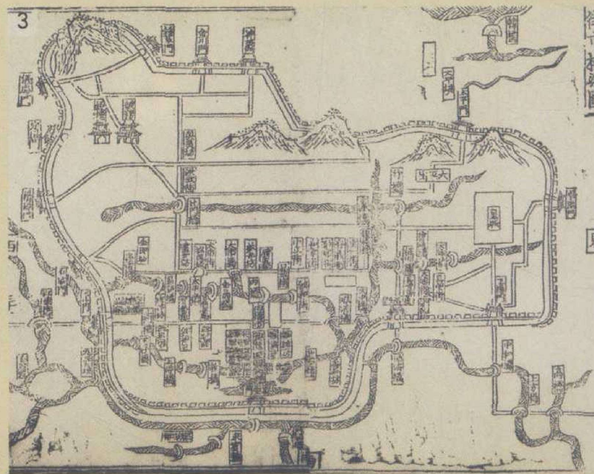
西晋时的裴秀，34岁时创立了我国最早的地图编制理论“制图六体”，他曾官至尚书令、司空，佐理国家军政大权，掌握国家的地图和户籍；唐朝高僧一行，曾主持编制《大衍历》，设计制造了黄道游仪、浑仪、复矩等天文测量仪器，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测量学家，他同时还翻译撰著了许多经书；北宋科学家沈括编制了《天下州县图》，他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绘成《舆地图》，求实求精的制图方法影响了以后二百多年的地图发展，他同时也是一位广阅书籍的大儒和道士……

我最喜爱的中国古地图有一幅是唐代大诗人王维所绘的《辋川图》，画面中林木掩映，山峦环抱的庄园正是诗人晚年隐居的辋川，其协调比例的流动的视角让人可以从各个方面了解建筑，同时在水云流肆、舟行画图间，又让人有飘然出世的感受，充分表达空间、事物的同时还能表达感情。这位学者、画家曾官至尚书右丞，也是典型的通儒人才。

事实上，中国古地图的佳品大多出自这些科学家、文人、画家之手，他们于学问上兼收并蓄，注意培养艺术修养。地图的内涵较之人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古代舆图家的成就体现了对多种人类知识——诸如神话、宗教、美









明清时期，刻印技术的普及和军政需要使各种地图成集出现或作为地方志插图。右图依编号为：清《云南舆图·大理府图》、明刻本《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山西镇总图》、王俊华《洪武京城图志·街市桥梁图》、明《大明一统志·山东地理之图》。

右图是在人们在杭州西湖附近的公园里游玩，他们还不时低头欣赏脚下的石刻杭州老地图。这幅巨大的地雕式老地图唤起了他们对于旧日杭州城的许多向往。



学、信仰、自我中心式的世界观的杂糅，这是今日制地图者要画出美图所特别应该学习的。

古地图带给数字未来的无限可能

地图，如果仅仅作为一项用准确和时效性来衡量的实用工具，那本来是非常典型的、用完即扔的东西，然而研究中国古地图的学者往往都希望对传统地图进行重新解释，这不仅仅是为了释放中国古地图里的“中国记忆”，也是为了通过中国古地图里特有的“文化传承性”寻找那些“古为今用”的元素。

除了艺术和历史研究这两个方面，学者们也还谈到了文化与技术。中国地图学家、中科院院士陈述彭就曾经说：被中国沿用了近千年的“计里画方”技术，今天，再次被广泛用于卫星遥感的地球表面的空间分辨率和像元概念上。

“记里画方”是古代用方网格法绘制地图的方法，电脑辅助制图普及以后，这种中国古地图绘制传统——方格网再受重视，在地图分析中愈来愈多地得到应用。特别是要将自然单元与行政单元之间进行统计数据的匹配对比时，方格网目前仍是不可缺少的技术。

陈院士说：卫星遥感的阵列数字化扫瞄数据，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多尺度的遥感像元，地面空间分辨率由若干公里提高至几个厘米，使网格地图的细化与日俱增。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数据库单元为1公里×1公里，而在精确农业和城市管理等实用信息系统中，地面网格已达米级。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体会陈院士所讲的意思，当表达地图信息的载体脱离了平面的纸张和16或者32开的幅面以后，地球的投影技术和经纬法看待世界的角度也将随之变化。我们在一个虚拟的数字空间里，将重新获得一个新的地图描绘空间，这时候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有了一个机会重新开始审视地图世界。

在这次关于数字化的地图革命中，中国古地图里蕴含的一些积极意义将有机会重新被发现和弘扬。任何先进的技术都是相对的，而只有人类的思想和人与世界的和谐关系才是追求的目标。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国古地图将会带



给数字化的未来地图学以无限的可能。

中国古地图曾经因为不够“科学”而被全面放弃，进而被西方地图学全面取代。那些留存在博物馆、图书馆和收藏家手中的故纸古卷沉默无声，变成一种没有生命的文化遗产。遗产保护专家们曾说过：那些具有实物模型的遗产是可以被复活的。所以，让中国古地图成为有血肉和气韵的活的文物是完全有可能的。

任何文明里最脆弱、最易毁和最容易消逝的东西都不是文物本身，而是文物背后的传统精神；文明的成果也不仅仅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传家宝”，还有值得我们继承的“世界观”，对待文物，对待文化遗产，我们最容易守其形，而略其魂，却接续不到传统文化里那一丝丝“中国气韵”。

责任编辑/刘睿　图片编辑/何亮　版式设计/许丽娟

地图在中国古籍中的分布



经部中的地图

“经禀对裁，垂型万世。”“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经部可分为十类：易、书、诗、礼、春秋、孝经、群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经

经类： 自宋至明清，图说《禹贡》者十余部，如宋《禹贡论》绘山川地理图，图辨前人旧说，清《禹贡图说》列《九州山川总图》、《舜典十二州图》等；《春秋》具列事实，后人解说者多附图以注，如晋杜预撰《春秋左传》有十二州图、战国图。

群经总义类： 自宋起各代均有图说六经者，宋《六经图》有图三百有九，元《六经图说》为图表三百余幅；清《经义汇考》列《禹贡》、《职方》的九州、春秋七国的疆域、下至秦汉以后郡县的变更图。

四书类： 此类中较为易见的是春秋战国图，如《四书考辑要》卷首有春秋十二国图、战国七雄图，《四书图表就正》有春秋列国舆图。另，清《四书图考》分天文、地舆、宗庙、礼射等十三图考。



史部中的地图

史部分十五类：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史

史书及传记： 史书传记类古籍辑图者多在明清，偶见宋元。内容广杂，涉及地域、建筑、物产分布、疆理、世系、纪年等。元朱思本的《舆地图》曾记于《增节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明《东夷考略》记秦汉以来女真部落沿革，卷首有辽东全图、开铁图、外夷图、海运饷道图等。

地理类： 明罗洪先将元朱思本《舆地图》加以改绘，于嘉靖年间完成《广舆图》，是保存至今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地图集。现存宋、元、明、清地方志、河渠水利、边防海防、漕运海运、山水古迹等古籍均见绘制地图，如清道光十五年续修而定的《福建通志》绘有州府、山险、水道、关隘、海防图等。明《筹海图编》绘有“日本岛夷入寇之图”，清《环游地球新录》作者李圭曾赴美国费城，后周游欧洲、西亚、东南亚等地，书中附地球图。

行政职官类及其他： 元虞集、赵世安撰《经世大典》（原书亡），清魏源从《永乐大典》中录“经世大典”图载入《海国图志》；清《钦定皇朝礼器图式》奉敕记载乾隆年间礼器六类，其中仪器类有图说地球仪；各地盐产分布图在地方志和《盐法志》中有载。

子部中的地图

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分十四类：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



兵家类： 明朝大型综合类兵书《武备志》中绘有沿海地区总图、日本入犯图、郑和航海图等；清魏源所著《海国图志》有海国沿革各图、地球正背面图、亚细亚洲各图，及利末亚洲各图、欧罗巴洲各图、亚墨利加洲各图。

天文术数类： 明《盖载图宪》以天图为盖、地图为载，录天文图十七，绘地舆全图；明《地理总括》以二十四山分阴阳局，绘龙、穴、砂、水图；清《尚书天地图说》中地图以《山海经》、《水经注》所列诸名。

释家、道家类： 寺庙地图早见于唐，从此类地图中可了解古代印度一般寺院的建筑布局和中土戒坛设置的一些情况。宋《佛祖统纪》有东震地理图、汉西域诸国图、西土五印之图等12幅，《桃源洞天集》有桃源洞图四幅。

类书及其他： 清人曾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出地图上百幅；清《古今图书集成》所收康熙分府图二百余幅，价值很高；明《三才图会》设“地理门”，有山海舆地全图、十五国风地理等。



集部中的地图

集部中，楚辞最古，别集、总集次之，诗文评晚出，词曲则其润余

楚辞类： 此类地图中以河道图、道路图居多。明《天文补注》中有山海舆地全图、古今州域新旧河道图舆图。清《山带阁注楚辞》有楚辞地理总图、抽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图、涉江路图、渔父怀沙路图。

别集类： 宋、明、清都曾出现地图，其内容有山、路、地形图等，宋《九华诗集》 刻有九华山图，范仲淹著《重校范文正公集》附有《陕西五路之图》、《西夏地形图》，明《苏文忠先生寓惠全集》有惠景全图，清《蓬岛樵歌》有蓬莱山图一幅。

总集类： 附地图多见于明代，较多为山川城郭图，如《燕山八景图诗》有八景图，《越望亭诗集》前绘山川城郭图，《小孤山诗集》前绘山图。

定三分隆中决策

退思盦主





这幅是《绣像三国志》插图，画面里，诸葛亮正与刘备指地图而论天下。



古地图 不可错过的故事

撰文／唐晋

从禹铸九鼎开始，上古先民就对广域地理表示出巨大的热情。
古地图忠实地记录着先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多少相关的传说故事就埋在史家的简册和时间的尘埃中，我们怎能错过它？

甲骨上的地图

甲骨上的图画甚至文字都蕴含着极其微妙的信息，一见之下便让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何谓华夏民族的图腾，可说是众口纷纭。有人说是玫瑰，有人说是猪，有人说是龙。可不管怎么说，图腾是一种图画，它象征着较复杂的绘画和抽象能力。当我们寻绎古地图的历史时，无需怀疑，当有图腾的时候一定就有原始的地图了。

华夏文明的原始图画最后分化为3个分支：绘画艺术、象形文字、原始地图。文字这一支或许最为辉煌，它承载了一个辉煌而独特的文明。其他两者：中国的绘画艺术和中国地图似乎因为同出一母，外貌上一直有着鲜明而忠贞的亲缘关系。

数千年里，从原始图画里分出的这三兄弟，一直待在中国古地图里，相亲相爱、不离不弃。象形文字给地图做标注，而中国式绘画给它带来直观、亲切以及民族化的独特感染力。

已知最早的一张中国古地图是什么呢？

有人说是从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7幅地图，它们分别画在4块松木板的正反面；有人说是战国时代铜板中山王陵“兆域图”，相当于中山王陵园的设计规划总平面图。但这两者都已在周代，商代有没有留下更古老的原始地图呢？

远在距今35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甲骨上刻下了一幅图，记述了他们打猎时经过的路线，路上的山川和沼泽历历在目。这就是河南安阳花园村出土的商代刻于卜卦用的龟板上的《田猎图》，它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也是全世界已知最早的地图。

在发掘出的众多商代龟甲中，还有这样一个甲骨文字，它中间画着一条弯弯的小河，河的此岸和彼岸各有一只脚印，一只左脚、一只右脚：古人用这两个高度精简的符号代表一行脚印。整个字，或说这张图可以说指示了一条穿过河流去往狩猎地的道路。这张让人发出会心微笑的“地图”就是甲骨文中的“涉”字，它所传达的信息原始、质朴，也可以看作是一张很古早的地图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藏着一块特别的甲骨文物，这是河南安阳出土的一块刻在龟板上的原始图画，专家研究认为这些深浅不一的刻痕是一幅表达打猎路线和山川位置的古地图，制作的年代距今已达3500年，比世界上发现的古地图都要古老。





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的7幅地图之一。这些地图均用墨线绘在4块大小基本相同（长26.7厘米、宽18.1厘米）的松木板上。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木板地图。下图为复原的墨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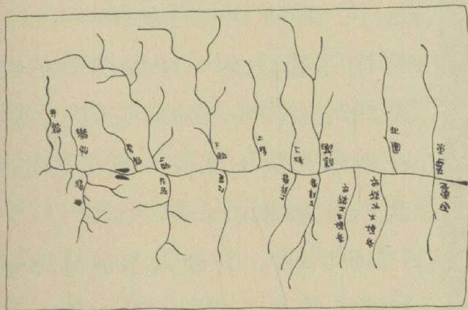
负版者

伟大的文明必有伟大的地图，我们这个喧嚣、躁动的电子时代，应该对这些伟大的「负版者」致以遥远的敬意。

《论语·乡党》篇中提到了一件事：孔子“式负版者”。“式”是马车厢前的横木，它用作动词时是指手放在这根横木上低头致敬。“负版者”是什么人？以至于孔子路遇时要致以如此恭谨的礼节？郑玄笺注的“负版”这个词意思是：“持邦国之图籍”。因为当时的地图主要雕刻在铜版、石版、木版上，比较笨重，所以，要通过背负才能送运、观览。通过如此隆重的排场，我们也能看出在古代地图和地图绘制者、拥有者都有着一定地位。

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甘肃天水放马滩古墓中，4块松木板图的主人是什么身份，目前尚无一致看法。墓中还发现了算命占卜的书，另外尚有8枚竹简，记录了墓主人“丹”（和后来派遣荆轲行刺的燕国太子同名）的一段神奇故事：丹因伤人而被处死，但3年后又死而复生，这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松木板上的7幅地图的确是他亲自绘制的却似乎可以定论。

丹从军多年，看起来这位军人是在着手绘制一幅完整的邽县全图，可惜尚未完成就去世了。留下来的这7幅图，除一幅为半成品外，其他6幅可拼接为完整的一幅，所绘范围东西长135公里，南北达88公里，在当时的绘图水平下，这是非常可观的一个面积。



这位古代普通下级官吏的作品，如今成了中国的国宝，因为这份在全世界都算得上最早的实用地图准确性很高、图式体例统一，展示着中国古代先进的地图理论和技术。

督亢之图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千古流传，故事中那份燕国督亢地图是什么样子？那个时代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示河山、道路和城池？

大禹治水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传说，大禹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受百姓拥戴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劳苦功高的成大业者，而且是一位创制垂范的明君。

在历史记载里，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并“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在这批由九州供奉之铜铸成的九鼎上，分别刻有九州的名字、山川以及奇异的草木禽兽形象，让人“以观万国”，增广见闻。

很多人认为，夏禹九鼎上的图案，就是中国最早的地图。而能做出这九幅地图，说明当时的人们已掌握了较为丰富的地理知识。

大禹因为他的鞠躬尽瘁、劳苦功高，是我们民族记忆中最有合法性的君王之一；他铸的九鼎，既是地图，又成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象征。如果九鼎不是在战国时代失踪了，它一定会像秦始皇用和氏璧制作的那只传国玉玺一样，成为后世每位君王梦寐以求的东西——因为它实在太能满足他们对于政治权利的渴求了。

地图象征着九州，九鼎象征着国家，这9只鼎上的图案直接成为土地主权的凭证，从制成的那一天起就有了极其神圣的意义。天子分封时，要将该地地图赐给分封的诸侯；而诸侯之间的献图行为，就意味着让出土地和主权，意味着因战争、联姻或其他原因，将那片土地送给别人。而在没有战争的时候，地图（“图”）和户籍（“版”）就深藏宫中，秘不示人。到了后世，进攻者但凡取得了对方的地图和户籍，也就意味着消灭了对方的政权，而战败者不到迫不得已也绝不会让本国地图落入敌人手中。

荆轲去秦宫的使命之一就是献出土地，他携带的也不是别的，正是那一卷直接代表土地和权力的神圣地图。地图即主权、主权即地图，深明此道的秦王展开燕国督亢之地的地图时，变得如此亢奋，目光随着那图上的城邑、山川而迷醉，以至对凌厉的杀机浑然不觉，让荆轲有时间等着了地图尽头的那把匕首……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千古流传，故事中那份燕国督亢地图会是什么样子？那个时代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示河山、道路和城池？



故事令人遐想，但督亢地图或许我们是无法看到了，它埋藏地下、等待出土的概率未可知，也许这幅让秦王印象深刻的地图此时还伴随在他的身边，沉睡在地底的秦始皇陵？难道现在的我们再无缘见到秦时地图了吗？1986年3月，甘肃天水放马滩的林场工人在修护林站宿舍时，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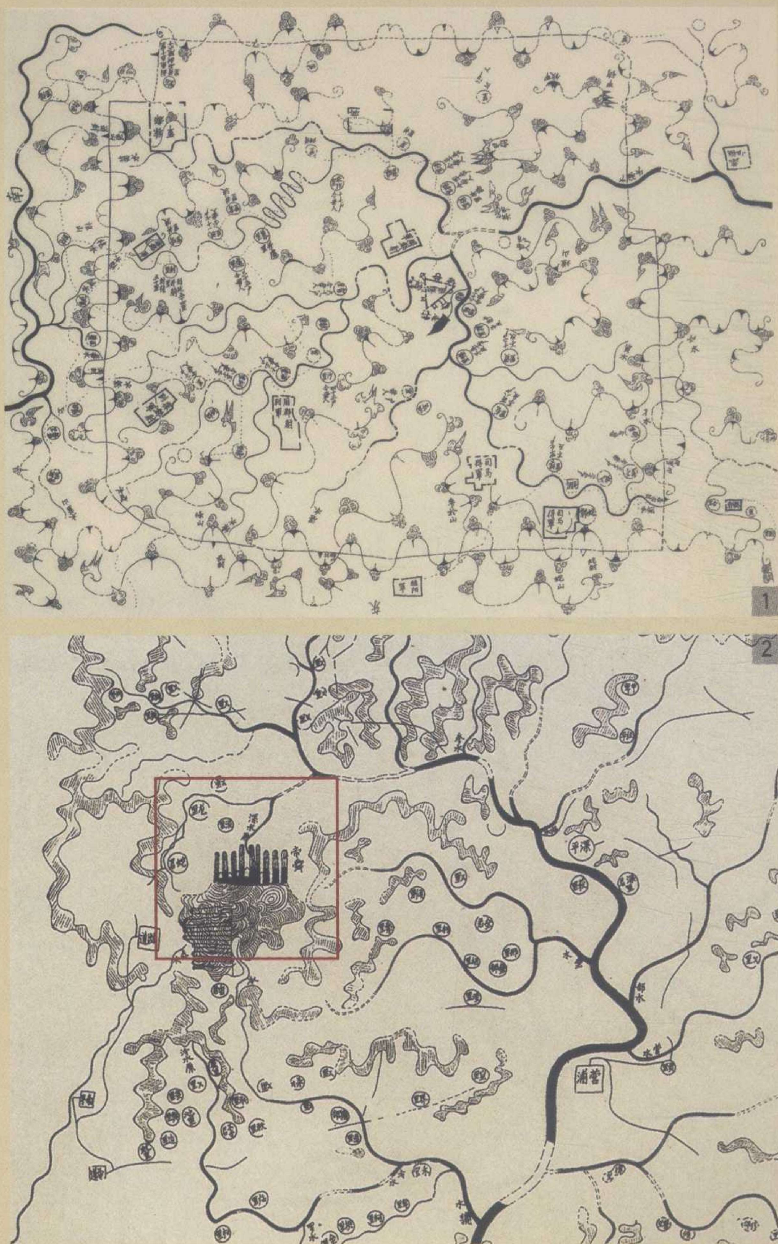
现了一处古墓群。墓中出土了4块松木板，木板的正反面共画了7幅地图；令人莞尔的是，林场工人在林场宿舍发现的古墓地图，有一幅正是2200年前当地的“林木资源图”。

经研究鉴定，这些地图大约绘制于秦王嬴政八年（公元前239年），也就是说在12年之后，秦王嬴政等来了让他朝思暮想的“督亢之地”，以及名垂千古的刺客。放马滩地图和督亢地图在同一个时代，我们可以据此来想象传奇中督亢地图的风采。

如果忽略放马滩地图古老的松木板上因2200年时光所造成的模糊不清，以及古今文字的差异，我们可以这样说：放马滩地图和今天21世纪的地图几乎完全看不出差别。

今天的手绘地图用高空俯瞰的视角描绘地面的水系、道路和城镇居民点，在这些抽象的线条和符号旁附注必要的文字，各元素之间距离、方位力求准确，等等。而这些手法在放马滩地图里已经可以看到端倪。

督亢地图一定不是画在木板上，它应该有一个和它身价相称的载体，但它的绘制方法，应该和放马滩地图相似。



上图1为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复原图，原图用黑、红、田青三色在帛上绘制。上图2为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图”，其中对九嶷山的表示（红框内）有独创之处，用细线画成鱼鳞状闭合线示意山峰，很像现代等高线画法。左页图为乾隆时期出土的东汉石画像，荆轲刺秦王的画面跃然眼前。

放马滩和马王堆，这两个地名都有一个马字。两地一个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实物地图，一个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军事地图。天南地北、两个朝代、相距70年的地图，虽然一个粗率、一个精美，但绘制方法是十分相似的。1973年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3幅地图，用封闭的曲线画出山脉形状，图中河流的表示方法几乎与近代地图一模一样，地图的视角也是高空正向俯视，里面用“钢笔素描”一样的手法“唰唰唰”填上密密的平行线，这看起来像是2000多年后光绪年间地图画山时用的“毛毛虫法”。

放马滩和马王堆出土的虽然都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地图，但我们现今接受起来却没有难度。如果不是埋藏久远造成的残破，这些最古老的地图看起来反而像是最年轻、最近代的。



米、刺绣与美人

在充满铁血的战争与杀戮之间，一份军事地图会有多么纯洁、或者炫丽？历史充满奇异，超乎我们想象。

从禹铸九鼎开始，上古先民就对广域地理表示出了巨大热情和野心。奇幻恢诡的《山海经》、《山海图》，就是那个时期的古人在真实与虚幻之间开始的对无穷广域的精神遨游。地图，这个新生事物，在不久之后就迅速走进了一代王庭的各个角落。

到了周代，地图和户籍正式成为国家重要档案，《周礼》一书记载了十种需要熟练掌握地图的官职：司书“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九职、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图，以周知入出之物”；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依照地图管理地方行政；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负责解释地图；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职方氏“管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司险和职方氏都是军事部门的官员，所掌地图也主要用于军事用途；小司徒之职“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负责跟土地有关的法律事物，并且在处理时要以地图为依据；矿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矿产部也需要专业的矿产资源图。由此可以想象，周代政府机构中活跃着多少地图测绘的专业技术人员。

关于地图的用途，很多人第一个会想到军事。的确，从商代直



至春秋，1000多年间，战争的主要形式是车战。天子万乘，诸侯千乘，成百上千辆骏马拉动的战车在大地上驰骋、会战，这样的军事单位对道路条件有着很高的要求；如果不熟知哪里战车能够通行、哪里不能通行，后果绝对非常严重。我们不难理解，车战对地图的需要有多么迫切！“舆”者，车也，后世中国一直把地图称为“舆图”，这应该不仅仅是一种巧合。

东汉刘秀为拒匈奴，制造了一种巨型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不过，这种大“坦克”多半是种摆设，它需要一份上好的地图才能发挥作用。——历史没有让这位东汉的开国皇帝失望，建武二十二年（46），一位名叫郭衡的汉人从草原上来，献上了一份匈奴地图。这份地图的准确程度应该很高，因为这份地图出自匈奴王庭，是匈奴的核心机密，郭衡是受匈奴薁鞬日逐王的秘密派遣，匈奴王也正以此表示归附的诚心。第二年，薁鞬日逐王带着所统领的南边八部四五万人投奔汉朝，并自立为单于，从此匈奴被分为为南、北匈奴。

左图系《平定西域战图册》——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

下图《老营堡》选自明朝万历年间彩绘本《三关图说》。此图集系当时山西巡按为向皇帝报告山西边防形势，与雁门、宁武、偏头三关总兵备共同组织编绘的。

很可能是这张地图改变了匈奴和遥远欧洲的命运。此后几十年，北匈奴连连战败，最后承认了自己的宿命，从中国的历史中消失。



在充满铁血的战争与杀戮之间，一份军事地图会有多么洁白、绚丽？历史充满奇异，超乎我们想象。

东汉建武八年（32），隗嚣叛汉，光武帝刘秀亲征。伏波将军马援在刘秀面前对隗嚣的军事部署作了透彻的分析，并用洁白的米堆成山谷状，显示当地的山川地形，指点各路兵马进退的道路，“分析曲折，昭然可晓”。这便是我国军事史上最早采用的沙盘。

魏、蜀、吴三分天下的时期是中国军事艺术的一大高峰。据《拾遗记》记载，东吴孙权在戎马倥偬之际，不忘派擅长绘画者图写山川、地形，以备作战之用。术士赵达的妹妹把山岳、河流、城邑、军阵用五彩丝线绣在方帛之上献给孙权，孙权大悦。抛开美人香泽的旖旎不说，这种艳丽无比的刺绣军阵图对行军作战来讲也极为实用！它图案醒目、便于携带，而且防水。时至今日，有些军事和户外运动的地图仍采用类似的形制。

这位传奇女子的作品会有多美？我们可以通过马王堆出土的彩绘《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来想象刺绣军阵图的面目。

南极大陆的「麒麟」

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些地理名词在郑和之后不久诞生，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关于世界的发现也很快就揭晓了……

中国自宋代开始重文偃武，画山水画成为整个社会倾慕的风雅，无数“胸中有丘壑”的知识分子在地图上“直抒胸臆”，将山水画法和地图绘制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并且兴高采烈地将他们的作品刻石留念，这为地图多产的时代增添了很多故事性和喜剧色彩。

我国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在熙宁八年（1075）受命出使契丹的时候，有了一个急中生智的发明——把边境敌我形势做成直观立体形象带回皇帝跟前。他先用木屑和浆糊将地图做在木案上，但经不起寒冻，失败了；又改用熔蜡，蜡虽轻便易行但也不坚固；最后，沈括将其凿刻在木板上，做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木地图模型。这一史无前例的作品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皇帝大加赞赏，并在两宋期间被效仿流行。

明代嘉靖十九年（1540），一个叫罗洪先的江西吉水籍官员因言获罪，被革职除名。这位嘉靖八年的状元回归故里。他精研天文地理，在元代朱思本《舆地图》的基础上增补改编，装订成册，绘制出了我国第一本分省综合地图集。状元出手，必属精品！罗洪先这本厚重的《广舆图》极受欢迎，直到清代的嘉庆年间仍被广为翻刻。《舆地图》和《广舆图》都采用科学的“画方”网格，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中国传统的绘画手法可能天生就适合画旅游图。抗倭名将戚继光调防首都北部的长城防线后，热爱温泉，亲自撰写了一篇《蓟门汤泉记》，并让人配了一幅精美的温泉旅游图，刻在六面石幢上。这幅明代的旅游地图以形象写实的手法表示了山河洞石、寺庙僧院、楼堂轩馆、桥亭碑表，以及高高耸立在山顶的长城。出于对军区最高长官的崇敬，长城被表示得特别高大突出，敌台、垛口、旌旗都历历在目。这幅一代名将撰文的旅游图至今仍矗立在河北遵化汤泉疗养院里。



明万历十二年（1584），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首次公开了带经纬网的汉字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18年后他又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创造了许多全新的中文地理术语：地球、赤道、尼罗河、大西洋、亚细亚……不过我相信许多中国人看见利玛窦的图，震撼之余一定会将目光盯住那个长有翅膀的“麒麟”：哦，原来这东西是真的有啊！还生在南极洲……

上图为清朝《坤舆万国全图》中所画的装饰动物之一：在南极大陆上有一只很像中国麒麟的有翅怪兽。

《坤舆万国全图》上，最吸引人眼球的恐怕不是南北两极和南北美洲，而是那些活泼的动物。海里有鲸、鲨、海狮等15种海洋动物，南极大陆上绘有8种陆上动物，其中有犀牛、大象、狮子、鸵鸟，以及一只很像中国麒麟的有翅怪兽。





上图为清代绢本彩绘《普陀梅檀林图》，描绘的是浙江定海著名佛教圣地。

清时地图绘制向现代科技大步迈进，但传统的国画式地图仍长盛不衰。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后，福建省绘制了《福建舆图》进呈皇宫。这幅绢底彩绘、金银绣制的煌煌巨图总面积达到56平方米，让人完全想不出它有何等使用价值。巨图采用传统绘图法制成，纳入了最新设置的台湾府，山山水水，看上去十分赏心悦目。

献礼工程往往精美绝伦。康熙南巡时河道官员进呈的黄河形势图，其实也就是一幅视角俯瞰、工笔重彩、气势磅礴的山水画卷。在这幅技法高超的《黄河图》上，山水、城镇、名胜古迹有名称注记，城镇之间的距离也偶有标注，因此也具有地图的功能。有趣的是，它怎么看怎么像一幅彻头彻尾的青绿山水。

《长江名胜图》绘于同治六年（1867），这幅地图用形象逼真的山水画表现手法描绘了长江两岸的风景名胜、文化古迹。它采用传统的"对景法"，也就是说你看北岸景物时是正的，很舒服、很直观，但此时南岸的景物全部底朝天，是倒的；如果你要再看南岸景色，那么请把长卷掉个个儿，或者自己走到桌子的另一边。这幅清雅秀丽的山水地图可以让你变成一个小人作"画中游"，充满了中国式的精致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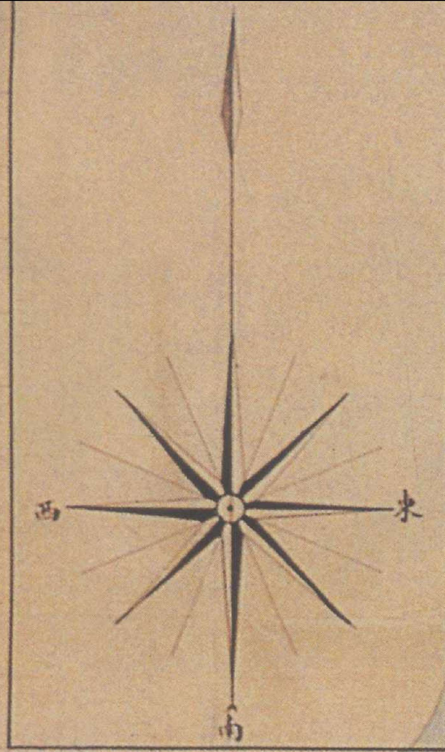
中国式精致趣味

清雅秀丽的山水地图可以让你变成一个小人作「画中游」，充满了中国式的精致趣味。

"对景法"有个问题，那就是地图到底该哪面朝上呢？在中国古地图中，这个问题一直让很多人困惑。放马滩秦代地图木板下边标了一个"上"字，提示你地图的正读方向，颇类似现代指示北方的那个"N"。不过很明显，许多中国古地图的上方不是北方，反而是南方，跟现代是倒过来的。专家推测说这是为迎合帝王"坐北朝南"的视角习惯，毕竟，古代地图许多都是供皇帝御览。但资深地图专家提出了有力的反驳，那就是：在中国还从来没有发现过南方朝上的全国地图。所有已知的全国总图统统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难道，全国总图不是给皇帝御览的吗？作为家天下的家长，全国总图恐怕恰恰是皇帝最爱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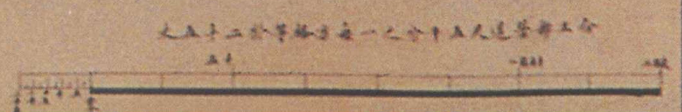
地图究竟该哪面朝上，或许反映了外国人喜欢讨论的中国式圆熟智慧：中国地图法无定法，哪面都可以朝上。一个城市的地图哪面在上，可能全凭你要从哪个城门进去。你要从东门入城，你就会看见东门和东门里的店铺是正的；你转90度面对南门，这时南门、以及南门里的一批景物也是正的……要从此岸看彼岸，那彼岸就在地图上方；而要从船上看两岸，那么你面对哪岸，哪岸景物就是正的，这就是"对景法"。所谓移步换景、因事赋形，甚至散点透视。圆熟的技术发乎自然、存乎一心，妙处难与君说。

责任编辑/刘睿　图片编辑/何亮　版式设计/许丽娟



五品藍翎營務處差委武高等學堂舊班工程優等畢業生湖北蒲圻縣丞余秉書







古地图里的科技

撰文/赵雪峰 于汐

在人们印象中，中国古代地图以形象感和美感很强的示意图居多，不具备精确反映地理地貌的科技手段。其实数学家的智慧、刻绘师的工艺、科学家的研发仪器、测量师的精确测量、指南针和造纸术的发明、印刷术的进步，在地图学家的精心创意与整合下曾创出无数杰作。

《萍乡县湘东镇峡山口地形截段图》为清光绪年间绘制的有等高线的大比例尺实测地形图。图上还绘有计里网格，图左下方用各种颜色符号标出图例。全图详实精确、工笔精细，现存于国家图书馆。



皇帝的仪仗行进在道路上，浩荡的队伍冠盖如云、鲜衣怒马。如果不特别留意，几乎听不到队列中还有一阵阵有规律的击鼓之声。声音是从一辆很不显眼的独辕车上发出来的，还有人跟在车旁忙碌地记录着什么。这辆车上站着两个憨态可掬的木人，一人司鼓，一人司钟，每走一段，木人就会有规律地敲鼓，有时又敲钟——仔细看又不是钟，而是钟状的铃铛，被称为“镯”。

皇帝出行归来，记录是：敲镯5次，击鼓7次。这意味着，皇帝此行往返的路程一共是57里……

精算距离——
推动机械学与数学

后来，这架精巧的装置被隆重载入中国古代机械发明史和中国地图学史。这种机械测量装置的雏形叫记道车，早在西汉就已经产生了，刘歆在《西京杂记》中作了相关记载。相传大科学家、机械天才张衡对记道车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计里鼓车”。

不在仪仗队效力的时候，计里鼓车执行了更多任务——测量王土、提供数据。架上一匹宝马，一天之内就可测量上百里路程，这让当时的地图绘制者得益很大。要知道，起初人们只能以步行丈量天下——传世的几件看似技巧成熟的秦汉时期的古地图，比如马王堆地图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的。而计里鼓车的出现大大拓展了测距范围，数据较以往更为精确，极大改变了单纯依靠步量的勘测技术的原始面貌，这些在《宋史·舆服志》中有详细记载。

计里鼓车，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厅的一隅，为此常常聚集来一群好奇的人，这架计里鼓车展品是根据北宋卢道隆的设计版本制作的。计里鼓车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改造，但在古代各朝的测绘工作中一直都有应用。它实际上是由一套复杂的齿轮组操纵的，车轮滚动分别带动控制鼓人和镯人的大、小平轮，根据平轮转动的周期来实现记录里程的需要，所以叫“记里鼓车”。它所利用的差速齿轮原理，早于西方1800多年。

细想来，地图是很神奇的：一个身处天地之内的人，何以表达天地呢？就我们所知，正是这种愿望催生了很多地图绘制工具，从大禹时代的“左准绳，右规矩”到计里鼓车，再到后世的牵星板、测杆等，其中很多甚至在现代社会仍有使用。而透过这些测绘工具还可以看出中国地图学所具有的科学背景。

测量的距离越来越准确，这又对计算方法的演进提出了高要求。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一本数学书——《周髀算经》应运而生，其成书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它用分数运算及勾股定理等数学方法阐述了“盖天说”。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制图的基础——“天圆地方”。大约同时成书的还有另外一本《九章算术》，书中明确提出了勾股定理以及某些解勾股形问题的方法，这就





使得后来测量有高度的地形变得容易。

测量工具和测量技术的改进使汉代的地图事业蓬勃发展，并在国家的各个领域得到体现：比如为了长期征战戍边的需要，李陵曾绘《北边图》呈于武帝。汉代还涌现了一些杰出的将军，他们同时也是绘图技术的优秀把握者，比如西汉昭帝时的张千秋，曾在霍光面前“画地成图”解说军事形势；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在光武帝面前“聚米为山谷，指划形势”。出于行政屯田需要的地图也层出不穷，朝廷还时常委派专门官员从事测绘工作。

古代测绘地图的最大的难点是面对高低不平的地势，如何能准确知道两地之间的实际距离呢？这有赖于三国时期产生的用于测算不能直接测量的距离、高程的“重差法”。重差法是依据相似直角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关系进行测量的理论和方法。三国时东吴赵爽为《周髀算经》作注时作日高图，其中首次提出“重差”理论。其实，据《史记》载，利用“相似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原理进行测量的活动，在夏禹时已经开展。禹使用准、绳、规、矩等简单工具，“平矩以准绳，偃矩以高望，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这便是利用该原理测算山高、水深等两点间距离。

魏晋时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也写了《重差》一卷附于该书之后（此卷后被单列出来，取名《海岛算经》）。他活用

上图绘制的是在行进时测量距离的机械装置——计里鼓车，也有人称它为大章车。它巧妙地利用了齿轮传动系统来记录行程，改变了以往丈量、步量的方式，成为远距离测量的重要工具。（绘图／武其文）左下是东汉武氏祠石室画像，刻有伏羲、女娲等形象，画面中规、矩的形象清晰可见，规、矩、准绳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测量工具。

“制图六体”与其说是理论，毋宁说更像一个工作框架，有了这个清晰的框架，测量绘制便更加有法可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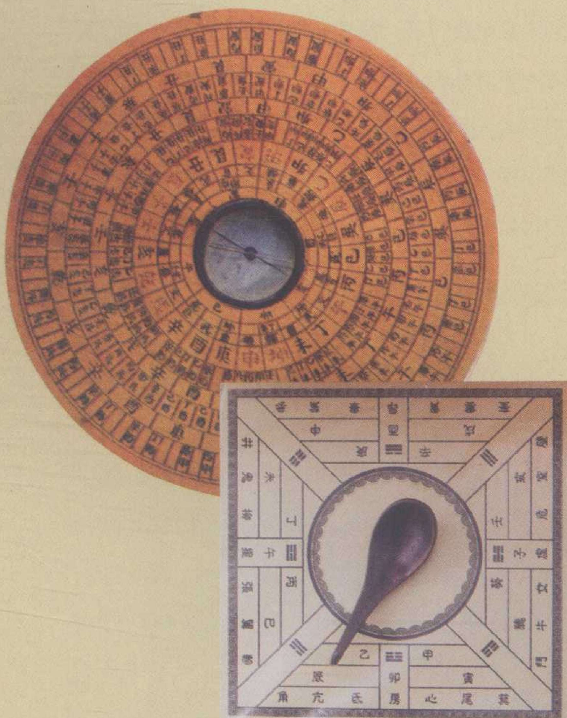
了重差理论，巧妙地提出了多种具体的测量和计算方法，人们据此就可以应对各种不能直接测量的具体情况了。

辨识方向——司南、罗盘与罗盘仪

无论在地球表面的什么地方，拿一根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它的正极总是指向北方，负极指向南方。我们的祖先掌握了这些知识，发明了最早的定向仪器——司南。司南，就是指南的意思，这种仪器就是人们在对磁石功能的认识基础上发明的。

用地图表示空间，总是离不开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原始时期的地图，方向总是以视觉角度而定的，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不过中国古代的第一张地图据说是在甲骨上刻画的《田猎图》，它就没有确定方向的概念。

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增大，对辨识方位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北宋时代，人们用薄铁叶裁成鱼形，然后用地磁场磁化法，使它带有磁性，行军中可随身携带，使用时，将其浮在水面，便可指南。后来，人们又用钢针经磁石摩擦磁化，真正的指南器也就诞生了。



由于不同时期指针形状不同，指南器的名称也各异，如指南鱼、指南龟、指南车、罗盘和罗经等，到13世纪时，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传到阿拉伯，进而在全世界广泛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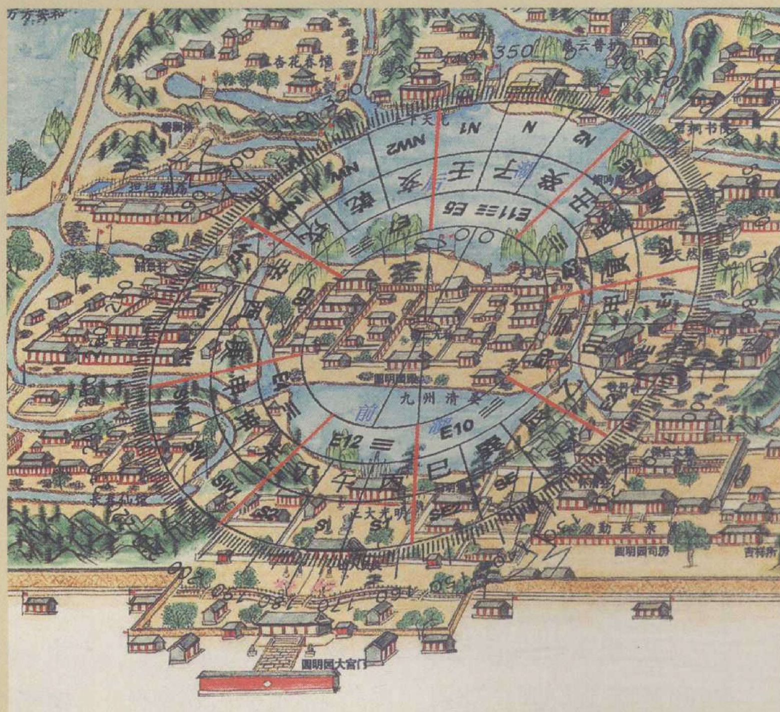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翻开相应时代的古地图，就会发现年代越晚的地图，对方向标注者越多，无论人们希望从什么角度去看待地图中所表述的事物，也总不忘记给读图者一个准确的方位指示，那些对中国的指南针奉若神明的西方航海图尤其如此。

和司南相比，罗盘是更加有中国特色的指南器，因为它原本是用来勘察风水的，所谓“测山川生成之纯爻，以辨其地之贵贱大小”。罗盘由位于盘中央的磁针和一系列同心圆圈组成，每一个圆圈都代表着中国古人对于他们所认知的宇宙系统的理解。

罗盘上一个圆周为360°，每15°为一个方位，这样罗盘便有了24个方位。这与《周易》中的八卦概念暗合，也和天干地支有关系。地球一年绕太阳转360度，即一年为360天，每15天一个节气，一年即二十四节气，所以罗盘的二十四分位又对应着二十四节气。中国古代地图中有一大门类就是堪舆地图，从上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罗盘在堪舆地图绘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但真正让指南器在测绘学上大显身手的还是清代以后。当人们对地球有了整体的认识，对于子午线测量、磁夹角计算有了迫切要求以后，罗盘慢慢也就发展成了罗盘仪。非常经典的“65式指南针”就是罗盘仪的一种，它能够测量直线的磁方位角或磁象限角，和它配合，





地图的绘制也进入了一个更加准确的时代。

制图六法——带给古地图的"标准化"

制图工具的革新与进步带给地图的影响，往往不及某一个制图理论的更新那样深远。

西晋时，中国第一个也是对后世最具影响力的制图理论诞生了——这就是裴秀提出"制图六体"。与其说它是理论，毋宁说更像一个工作框架，有了这个清晰的框架，测量绘制便更加有法可依。

"制图六体"对前代丰富的测绘经验进行了总结，它分别论述了比例、方位、距离、高程、地形等地图绘制所应具备的数学要素。这六方面要素是：

一、"分率"：面积、长宽比例；

二、"准望"：地物彼此之间的相互方位关系；

三、"道里"：道路里程；

四、"高下"：高低；

五、"方邪"：方斜；

六、"迂直"：曲直。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其实是测量距离时的具体操作原则：即逢高取下、逢方取邪、逢迂取直，即要保证两点间的距离是直线距离，不能因沟通两地的道路高低不平或迂回阻隔而影响到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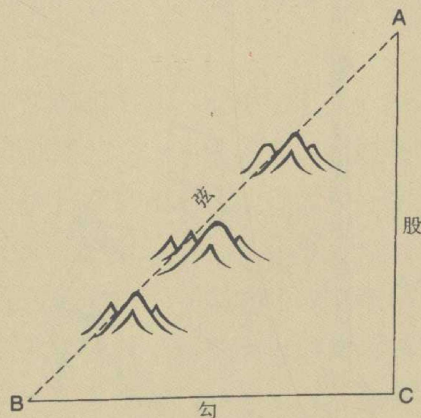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通过宋代沈括所提出的"飞鸟法"来理解这些理论，也就是：表达两地的距离，要取空中飞鸟的直线飞行距离。沈括在他绘制的全国地图集《守令图》时，仔细阐述了他的想法。有意思的是，前人留下来的"重差法"，恰恰为测定直线距离提供了完备的技术手段。

六体各项中前代唯一没有确立起来的即是"分率"——比例尺。此前的古地图，比如

上图可见圆明园盛时的布局图暗合风水学上的"九宫八卦"的宇宙图式，其实每座中国著名古建筑背后都有一份"堪舆地图"。左下的司南和罗盘是中国古代最常见的指南工具，罗盘还是重要的堪舆工具，它们在古地图的绘制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也为西方海图的大发展提供了帮助。

《放马滩地图》，虽然具备了比例概念，但7块图中只有3块大致呈现了比例，并且没有显示出如何操作、控制比例尺。因此，要贯彻"制图六体"，还需要一套易于掌握且行之有效的实现比例尺的方法。

于是裴秀提出了"计里画方"之法，即：



裴秀决定对角线距离的方法

纬度测定与天文技术密切相关，我国的天文学自古就非常发达，其中一项重要的科技成果就是牵星术。

绘图时，先在图上布满方格，方格边长代表实地里数，然后按方格绘制地图内容，以此保证一定的准确性。

裴秀既是此法的开创者，也是应用它的第一人。他首先把当时一幅用缣八十匹的“天下大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尺缩小为一丈见方的“方丈图”，查阅人“可以不下堂而知四方”，而又丝毫不损伤地图的完整性与内容的丰富性，仍能做到“备载名山都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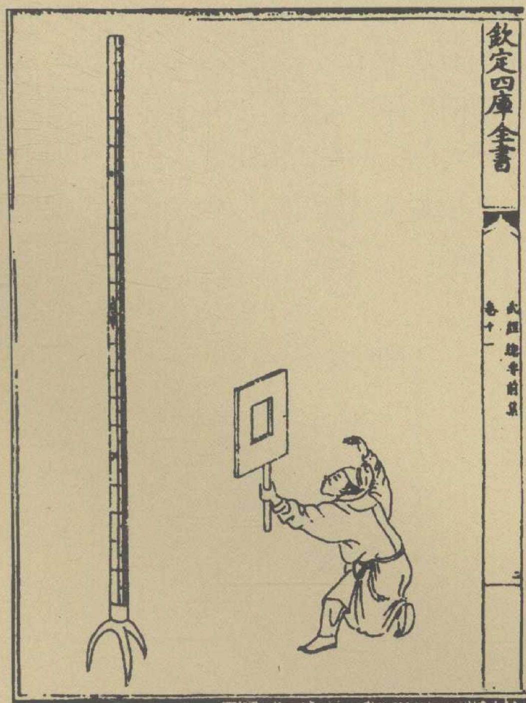
裴秀又对以往地理书图做了详尽考订，在此基础上绘制了18篇《禹贡地域图》，范围为全国，从古代的九州到西晋初年的十六州。这是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部历史地图集。隋朝建筑学家宇文恺曾提到裴秀此“舆图”采用了“二寸方千里”（约1：900万）的比例尺——这是中国古地图中最小的比例尺。可惜的是，裴秀所制地图因屡经战乱早已失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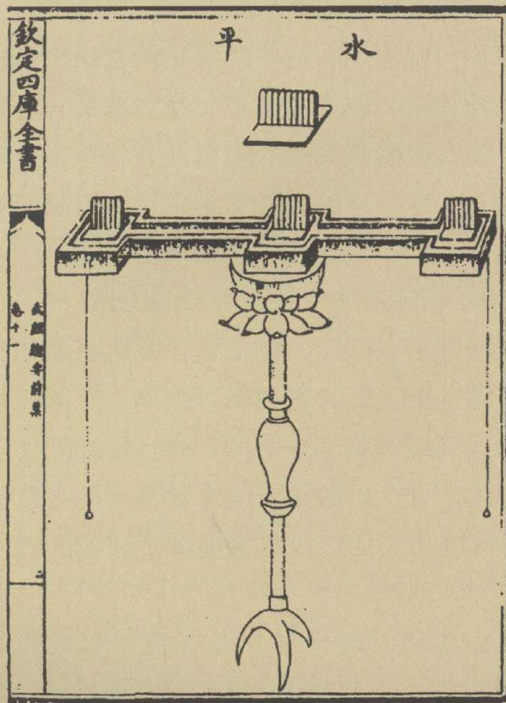
事实上，中国自西晋以后的地图绘制几乎都很注意依据裴秀的法则，影响所及直到清代。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从后世的地图中一窥裴秀之法的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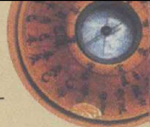
我在西安碑林见到过碑刻的《禹迹图》，那幅地图密布方格，其中横方70行，竖方73行，共计5110方格，比例尺也是每方折百里。而且《禹迹图》绘制精详，有政区名380个，标注名称的河流约80条，山脉70多座，湖泊5个，海岸线、河流的位置和形状也均较前代更胜一筹。这幅图代表了原始时期直至宋代为止，我国古地图绘制的最高水平，制图六体的要素也已全部实现。

测定纬度——牵星术、牵星板与中国海图

经纬度测量法纳入地图制作在我国说起来是很晚的事情，似乎直到明代、有了西方传教士的参与后，经纬度测定才被纳入到地图测绘科学体系中，但其实纬度测量的方法，在更早时候就已在中国产生。纬度测定与天文技术密







切相关，我国的天文学自古就非常发达，其中一项重要的科技成果就是牵星术。

牵星术直接说来是测量星辰地平高度的一种方法，借在不同地点观测同一颗星所得不同地平高度，又可推算出各地点的不同纬度。这一方法特别应用于航海定位中，进而在海图绘制中起作用。利用牵星术进行测量要使用一套大小不同的牵星板，它们可以看作是星盘的简易版。

对全世界地图学都有着重要意义的一幅地图——《郑和航海图》，在定位上就使用了“牵星术”，而且在许多关键的地方都标注了“牵星”数据，有的还注有一地到另一地的“更”数，以“更”来计量航海距离等，另外，图上还标明了航线即“针路”，所以后来的航线图也称“针路图”了。

而牵星板，据明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载，一副牵星板为长短不等的12块方板，最小的边长为2厘米，最大的边长为24厘米，上面标有从1指到12指的刻度。“指”是牵星板上的高度单位，为现在的1度54分即1.9度。其实早在秦汉时代，我国的天文观测中已经有了“指”的记载，而且它们所代表的角度量和后世著名的《郑和航海图》所反映的完全一致，都是一指等于1.9度。不过那时候的工具叫做“式盘”，通过观星，再与指南装置相结合，即可确定一个地点的方位——纬度的测定原理即是如此。可惜在那个时代这项重要发现没有在古地图的绘制中反映出来。“指”以下的单位为“角”，一角等于四分之一指。另有象牙制成的小方块，大约6厘米见方，四周缺刻，每一缺刻标明半指、半角、一角和三角等单位，与牵星板配合使用。观测的主体主要是北斗七星、南十字、天琴等星座。

唐《开元占经》中摘录的汉代著作《巫咸占》中记载有：金星和月亮纬度相去最远是五指。这项记录如果用现代方法核算，可以看出这个差数是9.4度，非常接近实际差度。我们可以推测的是这项测量结果一定依靠了某种类似于牵星板的工具，也使用了类似牵星法的测量技术。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国内外学者都认为牵星板和牵星法是阿拉伯人的发明，由是观之并非如此。



上图中描绘的是清代绘制地图的匠人工作的场面，左下图中是中国古代常用的测量器具——照版和水平。水平即水准器，用水上的浮标控制来测准水平。被测的目标是照版和度竿，用照版正中的方框部分覆在度竿刻度上，帮助辨认远处不容易看清的刻度。

元代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也是利用不同地点星辰的不同地平高度测算该地点纬度的，郭守敬测定了21座城市的纬度，误差多数在30分以内，最精确的分毫不差。

印刷术开启了西方制图的商业价值推广，这点与它在中国的命运极为不同，古地图在西方引发了公众对地图的普遍兴趣，甚至出现了地图出版社，地图的生产于是有了一个价值观上的全新动力。

手绘式微——造纸术、印刷术为古地图开拓道路

科技的参与，常常让地图的发展顷刻间天翻地覆。

回忆远古以来地图发展之路，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其载体的变化。例如至今发现的中国最早一幅地图兆域图，就是在铜板上刻就的。之后竹简、丝帛、木板……人们选择了各种各样的材质描绘这个世界，也用各种尺寸的地图来应付不同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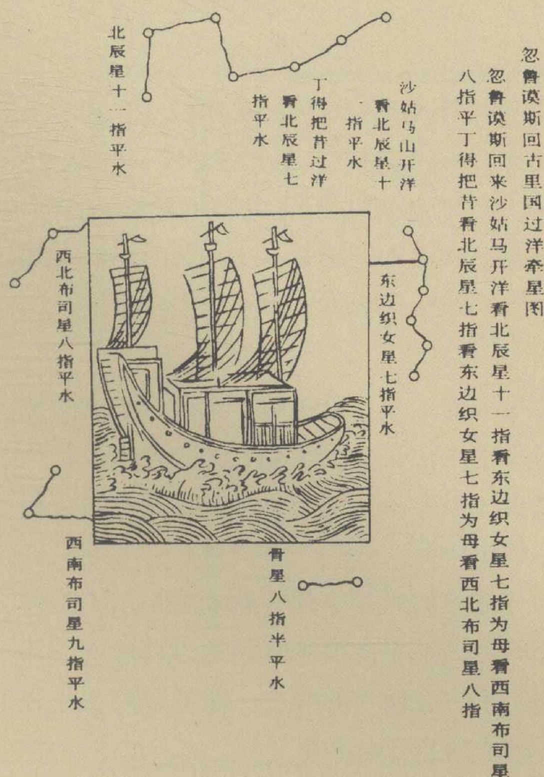
这些地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昂贵。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那时的地图必须以手工绘制，于是基本都是孤本。能留存下的就极少，直到宋朝。宋是地图留存的分水岭，其原因与当时地图石刻印刷术和纸张的普及应用有关。

造纸和印刷术的应用使制图者得以制作出更多更先进的地图。在制图过程中复制与修订极为重要，而借助印刷术，制图者们就可以更方便地交换信息，达到不断更新的目的。

宋代的碑刻地图是古地图的重要门类，碑刻地图虽然也颇为耗费时力，但利于地图的保存，好几种重要地图正因见于碑刻才流传至今，如《华夷图》、《禹迹图》、《九域守令图》、《舆地图》等。而和书籍类似的纸制地图，大量出现在造纸推广以后，公元1155年，我国第一幅印刷地图杨甲《六经图》问世。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印刷术在推进中国古地图绘制的同时，也带动了整个世界地图学的天翻地覆的改变。印刷术开启了西方制图的商业价值推广，这点与它在中国的命运极为不同，古地图在西方引发了公众对地图的普遍兴趣，甚至出现了地图出版社，地图的生产于是有了一个价值观上的全新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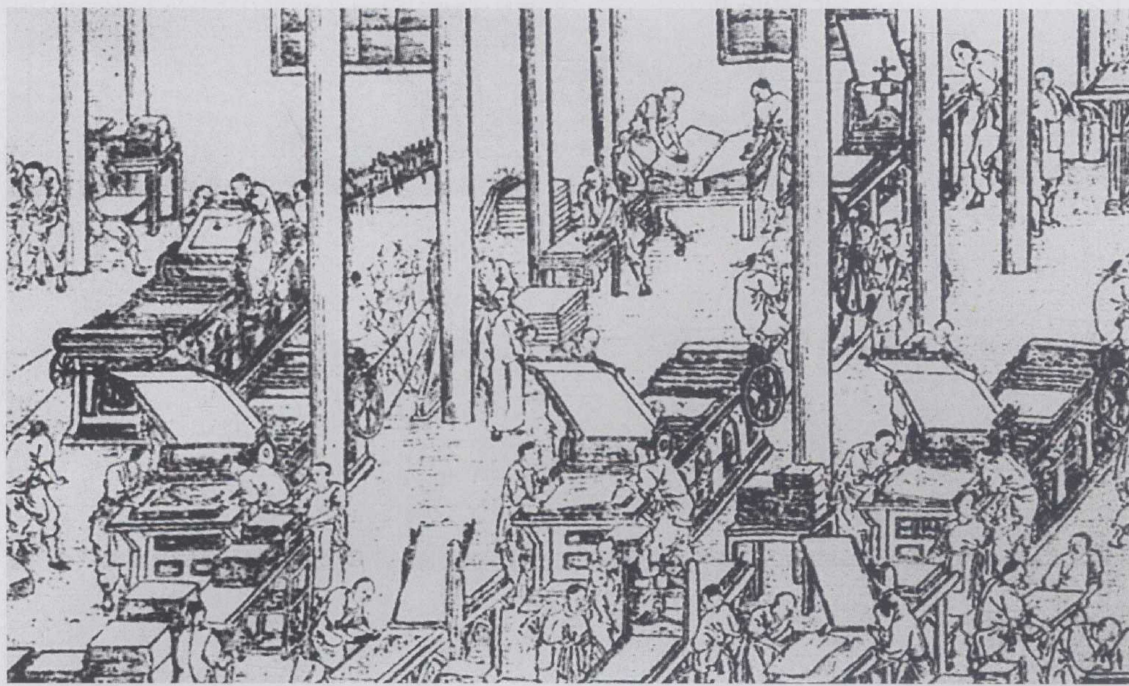
右上：点石斋印刷工工作场景。光绪十年（1884），英商在上海创办点石斋石印局，设址于偷鸡桥畔（今北京路浙江路口），购置石印全张机3部，采用照相石印方法印行经、史、子、集，以及中外舆图、西方书籍。



下：《郑和航海图》中不但标注了详尽的过洋牵星数据，还附有这幅过洋牵星图。郑和船队的天文航海术与汉代以来的占星法不同，已由海上对星象的占验发展为一整套“过洋牵星”的航海术。

全国堪舆——古地图最后的辉煌一击

公元1719年，清朝廷正式颁行了一幅举世闻名的《皇舆全览图》，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



郑重指出："这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清朝的确是中国古地图发展的最高峰时期，清朝辽阔的版图、强盛的国力和强大的中央集权为地图绘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明朝末年，利玛窦为中国带来了崭新的地图观，具有了"地球"这个观念、使用投影法绘制的现代中国地图遂在清朝悄然兴起。

众所周知，康熙皇帝喜爱科学，对地图测绘也尤其有兴趣，他甚至亲自主持了全国地图的测绘，还聘请了几名外国传教士白晋(J.Bouvet)、张诚（J. F. Gerbillon)、雷孝思(J. B. Regis)、杜德美(P. Jortoux)以及由传教士推荐的人选组成的规模庞大的测绘队分赴各省。

这次测绘活动运用"西洋法"进行堪测，而且如此大规模全国性测绘在当时也堪称"世界壮举"。到1718年，历时35年，测绘队完成了15省（包括台湾)的测量，以统一的经纬线斜交梯形投影法和统一的比例尺来绘制，当时的比例尺核算一千八百尺为一里，二百里合地球经线一度，也就是说，这幅图的比例尺为1∶1400000，将各省数据拼接在一起，成为巨制——《皇舆全览图》。

乾隆时期的《乾隆内府舆图》（"乾隆十三排图"），也使用了与《皇舆全览图》相同的测绘方法，对哈密以西地区进行了大量实测，并且主要由中国人负责，传教士为助手。乾隆图较康熙图范围更广阔，其铜版也留存至今。

至清代，先进的测绘技术、强大的人力和皇帝的重视，使地图绘制盛极一时，最终诞生了《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这样的集大成之作；而乾隆皇帝的去世，也带来中国古代地图测绘的急速衰落，随即便是整个国家的衰落。

中国古代地图的测绘往往是关乎天下的宏大行为，于是自帝王领袖的情怀始，至帝王领袖的情怀终；自华夏族勃兴始，至民族的风雨前夜终。

责任编辑/刘睿　图片编辑/何亮　版式设计/许丽娟



在哈尔滨收藏爱好者安胜利家中，保存着一幅长2米、宽 1.5米的象形中国地图，这幅地图1931年由哈尔滨北方商业石印局出版。地图中的标志物采用象形的人物、动物和实物图案。安胜利介绍，该图是他在哈尔滨一处旧物市场收集到的，像这样的象形地图在收藏市场上并不多见。



古地图 收藏 拍卖 历史无价

撰文／宁宵宵

同样是民初的《中国全图》
在纽约索斯比拍卖行以5万英镑的高价成交
而在中国北京却遭遇到了尴尬流拍
在玉器古玩动辄拍出天价的今天
为什么国内古地图交易却如此萎靡
古地图收藏的春天究竟何时才会到来



《中国全图》5万英镑的身价

北京琉璃厂东街看过去，一溜儿都是绿门红柱的仿古小楼，中国书店就在路口处。2007年11月的一天，秋季古籍善本的拍卖正在书店三层进行。狭小的空间摆满了发黄的图卷，其中并不起眼的一幅——1913年绘制的《中国全图》是这场拍卖的328号拍品。

“328号拍品，还有没有朋友感兴趣，请举牌。”拍卖师用带着问询的目光看着台下，又问了一遍。场内的人有的低头看着手中的图册，有的低声讨论着刚才成交的拍品，始终没有人响应他。就这样，刚刚展现在大家面前的《中国全图》，又被重新雪藏起来。拍卖场经过短暂的冷场之后，又因一本古书善本开拍而活跃起来，但没有人意识到他们刚才错过了什么。

走过了95个寒暑春秋的《中国全图》，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肚子里有说不尽的历史：图上的一处地名——“热”就是热河，那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比“热”更北的一大片土地当时是属于中央政府管辖的外蒙地区。

就在1913年，新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建制改革，撤销了“府”这个地方级别，改称为县，于是奉天府、济南府这样的地名便成了逝去的名字。然而，这些地名却留在了改革行政建制前印制的地图上，《中国全图》成为了改制前最后一张以旧地方级别标称的地图。无论从学术意义还是收藏价值上都极其珍贵。

令人感慨的是，还是这张191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中国全图》，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却被人高价争抢。据报道，1990年的伦敦索斯比拍卖行竞拍者热情空前高涨，被人带到海外的《中国全图》最终以5万英镑的高价卖出。我们不知道这位为它慷慨解囊的买家是否了解它身后沉甸甸的历史，能不能读懂它上面的中文？假如他的占有仅为了升值和猎奇，对《中国全图》来说，那真是一种难言的委屈。

中国古地图在世界收藏市场上可以说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留存至今的中国古地图存量总数尚不足1万种，约12万件，其中流失海外的竟有八分之一之多，它们主要集中在欧洲各国，近年来日本收藏者们也在加紧收购市面上的中国古地图。长此以往，不受国人待见的古地图是否都会流向海外？以致于有一天，我们又要以更高的价格来回购？



古地图里的无穷奥妙

不过，并非所有人对古地图都无动于衷。古地图鉴赏专家孙果清就是深受其浸淫者之一。在他眼里古地图有着无穷的魅力和奥妙。

“前门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这些老北京民谣讲述的是北京城老城门的特点。然而新北京建设日新月异，旧日风物一去千里，北京城的城门现在也没剩下几座了，小一辈的人们已经无法看到老北京城的样子了。

但是，幸运的是你可以从《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这样的老地图上看出民国初年北京城市的格局，那时的正阳门可不像现在这样是一座孤零零的城门楼子，而是一圈瓮城连接着箭楼的建筑群，在城楼与箭楼之南的护城河上有三座石拱桥，名为“正阳桥”。民谣里唱的五牌楼其实就是竖立在正阳门桥南的一座木牌楼，它是典型的“五间、六柱、五楼”柱出头式，正中写着“前门大街”4个大字。如此出人意料的细致和精巧，让孙果清深深喜欢上了民国时期的古地图。

每当改朝换代，地名和机构名称的更改是必然的。1912年民国政府迁都北京，新的变化使新的城市地图应运而生，还出现了很多新的地名，比如前门南边就新增了3条马路：福长街、禄长街、寿长街，给这座城市增添了几分新气象。接着，民国政府又相继把一些俗地名给改得文雅堂皇，这就跟孩子小时候起个贱名好养活，但是长大了就踅摸着自己给改个大号一样的道理，例如把哑巴胡同改为雅宝胡同，狗尾巴胡同改为高义博胡同。1913年袁世凯的办公处设在中南海，又把正门命名为新华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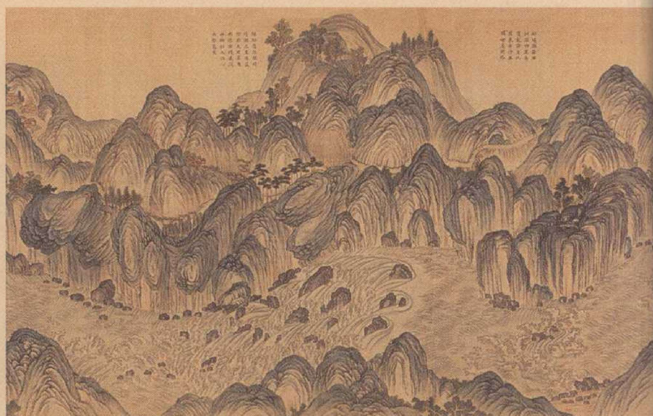
古地图其实是一个线索，根据它，我们可以与历史对话。孙果清说，从地图上看到的北京城是城市规划上的典范，仅从那些分门别类的市场以及它们各自所处的位置和功能搭配来说，就令我们对自己民族曾经拥有的建筑智慧感到骄傲。比如我们熟悉的花市大街、缸瓦市、米市大街、珠宝市街、菜市口、灯市口、东晓市等等，每当我路经这些地方，以往在古地图上读到的关于它们的故事就历历在目。古地图没有明码标价，它也无法标价，你能给历史标价吗？

如果说孙果清的感受代表的是知识界对古地图价值的认知，一位前往意大利旅游的王小姐在她的旅游日记里表达的，则正是普通国人在祖先绘制的地图面前的另一种情感。在旅游即将结束的那天，王小姐路过当地一家博物馆，本想进去随便看看的她却被眼前的展览震惊了。那是意大利地理协会收藏至今的200余幅明清以来手绘或刻印的中国地图，以及400余幅国内罕见的清乾隆、嘉庆年间绘制的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地图，其中最独特的是上面配有当地生

左上：宫廷秘藏《清西陵图》将于2008年4月下旬由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举槌拍卖。 供图／孙果清

下：1936年由一位外国人绘制的《老北京风俗地图》引起了书店读者浓厚的兴趣。 摄影／陈晓根







此图为创出古地图拍卖最高记录的《金沙江全图》局部，体现了古地图绘画艺术和制图技艺的高超水平，是官绘古地图、山水画地图的代表作。描绘了金沙江水流及两岸山川、建筑、人物、牲畜、各滩口的地貌特征，还附有疏理整治的意见，将自然山水和疏浚工程图两者巧妙结合。供图／中国嘉德

活习俗、民族服饰的图说，包括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和线索。王小姐从小生长在云南昆明，一直对当地的民族文化情有独钟，然而自以为很了解家乡的她却在意大利的这家博物馆里落泪了："在我家乡的那张小图里，画着穿着白族服装的人们在欢快舞蹈，他们平和的表情穿越了百年历史，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的面前，那一瞬间我像是找到了自己的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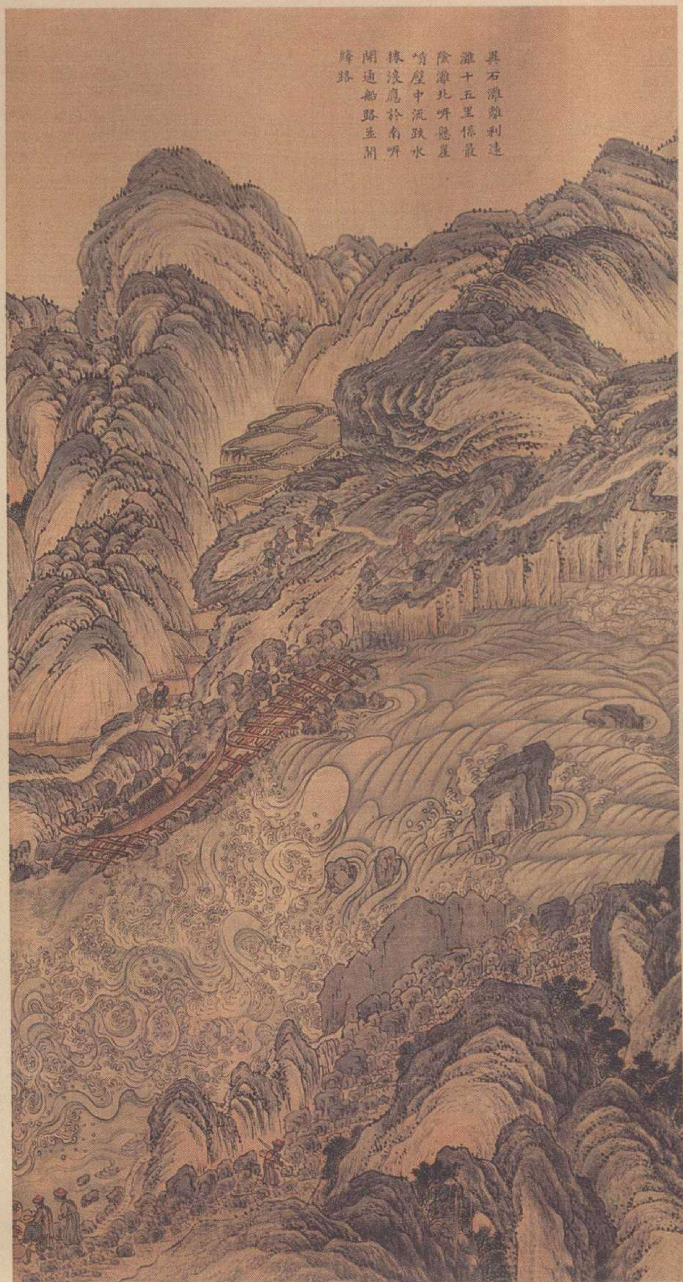
古地图的春天来了吗？

历史上的中国地图，它的命运还与当时国运紧密相关。唐宋时期，随着东边邻国向中国学习文化的风潮，地图不断传入日本、朝鲜。1555年刻印于福建省的《古今形胜之图》很可能也是在西班牙航海时代被带出的，成为最早流入欧洲的中国古地图。在朝代的更迭中，人









们不敢轻易收藏古地图，还有的地图因战乱流离而遭到破坏，这使得当年流散出去的古地图相继成为世界仅存的孤本。

而明清时期，中国地图的流出则越来越多地与殖民活动纠结在一起。自从西方殖民者把目光投向中国，一切和地图有关的活动便带上了民族和政治意味，一大批身份为传教士、商人、探险者、外交官等等的先遣部队搜罗了一大批清朝地方军事营汛舆图，还有官绘本甚至是宫绘本这类属于国家机密的资料。1840年之后的一段时期是古地图的主要流失期。

1974年，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举办的中国、日本地图展上展示了数十幅中国古地图，一幅《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是明代刻本的孤本，在国内别说普通爱好者，就连很多专家都从未见识过。

早在海王村拍卖行找孙果清鉴定《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的价值时，孙先生就反复强调，这幅图如果流出海外就太可惜了。这是清政府灭亡后的第一幅北京城全图，技术上采用的是当时最高水准的六色套印并石刻印刷，当年的测量官绘地图仅供部分机关使用，印刷量

小，经年战乱，保存下来品相好的实属不易。正是这样一幅地图，在2001年秋季书刊拍卖会上曾以5500元成交，而在2007年中国书店的这次秋拍上，最终被外国收藏者以2．42万元收得。拍槌落下时，孙果清难过得不忍心多看一眼。太多伤心的往事，让孙先生后来都不愿再多读古地图。但是，还古地图一个公道的日子似乎终于到来了。

2006年6月3日，嘉德2006年春拍古籍善本专场的大厅里一片掌声，山水画地图《金沙江全图》终以280万元落槌，创造了古地图拍卖的最高纪录。这幅图是乾隆时期为修浚金沙江通川河道所绘，上面除了水利设施的地点，还能清楚地看到淘金和交通运输的劳动场景。全图彩色绢质，共五卷，长74米，现场需要四五位工人才能抬动，现在世界上仅存两幅。“这幅图为什么好卖，就因为它既是地图，更是山水画，而且外行人看来像画比较多一点”。孙果清向我们解释道，《金沙江全图》掀起的高潮并不能掩盖古地图拍卖整体的冷清。孙先生不像我们一样乐观，不过我们仍充满期待。

2008年4月下旬，3幅古地图将在中国书店的春季拍卖中亮相。两幅是宫廷秘藏的《清东陵图》和《清西陵图》，另外还有海外回流的清内务府彩色官绘本《（康雍乾）御治江南黄、运、河湖，堤埽、闸坝工程盛绩图》。

现代人喜欢看清宫戏，里面关于皇室丧葬陵寝的情节常让人浮想联翩，你可以在这两幅清陵图里寻觅一些真相，比如雍正为什么打破“子随父葬”的“昭穆之制”离开东陵而再建一座西陵？陵区四周的青红界桩到底有什么说法？再看那幅水利图，它不仅出自官方之手，更是大清内务府藏品，其篇幅之阔、内容之丰富、绘画之精细、色彩之艳丽、贴签量之大无论在国内外都属凤毛麟角。谁将得到它们？谁有幸走进古地图的世界？我们等待着。

责任编辑／刘睿　图片编辑／杨剑坤　版式设计／杨东海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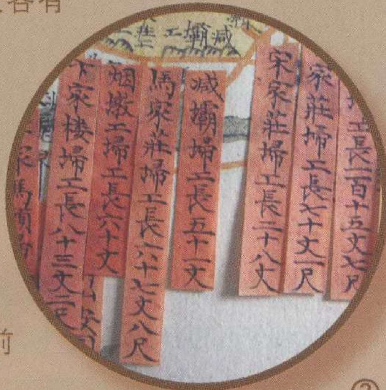
中国古地图的鉴赏

撰文／孙果清

中国各朝代古地图的风格有很大差别，其鉴赏方法主要是目鉴和考证，“鉴考并用，鉴中有考，考中有鉴”。

◎ 各朝代古地图的特点

中国各朝代古地图共同点在于：无论全国地图、分省图，或府、州、县地图，又或是专题地图，图中所绘的山脉、河流、城镇、军营、祠堂庙宇、宝塔石桥以及各类植物等地形地物，均用形象逼真的手法表示，而在绘画手法、地图标记、质地等方面又各有不同之处。



②

宋代古地图除了古籍中的插图以外，多为石刻；元、明、清三代的古地图则大多为绢本或纸本，清初以前绢本比例很大。

明代至清乾隆年间地图多采用青绿色调，河流、湖泊、海洋大都绘有水波纹（如图3），整体立体感较强，似山水画。而清乾嘉年间以后，地图中地形地物表现手法上趋向于符号法，色彩也较为浅淡，河流、海洋大都不绘水波纹。

宋、元、明时期地图上的名称标记，大都标注于圆圈或方块中，而进入清代以后，则大量出现贴签注记的特殊表现形式。

小，经年战乱，保存下来品相好的实属不易。正是这样一幅地图，在2001年秋季书刊拍卖会上曾以5500元成交，而在2007年中国书店的这次秋拍上，最终被外国收藏者以2．42万元收得。拍槌落下时，孙果清难过得不忍心多看一眼。太多伤心的往事，让孙先生后来都不愿再多读古地图。但是，还古地图一个公道的日子似乎终于到来了。

2006年6月3日，嘉德2006年春拍古籍善本专场的大厅里一片掌声，山水画地图《金沙江全图》终以280万元落槌，创造了古地图拍卖的最高纪录。这幅图是乾隆时期为修浚金沙江通川河道所绘，上面除了水利设施的地点，还能清楚地看到淘金和交通运输的劳动场景。全图彩色绢质，共五卷，长74米，现场需要四五位工人才能抬动，现在世界上仅存两幅。“这幅图为什么好卖，就因为它既是地图，更是山水画，而且外行人看来像画比较多一点”。孙果清向我们解释道，《金沙江全图》掀起的高潮并不能掩盖古地图拍卖整体的冷清。孙先生不像我们一样乐观，不过我们仍充满期待。

2008年4月下旬，3幅古地图将在中国书店的春季拍卖中亮相。两幅是宫廷秘藏的《清东陵图》和《清西陵图》，另外还有海外回流的清内务府彩色官绘本《（康雍乾）御治江南黄、运、河湖，堤埽、闸坝工程盛绩图》。

现代人喜欢看清宫戏，里面关于皇室丧葬陵寝的情节常让人浮想联翩，你可以在这两幅清陵图里寻觅一些真相，比如雍正为什么打破“子随父葬”的“昭穆之制”离开东陵而再建一座西陵？陵区四周的青红界桩到底有什么说法？再看那幅水利图，它不仅出自官方之手，更是大清内务府藏品，其篇幅之阔、内容之丰富、绘画之精细、色彩之艳丽、贴签量之大无论在国内外都属凤毛麟角。谁将得到它们？谁有幸走进古地图的世界？我们等待着。

责任编辑/刘睿　图片编辑/杨剑坤　版式设计/杨东海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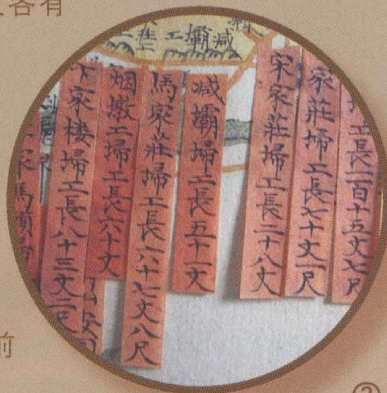
中国古地图的鉴赏

撰文/孙果清

中国各朝代古地图的风格有很大差别，其鉴赏方法主要是目鉴和考证，“鉴考并用，鉴中有考，考中有鉴”。

◎ 各朝代古地图的特点

中国各朝代古地图共同点在于：无论全国地图、分省图，或府、州、县地图，又或是专题地图，图中所绘的山脉、河流、城镇、军营、祠堂庙宇、宝塔石桥以及各类植物等地形地物，均用形象逼真的手法表示，而在绘画手法、地图标记、质地等方面又各有不同之处。



②

宋代古地图除了古籍中的插图以外，多为石刻；元、明、清三代的古地图则大多为绢本或纸本，清初以前绢本比例很大。

明代至清乾隆年间地图多采用青绿色调，河流、湖泊、海洋大都绘有水波纹（如图3），整体立体感较强，似山水画。而清乾嘉年间以后，地图中地形地物表现手法上趋向于符号法，色彩也较为浅淡，河流、海洋大都不绘水波纹。

宋、元、明时期地图上的名称标记，大都标注于圆圈或方块中，而进入清代以后，则大量出现贴签注记的特殊表现形式。

◎地图鉴赏方法

鉴赏一件古地图作品，往往首先是要通过比较不同时期古地图特点，来断定它的大体朝代，如：宋代地图多为石刻；元代地图名称注记均有框；明代地图多为重彩图等。

朝代确定后，就可以进行进一步断代，其基本方法有五：其一，利用历代行政建置表，根据府、州、厅、县、卫、所等建置变化来确定成图年代；其二，利用中国封建社会的避讳制度，审查地图中是否有因避讳而改写或缺笔的文字，来判断地图绘画年代的上下限；其三，利用水利工程建造年代等资料，基本可以确定明清两代绘有黄河、运河内容的古地图的具体年代；其四，利用政府衙署、学府、书院、王宫府第、祠堂庙宇、街巷名称等建置，判断府、州、县城池地图；其五，利用亭台楼阁、陵寝等建筑，考证园林和陵园地图。

另外，古地图所用的绢、纸在不同时期质地有异；装裱的形式、用料、幅面、格式也有差别，这些同样是鉴定古地图的必要线索。

◎绘本鉴赏三忌

历代书画皆有真伪问题，而古代地图则只有原绘本和临摹本之别。这是因为中国书画的赝品，大多出自造伪者欲取暴利之心，而地图临摹本则如同抄书一样，仅为使用或收藏资料，较长时间后才会成为艺术作品或文物。

尽管如此，鉴赏时仍存在三忌：

其一，不可将所有绘本看成原绘本或孤本。例如：清嘉庆时期地图《黄河穿运入海图》，现存世9份，均系彩绘。经鉴定，其中两份为原绘本，两份为副本，余者为摹绘本。原绘本上贴有红签、字体工整、绘画精细，是典型的官绘本，而摹绘本的绘画则稍有逊色，或有错漏倒误之处；或字体大小不一；或出现简化字等。总之，不可见到彩绘本地图就认为是孤本或原绘本。

其二，不可将粗糙的绘本地图看成初稿本。古地图摹本的绘画人完全可以依葫芦画瓢，因此，仅仅据地图内容鉴定其绘制年代，往往不准确，此时要用不同时期绘画风格、特色、质地、色彩等综合方法加以鉴定(如图1)。

其三，官绘本与民绘本绝然不同。官绘本大都深藏内府，密不示人(如图4)。到清末民初时，有些内府藏品流出宫外，开始有少量摹本出现，绘画质量大为逊色，远不及官绘本之精美。



③

官绘本可分为以下几类：

国家疆域地理图：作者大都为兵部职方官员，利用官府地理资料每年修订绘制而成。

军用地图：多为驻边官员运筹军事防御而绘制的边防图、江防图、海疆图等。图中内容详绘边防、江防险要之处、兵力部署、营房或炮台分布等(如图5)，常常配有“图说”形式，呈报朝廷的地图常在图上贴注黄色标签。

各府州县地图：多为地方官员绘制，其内容大体采用形象画法来描绘，内容为其境内山川、道路、桥渡、村镇和庙宇等分布情况。

水利工程图：内容多为黄河、运河及河流、湖泊、海塘等水利工程情况，通常详细标出河堤、围堰、闸、桥、引河等治河工程，以及城镇村落，这类地图往往贴有红色标签(如图2)。

帝王园林行宫、陵寝地图：这些地图是帝王每次出巡前，沿途官员按要求将所要经过之处和驻跸地点绘画成图。陵寝图则采用山水画绘法，突出风水宝地环境，这类地图一律贴黄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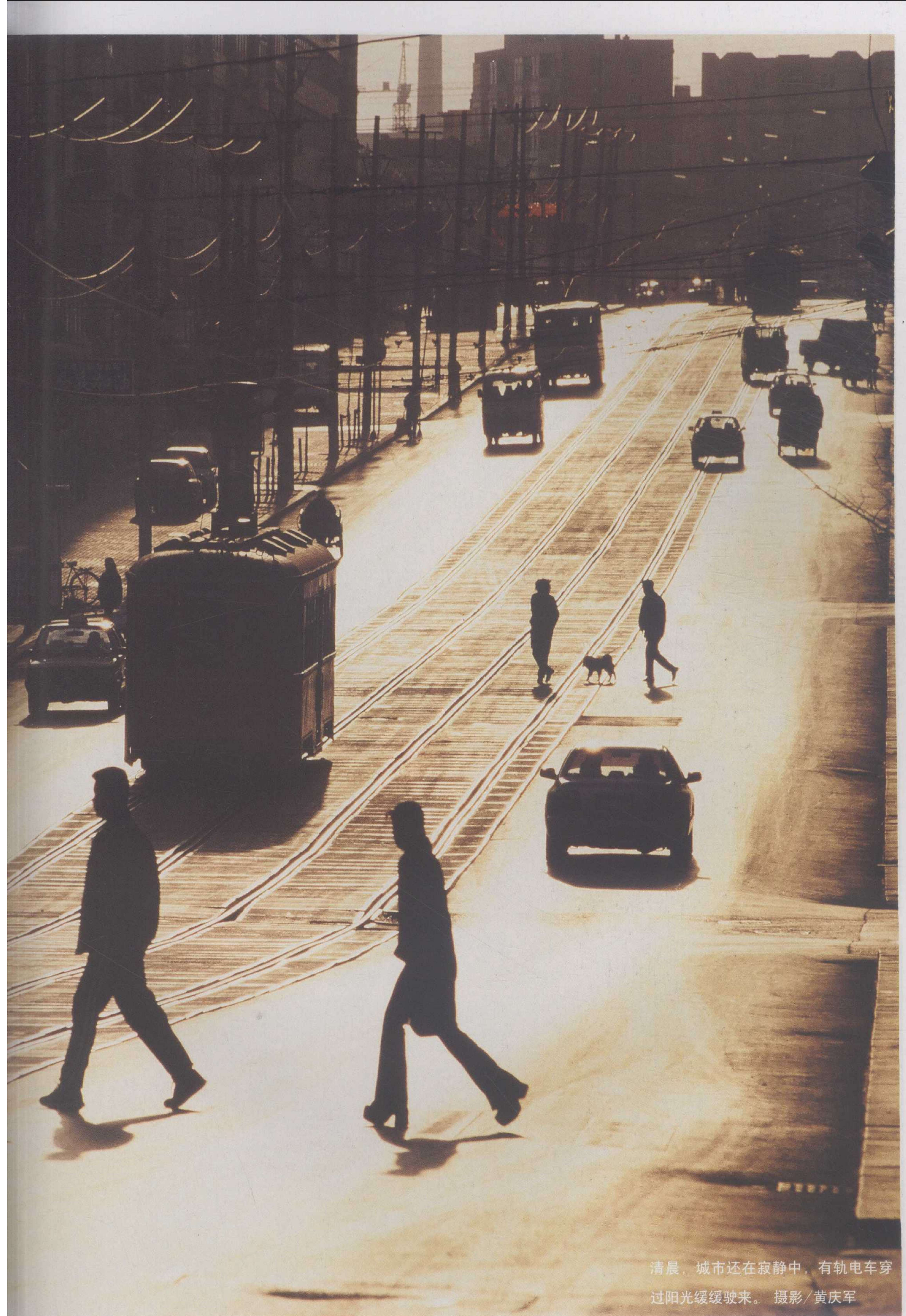


④ 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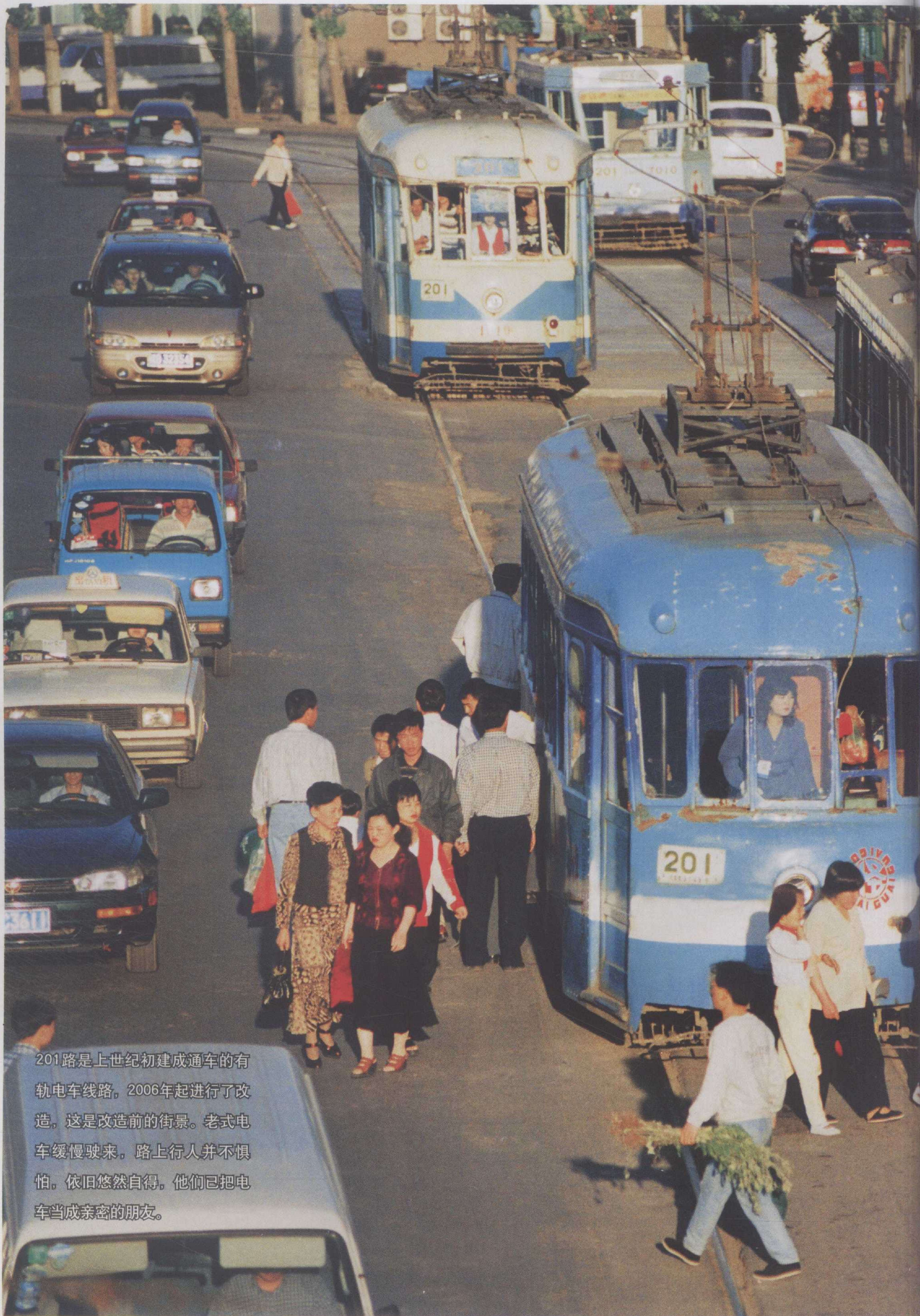
大连有轨电车摇过的百年

撰文／王春燕 摄影／汤亚辉等

不是每个城市都拥有这样的经历：有轨电车第一个唱响天亮的声音，又最后一个拉下城市沉睡的帐幕；不是每个城市都拥有这样的风景：拉响汽笛的有轨电车司机，是清一色英姿飒爽的巾帼倩影；不是每个城市都拥有这样的历史：作为流动百年的城市风景，有轨电车延展出浪漫大连的历史文脉；不是每个城市都拥有这样的成绩：在全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大连保留有轨电车的线路最多最长。



清晨，城市还在寂静中，有轨电车穿过阳光缓缓驶来。 摄影/黄庆军



201路是上世纪初建成通车的有轨电车线路，2006年起进行了改造，这是改造前的街景。老式电车缓慢驶来，路上行人并不惧怕，依旧悠然自得，他们已把电车当成亲密的朋友。


5011
Coca-Cola
冰淇淋



中国最早的有轨电车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之后的发展中，有轨电车曾是国内许多城市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但随着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和车辆增多，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许多大城市陆续拆除有轨电车线路。而在大连，从1909年有轨电车驶上这座城市的道路以来，它一直被作为一种环保、节能的交通工具被保留下来，直到今天。那摇摆的电车从遥远的1909缓缓而来，划过百年的沧桑轨迹，它的节奏依然保持不变的缓慢，那古朴悠然的身姿背后，是一段延伸开来的关于大连的城市往事……

咣当声 见证一座城市的记忆

1881年，发明世界上第一台有轨电车的德国人冯·西门子做梦也不会想到，28年后，他的智慧开启了东方一座新兴城市崭新的历史。

1909年9月25日，当第一辆有轨电车缓缓驶过大连街头，伴随着电车行驶时发出的“咣当”声，继天津（1906年）、上海（1908年）之后，中国第三条、也是东北第一条有轨电车系统诞生了。大连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从此拉开历史帷幕，它的轨迹几乎与这座城市的发展史重合，成为大连早期城市形态形成的推动力。

1899年，大连开埠建市，赢得日俄战争的日本人为了巩固其在“南满”的统治，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规模实施了城市“电气铁道”筹建计划。继第一条从电气游园(今裕景商城)至大栈桥（今码头）全长2.45公里的有轨电车后，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大连共开通10条有轨电车线路，总长约32.7公里，车辆百余台，形成较完整的有轨电车线网，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城市交通工具。

在80岁以上老大连人的记忆里，电车有白牌车和红牌车的区别，白牌车干净、舒适，乘客多数是日本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中国劳工不允许上这样的“好车”，他们只能乘坐挂红牌的“破车”。曾经，老大连人把日本人带来的这个新奇的庞然大物叫做“美国大木笼子”，因为第一批行驶在大连街头的37辆电车，车身为木结构，由美国制造，而实际上，它的底盘是英国造，电气部分则是德国造。这种由三个国家的技术拼凑起来的电车，被日本人应用在他们的殖民统治中。今年80岁的陈玉兰老人告诉笔者：“解放前的大连街上，除了电车，就是人拉的两个轮子的‘东洋车’和能坐三四个人的马车，但后两者比较贵，一般人坐不起。”

近百年来，有轨电车那律动有序的“咣当”声如摇篮曲般让大连进入梦乡；每天，又准时将全城唤醒　有轨电车已驶在了大连人的感情世界里。

1945年，大连街头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日本人的哭声——他们投降了。随着日本人的离去，大连的有轨电车遭到瘫痪性的摧毁：运营线路只剩下3条，百余台车辆仅有10台还可勉强使用。但战败的日本人没有想到，由他们带来的有轨电车早已与大连人结下深厚的情缘，残暴的破坏不但没能割断这股情脉，反而燃起了更加炽烈的重建热情。在之后的30年岁月里，大连电车迎来了发展史上的巅峰期。

左：坐有轨电车，是大连人生活的一部分。平时上下班坐它，节假日出去逛街也坐它，许多孩子也在电车中长大。下：坐上有轨电车，慢慢驶过这座城市，看着车窗外掠过的风景，从各种风格的欧式建筑到旧式厂房，再到高楼林立的市中心，这一路，其实就是大连百年历史的见证。







有轨电车每天顽强地实现着
它的使用价值，也为现代都市人平添
一份新奇、一份古朴、一份怀旧的情愫。

上：经过改造的仿古电车正前方都安装了一个大铃铛，车在行驶过程中会发出清脆的铃声，这叮当声让笨重的电车充满了灵气。上右图为电车驾驶室里的铜质操纵器，已经被司机摸得发亮，上面还可看到“接串”、“并接”等提示语。

右：仿古电车车身为木质结构，车内的铜扶杆、木座椅，完全是老电车的风貌。车顶上的工艺仿古灯，由以前的圆形换成了六角形，装饰性更强。车厢虽然是仿古的，但也增加了不少现代化的设施，比如车上的移动电视系统，就吸引了众多乘车人的目光。乘客在这既古典又现代的车厢里享受着时光穿梭的快乐。

1946年4月1日，政府从日本人手里接管了大连都市交通会社，并更名为大连市交通公司，有轨电车从此获得新生。加紧修复有轨电车恢复运营，成为当时大连市交通公司的首要工作。至1949年，大连市内6条有轨电车线路上共有车辆105台，日客运量10万多人次。

1949年前，大连交通公司电车工厂仅能修理有轨电车。它的前身是建造于1909年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电车修理工场。这个占地约7000平方米的修理场只能负担有轨电车的维修和装配。日本人拿来主义的建设方法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智慧的大连人创造出奇迹，经过广大电车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终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自行生产的有轨电车。

1951年国庆，大连电车工厂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1000型新式有轨电车，向年轻的共和国献上一份划时代的厚礼，大连的电车工人无比激动地向毛主席发出致敬的贺电。从此，新中国电车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自强不息的大连人为此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大连有轨电车发展的巅峰时期，最多时建有线路11条，总长48.9公里，车辆144台，职工5000余人，日均客运量45.33万人次。有轨电车成为当时市民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到了70年代，大连开始大规模拆除有轨电车线路，曾经称霸街头的有轨电车遭遇到时代的挑战。人口增长了，汽车客运发展了，城市交通压力变大了，而时代的脚步却更快了。一向稳重忠诚的有轨电车因为没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被人们挑起了毛病：速度太慢、占道太

多、噪音太大。有轨电车在城市交通中的作用渐渐屈居劣势，因此，很多城市纷纷取消了有轨电车系统，而大连也相继拆除了部分线路。到1977年时，大连保留了3条有轨电车线路。这3条线路首尾相连，从东到西贯穿了整个市中心，全长15公里。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多么富有智慧的保留，它不仅尊重了老大连人的过去，也为新一代大连人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岁月变迁，如今有轨电车的周围已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惟独电车依旧。它简直成了一尊流动的雕塑，无声无息，却浑身散发着历史的美与沧桑。

百年遗存 展现独特价值

电车的出现，是近代工业文明的成果。它是一种由直流架空触线供电，由牵引电动机驱动的客运车辆。电车又分有轨和无轨两种。有轨电车是利用铁轨来承担车身的重量，因为以前的车厢是火车车厢改装的，所以铁轨也用得很粗，称为重轨。后来改进了转向架和刹车装置，减轻了车身重量，重轨改为了轻轨，也就是现在有轨电车的铁轨。有轨电车的电动机有无级变速功能，所以电车上没有变速箱和排档，只要加大电流就可以提速，不过一般的速度为每小时15公里。车行速度之慢，有时甚至比不过自行车，但这也正是有轨电车的可爱之处，让行人在它面前没有畏惧感，明知道电车就在身后，还大摇大摆地从它面前穿过。所以乘坐有轨电车的人，都应该是不着急赶路的人，有心情欣赏窗外的风景。

有人认为有轨电车是一种笨重落后的交通工具，这是一种误解。

就载客能力而论，除地铁外有轨电车让几乎所有的地面交通工具都甘拜下风。然而，有





轨电车最大优越性还在于它是“零排放”的节能环保交通工具，因为它是以电力来做推动，车辆没有任何废气废水排放，对路面的损伤程度也很低。同时，有轨电车还有一个优势是几乎不会堵车，其专用路轨就在路中央，其他机动车道在其两旁，互不影响。

对于中型城市来说，有轨电车是实用廉价的选择。因为无需在地下挖掘隧道，1公里有轨电车线所需的投资只是1公里地下铁路的三分之一。而相较其他路面交通工具，有轨电车会更有效地减少交通意外的比率。由于电车车身的电动机采用反向电流刹车，正向电流启动，所以有轨电车乘坐起来也比较平稳。

目前，大连203路上行驶的3000型有轨电车均为1935年至1938年期间，由日本铁道车辆制造企业制造生产的，是当今世界仍在服役的最古老的有轨电车之一。3000型有轨电车在电车技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世界上第一代有轨电车的代表。

在全球为数不多仍保留这类“古董”的城市中，有轨电车不但每天顽强地实现着它的使用价值，而且更多地体现出它旅游观赏的文化价值，为现代都市人平添一份新奇、一份古朴、一份怀旧的情愫。

为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和保护大连市特有的电车文化，大连市公交集团决定长期保留16台3000型有轨电车。据介绍，为保证舒适度和安全性能，被保留的3000型有轨电车经过了内部改造，升级为“仿古电车”。改造后的仿古电车采用传统技术工艺和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办法，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外观和内饰风格，再现传统有轨电车的古典风貌。设计上均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轨电车为蓝本，如所有木质装饰都采用了实木，所有的

大连203路上行驶的3000型有轨电车

由当年日本企业制造生产，是当今世界仍在服役的最古老的有轨电车之一，在电车技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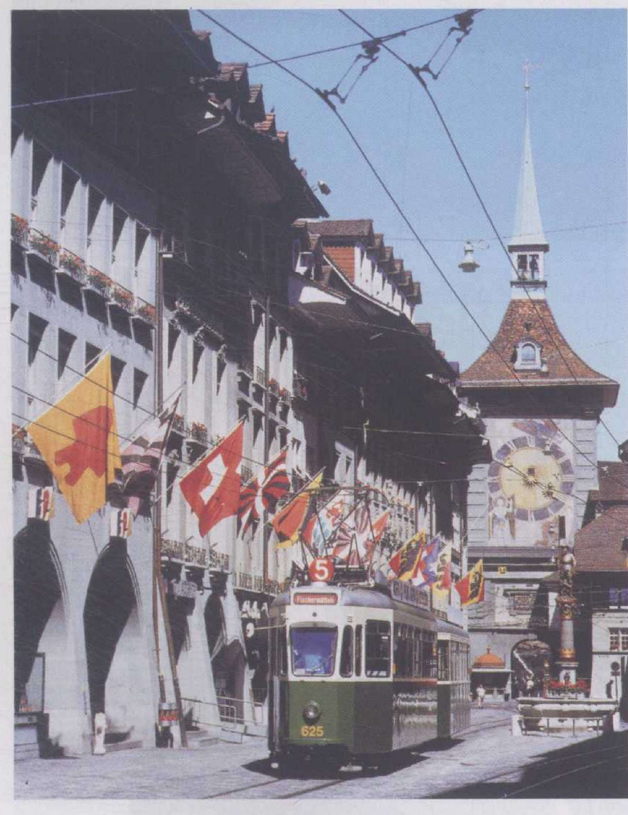
金属零件都采用了铜质。而车体内的动力装置又全都采用了现代技术和新材料。同时，通过对电机电器设备的整修和改造，使电车达到必要的安全和运营技术条件。老式3000型有轨电车的车窗安装的都是普通的平板玻璃，车行驶过程中不但产生噪音，而且破碎后对乘客容易造成危险。改造后的新3000型仿古电车的玻璃全部采用钢化绿色防紫外线玻璃，玻璃和窗框完全粘合在一起，这样不但没了噪音，安全性能也大大提高。最有趣儿的是仿古车上都挂着铃铛，叮叮当当地一路响来，让铃铛发出悦耳之声的机关就在司机脚下的一个踏板处，司机踩一下踏板，铃铛便会唱歌。整个车像蚯蚓一样不分头尾，车的两头有着同样的操作装置，当车子开到终点站，司机走到车尾，于是车尾变车头，又开回去了。仿古电车这样的行进方式，别有一番情趣，也颇有人情味。

大连民主广场车场，前身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电车修理工场”，主要负责有轨电车的维修和装配，也是老爷电车——3000型的大本营，因为“主营业

20世纪初，日本人为了维持他们的“南满”统治，在大连大栈桥（今客运码头）至电气游园（今裕景商城）间，建起了东北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左图即为当时的大栈桥，有轨电车正穿行在空旷、冷清的街道上。下：203路上这辆3000型老式电车，从昨天的沧桑中驶来，见证了大连的过去与现在。还将成为未来大连的见证者。







巴黎是世界上最早运行有轨电车的城市之一，上图为巴黎早期的有轨电车，透着华丽的贵族气息。（供图／Bettmann／c）如今在欧洲，恢复有轨电车已成为一种热潮。下图是瑞士伯尔尼的有轨电车，这里拥有欧洲最多的有轨电车道。（摄影／Wilfried Krecichwost／c）

务”是老式电车，所以修造的场面和当年别无二致。翻新车体是一种技术含量很高的手艺活儿：钉铆锤钻加电焊，用来修补车体上的岁月痕迹；修模、刮腻子、喷漆，可让车体外表恢复光鲜；刨光、打磨，可恢复电车内那些木质窗户门和椅子背的纹理和弧度，其精致程度让人感觉好像进了家具店。空气中木料和漆料的味道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气氛。

现在大连花大力气整修保存有轨电车，让车场一位和电车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老工人十分欣慰，他说了一句让人难以忘记的话：“以前大连市里全都是电车，大家都嫌电车慢，要拆了电车换汽车。现在汽车多了，堵车厉害了，汽油贵了，想起电车来可是电车轨道却已经拆了不少。看看现在大连每天有多少人在坐电车，你能说这老东西没有生命力？”

2001年，联合国环境署的官员到大连考察时，曾对这里保留众多“老爷电车”表示高度赞赏，还预言有轨电车将在世界范围内卷土重来。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这之后的2004年，瑞士日内瓦正式启用了一条有轨电车轨道，苏黎世、伯尔尼、巴塞尔等瑞士城市的有轨电车轨道也纷纷重新运营。在法国的巴黎、里昂、斯特拉斯堡、南特、卢昂、格勒诺布尔等地以及德国和荷兰的一些城市，有轨电车又重新开通。在北京，已经有报道称，将在新复建的前门步行街沿线重新恢复一段“当当车”观光线路，全程约1公里，有轨电车将成为前门步行街的标志性景观。

历经风雨的“老古董”返老还童了，作为中国少有的有轨电车，大连有轨电车在现代社会中显露出全新的存在价值。人们开始为这份珍贵的城市遗产喝彩。

有轨电车 承载大连人的浪漫世界

近百年来，有轨电车那律动有序的“咣当”声如摇篮曲般让大连进入梦乡；每天，

又准时将全城唤醒。有轨电车已驶在了大连人的感情世界里。

年过六旬的崔瑛，家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南岳街。童年时的一段电车经历让她至今仍记忆犹新："我10岁的时候，大连街头几乎没什么车，只有有轨电车'威风凛凛'地驶来驶去，我和小伙伴们都特别想坐次电车'过把瘾'。但那时家里都很穷，家长是不会随便花4分钱给小孩子买张车票的。但是，我们太想坐电车了！后来，我们5个孩子就一起捡碎玻璃卖钱，好不容易攒了2角钱，可这些钱只够我们5个人坐一趟电车。可我们实在忍不住了，非要马上过一把电车瘾不可，左思右想，我们决定先步行到电车的某一站然后坐电车回家。于是，我们走呀走呀，总希望能走得再远一点，这样可以多坐些路程，最后竟一直走到了终点站。买完票后，我们终于坐上了电车，虽然车上有很多座位，但我们谁也没坐，一起站到车厢前面，眼睛贪婪地望着沿途的城市风光。电车开动着，清风吹动我们的头发和衣服，那感觉真是惬意极了。当电车回到始发站，我们兴奋地冲下车，一边跑一边大喊：'我们坐电车啦！我们坐电车啦！'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还能感受到那时的冲动。"

在大连有一个独特的现象：所有驾驶有轨电车的都是女司机。何以如此？有一个比较幽默的说法是：男人容易出轨，为防止男司机开车出轨，所有老式新式有轨电车都是女司机驾驶。究其原因，当然不是这样。大连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大量汽车造成交通拥堵，大量排放的尾气污染了城市环境 人们开始回味有轨电车的种种好处

长春也曾拥有四通八达的有轨电车网，但在20世纪60至80年代陆续被拆除。下图1中的54路是仅存的一条有轨电车线路。下图2为在香港运行已经有100年历史的有轨电车，如今仍是香港市民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双层结构是香港有轨电车最大的特点，开放式车窗无冷气。同时它也是香港岛区最便宜的交通工具，成人每位仅收2元。摄影／黄庆军



1



2



去曾经有过男司机，但是好多人受不了有轨电车走走停停、慢腾腾的劲儿，最后纷纷选择了离开，到后来，电车公司招收司机的时候也就不再考虑男司机了。就这样，大连有轨电车成了女司机的天下。而女司机们也是大连电车最好的形象代言人，她们待客和气，操纵平稳，上车时经常听见她们和善的引导话语，行驶中司机们都全神贯注、一丝不苟。驾驶传统有轨电车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有时控制器吃紧，要用双手才能扳动。由于马路上车多人多，还要不停地操纵列车制动。在完成这样的工作时，女司机们的性格，仿佛和她们操纵的老爷电车一样坚忍不拔。

吕淑英是新中国大连第一代女电车司机，从18岁开上有轨电车，到55岁时退休，37年的电车情结让她终生难断："1948年，我从金州老家来到大连，当上了电车售票员。3个月后，经过培训和考试，我又当上了有轨电车司机。



难得有雪的大连，飘起了雪花。有轨电车缓缓而来，停驶在没有遮挡的车道旁，乘务员清扫着窗上的雪花，调度人员则匆忙地在雪天中奔走……给乘客带来一丝温暖。

还记得第一次接车的前一天晚上，我激动得睡不着觉。凌晨3点，我就穿上军装布做的工作服，来到车库做准备。从凌晨4点，第一次载客上路，到晚上回到宿舍，始终是兴奋不已，我是太喜欢这份工作了……有一次，我穿着工作服回老家，十里八村的人都赶来了，他们用羡慕的眼光打量着我，心里别提多展扬了。“文革”那会儿，丈夫被下放到农村，为了不耽误工作，我把4个孩子都送回老家，那时电车司机中有这样一种说法‘以车为家，对车比家好’，真的就是那样，只有在电车上，我才感到心里特别踏实。那时候，电车司机与乘客之间没有隔断，许多乘客上车以后都会主动和我打招呼，逢年过节，一些老乘客还会送些小礼物……一晃37年啊，我从‘小吕’变成了‘老吕’，最后退休了，离开电车了，心里特别不得劲儿，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无所适从。不知道多少次，我让老伴儿陪着我，站在电车道旁，看着一辆辆电车从我身边开过去……”

大连开放先导区报社摄影师汤亚辉，也对有轨电车情有独钟，拍摄有轨电车长达10年。“我特别喜欢有轨电车慢悠悠的感觉，它能让一个人浮躁的心灵沉寂下来。”他还说：“有轨电车从凌晨到午夜，一直在我们的城市穿越。早晨的有轨电车，就像家里的‘闹钟’，而午夜的有轨电车像杯咖啡，哪怕只有一个乘客，它也无怨无悔，与夜行人相依相伴。平时，我常会发现有轨电车上的浪漫细节，比如青年男女在车上读书、恋爱，甚至趁人不注意时来个蜻蜓点水般的接吻……其实，有轨电车承载着的未必都是沧桑与厚重，还有温馨的浪漫，比如它有可能是浪漫的环境道具，比如它可能是大连人调皮的回忆……这个城市的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关于有轨电车的某个记忆，这种记忆让我们每个大连人能在回忆中快乐着。”

现代元素 推动有轨电车新生

目前欧洲是有轨电车、特别是新式有轨电车系统最为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德国、捷克等国家，有轨电车交通在这些国家的中小型城市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欧洲城市，特别是



电车的电网线路一旦发生故障，就会引发严重的堵车，这时，维修人员就得爬上车顶及时进行维修。右图则是另外一种风景：有轨电车都是双向的，即两头都既可当头又可当尾，头部的工作人员负责开车，尾部的工作人员卖票并负责上下乘客的安全。车到终点后不用掉头首尾就可互换，不过，还需把电车顶上的“辫子”拽动一个方向，这样才能使电车顺利开行。

中等城市中，有轨电车基本上担负了公共交通干线的角色。铰接式有轨电车一直是欧洲电车交通发展的一个重点，因为它既保证了较大的载客量，又保证了乘坐的舒适度。

从文化角度来说，欧洲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经济发展较快，有轨电车在欧洲发展时间早，已经深入民心，成为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还有一座专门的有轨电车博物馆，每到庆典的时候，博物馆还会组织过去已经退役的有轨电车上街巡游，受到“电车迷”的追捧。

相比之下，中国尚处在城市化进程中，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代社会的“都市病”愈发明显地体现出来：大量汽车造成交通拥堵，大量排放的尾气严重污染了城市环境，大量使用汽油使不可再生能源损失。人们开始更多地回味有轨电车污染小、耗能低、载量大的种种好处。大连人不愿有轨电车在现代化中湮灭，他们企盼着这从历史深处开来的“当当车”，能合上现代化的辙，能越过新世纪的门槛，能成为21世纪现代化大连的特色景观。

要发展新式有轨电车系统，必须找出当前面对的问题，并从大连当前特色入手，研究可行性方案。于是，在寻求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中，大连人积极学习和借鉴欧洲国家的先进经验，将目标瞄准建设高效的轨道交通系统。

作为全国保留有轨电车线路最多最长的城市，有轨电车对大连来说已不单单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承载城市多元文化和发展历史的载体。

大连原有的有轨电车路线比较短，3条线路总长度只有15公里。随着城市的发展，原有的线路已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1996年12月，一个更新改造有轨电车的计划付诸行动。大连市政府和公共电车公司联合出资4000多万元，对现存3条线路上行驶的98台有轨电车实施改扩，增加有轨线路9公里。

从2000年9月开始，大连市自己设计制造的大连第一条快轨线路——快轨3号线（全长46.403公里）开始动工，新型快速有轨电车采用了许多高科技新材料，使用先进的牵引、制动设备，有快速、安全、方便、经济等优点。车体长19米，宽2.8米，对于中等运量的干线运输来说，具有非常强的客流消纳能力。时速也由原来老式有轨电车每小时15公里左右飙升到100公里，而高速行驶时几乎没有振动和噪声。除此之外，快轨线路还承袭了传统有轨电车车辆寿命长、不易老化、维修方便的种种优点。

除快轨之外，大连对传统有轨电车线路的改造也全部采用新技术。穿越市中心的202路（兴工街至黑石礁）有轨电车改造，从拆除传统路基开始，路基采用了混凝土板式整体道床，这种道床由沥青混凝土铺盖，形成

夜幕降临，有轨电车以它特有的节奏，不紧不慢地行驶于群厦之间，营造出属于大连的浪漫。喧嚣的闹市慢慢沉静，电车顶上的灯光亮了起来，隐约闪烁于城市的夜色中。踏上电车的人们，一边听着车轮与轨道撞击所发出的咣当声，一边心向着家的方向。窗外，暮色开始弥漫，有轨电车也即将在清脆的铃声中，拉下这座城市沉睡的帷幕。



了与欧洲发达国家相同的可供各种车辆混合通行的路面，昔日，有轨电车线路上那裸露的路面和枕木不见了，由于采用了美国轨道连接技术，实现了零轨缝，电车行驶噪音也大大降低了。

203路（火车站至寺儿沟）曾是大连最老的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在饱含现代元素的改造中，大连人巧妙地保留了它的古风韵味：轨道依然采取条形道床和槽型钢轨等新技术新材料，使轨道与路面融为一体；牵引系统采用目前世界上先进的交流传动、微机控制技术；制动控制系统采用欧洲快速铁路车辆普遍采用的模拟制动技术；车厢配置空调系统，而车体内外装修则参照欧洲古典风格设计，采用铝合金仿木材料，给人一种古色古香的视觉效果。

201路（火车站至沙河口）是仅剩的一条老线路，改造后，它成为全封闭的车厢，更有利于节约能源，乘坐环境也更舒适。不锈钢扶手和铝塑材料挡板，让使用寿命变得更长。现在，201路与203路已合并成新201路。

大连有轨电车客运业的迅猛发展，也带动了与此相关的站场条件等后方设施的技术改善。在新201路有轨电车站台的侧面，迎着车行方向设置了一个防撞器。这个鞋形的黄色玻璃钢“钢墩”内注水泥，车辆撞来时“钢墩”将被滑偏方向。同时，在防撞器后面还有一个太阳能的提示牌，夜间可发光，便于提示往来司机注意。交警部门也在站台侧面设置了警示柱。新立起的遮雨棚也起到保护作用，由于遮雨棚形成了半封闭的保护，候车者不会被后面的其他车辆刮碰到。站台两侧建有坡形的残疾人无障碍通道，站台的台面也是用防滑大理石铺设而成。这些增添的新“装备”，成为道路中央的一个个候车“安全岛”，使大连的有轨电车系统更具有了人性化的温暖。



有轨电车以车轮撞击轨道的方式展现着大连的激情与活力。正如大连作家车向红所说："一代又一代的大连人都是在有轨电车的大摇篮里摇大的"，而大连这座城市也在有轨电车的轨道上一步一步发展起来。今天，作为全国保留有轨电车线路最多最长的城市，有轨电车对大连来说已不单单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承载城市多元文化和发展历史的载体。

穿行于大连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闹市的喧嚣中，缓缓驶来有轨电车，伴随着大连成长的历史，在一片咣当咣当的行进声中，即将走过没有终点的百年轨迹。

责任编辑/刘霞　图片编辑/何亮　版式设计/许丽娟

北大图书馆

撰文/洪峰 摄影/王凯等

存史之藏



馆藏逾五百万册并与年俱增的藏书规模、近百台工作站以及大型塔式光盘驱动器和光盘库、网络数据库，将北大图书馆塑造成信息时代亚洲高校第一馆。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座学知殿堂并不引人瞩目的一角，竟藏有量居全国图书馆第三的古籍善本书籍，许多甚至可称是国家历史的宝藏。

宽不足一掌，灰黄色的卷轴秀巧迷人，管理员将它轻轻展开，温柔得就像手里是刚刚羽化的蜻蜓的薄翼。“这就是雷锋塔里的《陀罗尼经卷》？！”四周分外安静，我努力压低激动而又充满赞叹的声调。

鲁迅先生一篇《论雷峰塔的倒掉》被列入中国学生的必读课文，历尽几百年沧桑、拥有丰富传奇色彩的雷峰塔由此人尽皆知。如果你再多关心一些文史方面的新知旧闻，或许听说过下面的故事：1924年9月25日下午1时许，当这座古塔轰然崩圮，闻讯聚集在夕阳山上的老百姓竞相翻捡雷峰塔的遗物，又有千余官兵翻天覆地搜查，雷峰塔“经砖”（砖中有孔以供放经卷）四处散落，这些宋代遗存下来的雕版印刷佛经卷轴经历了空前的浩劫，无知的践踏和哄抢，让这些经轴能完整成卷的屈指可数。

数十年过去了，当这样一卷著名的文物百般辗转流徙突然“展”现在我面前时，时光与历史霎时就在我心中荡漾起一圈又一圈涟漪。中国一向以文化的历史悠久而著称于世，而且也是最善于运用典籍记述自己历史的国度，一书一册，一纸一图都是历史的产物，更是历史文明的标志，我曾听专家说中国古籍总数高达十几万种，其中最具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的就被称为善本。

北大的善本有多少呢？“150万册。”管理员说，“这样的规模仅次于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

樟木柜里的善本之藏

由北大图书馆地面乘电梯至地下一层和二层，经过迷宫似的走廊，打开巨大的铁门，声



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关肇邺院士主持建造的北大图书馆新馆建成于1998年，是亚洲高校第一大馆。右下图为学生在古籍部阅读，有了现代化工具的帮助，学生们的学习和研究变得越来越方便。

响传入走廊的尽头，黑暗被灯光照亮，就像历史被文字记载照亮。

一排排木制书柜悠然站立，泛起淡淡的幽香，原来它们竟都是樟木新造，古朴的款式在寂静的氛围伴衬下，犹如群贤在此打坐，而我就像一个不速之客，打乱了他们的清修，我的胸前背后似乎有无数目光凝视过来，刹那间，让人感觉自己渺小了许多。这就是北大图书馆善本库，这里的管理制度是极其严格的，通常只有工作人员才能进入，而其中大量的镇馆珍藏，更是“只可远观，不可近读”。

以前只知道北京国家图书馆藏万卷书，可谓无所不包。还知道当年郭沫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时，在科学院图书馆也收藏了许多善本。据中科院图书馆的友人介绍，善本库的钥匙，一直带在他身上，从不轻易示人。而我确实没有想到，这北大图书馆竟然也如此……

“我们的善本标准，基本是指乾隆之前的书籍，乾隆以后个别好的书籍，也可称为善本，当然，许多孤本文献也属善本。”管理员

的声音轻柔、缥缈、遥远，我紧随其后，生怕漏掉一个字，“你在这里看到的可全是善本！善本的保存条件是非常苛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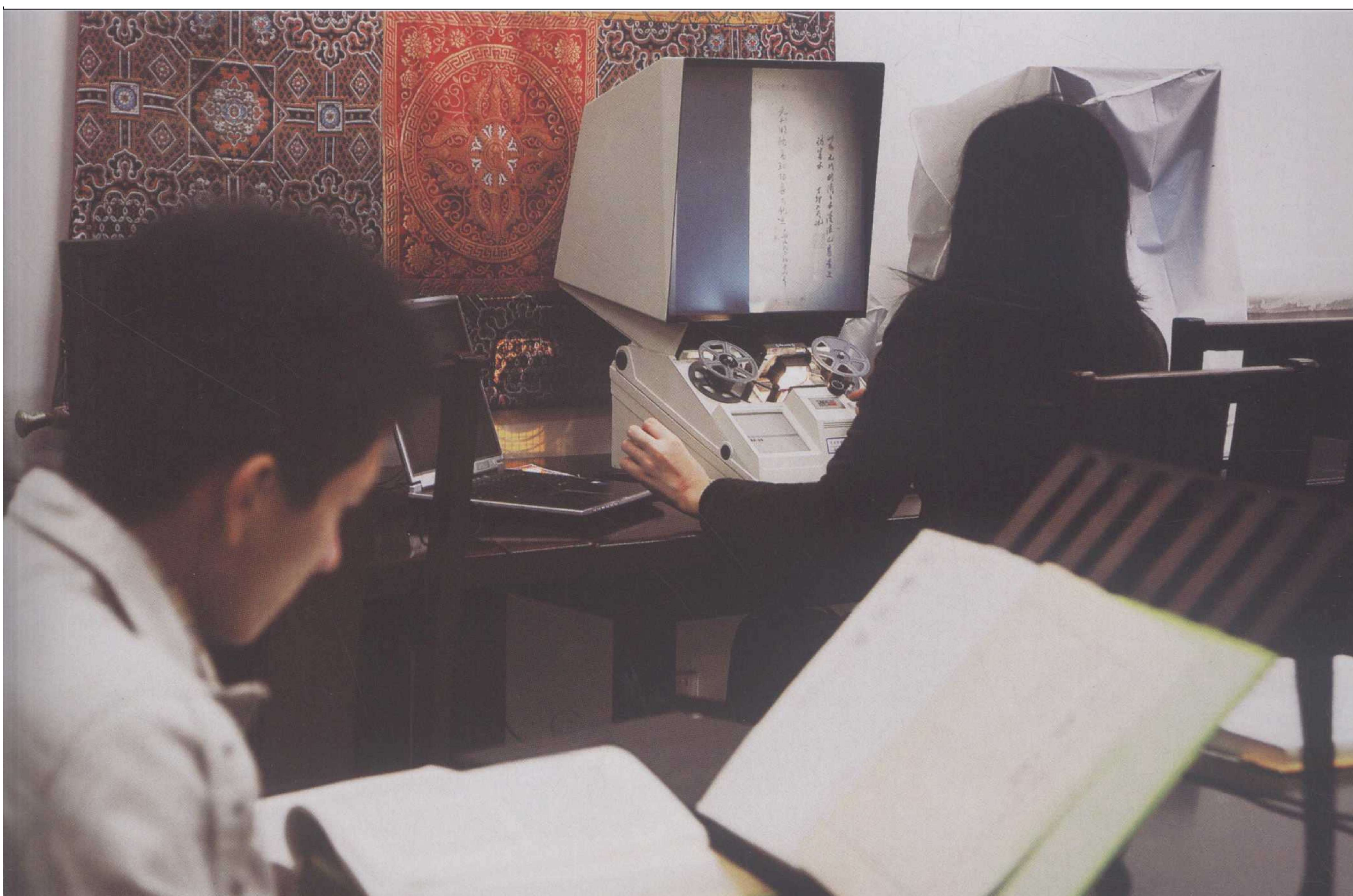
的确，古籍不仅是记载知识的书籍，更是一种文物，由于载体的特殊性质，注定它的生命非常脆弱，很容易被损害。管理员介绍说，北大图书馆有捐资制作的一千只樟木书柜来存放古籍，樟木就好比“樟脑丸”的作用，主要是用来防蛀。

“啊，能得到这么多樟木很不容易啊”，我感慨起来，管理员说：“是啊，这可是林业部特批的，也可见北大图书馆的文物价值是多重要了。”在一排排一人多高的书柜间穿行的时候我愈加心生敬意，由于房间的巨大，我和管理员的谈话甚至有隐隐的回声。再仔细观察，周围许多小小的红灯、绿灯在幽暗处闪烁，原来它们分别代表着防火、防盗、除湿、监控……各种设备的正常工作。

透过书柜的玻璃，我隐约能够分辨这些古籍的类目，佛典、诗集、儒家、诸子；书法、山水、线装、残片，千年的历史在这里一下被拉近。同时面对如此之多的知识珍宝，这种感觉是异样的，这其实就像博物馆所具有的魅力一样，只不过由于中国对于善本藏书的传统做法都是不轻易示人，普通人也就难以亲身体验到这种感受了：仿佛以前读书所汲取的知识，此时此地已全部化为乌有，又像小学生站在爱因斯坦面前那样不知所措。

离开大库，我被领入更高级别的藏书室，也就是那些镇馆之宝的存身之处。更深浓的樟木气味扑鼻而来，这也许只是一种错觉，或者代表着我深切的期待：“这里的书籍可有宋代的？” 我知道，宋代的一张纸，在古玩行里也会卖到天价。

“不太多，只有一些宋代的皇家图书。”管理员笑着说，“这里珍藏的年代最早的书、纸，比宋要早得多。这是公元四五百年南北朝时期的，是在北梁墓中发现的，你看，这就是，不过残了；这是唐天授年间的佛经卷轴，敦煌的，我打开一点，你看一下里面……”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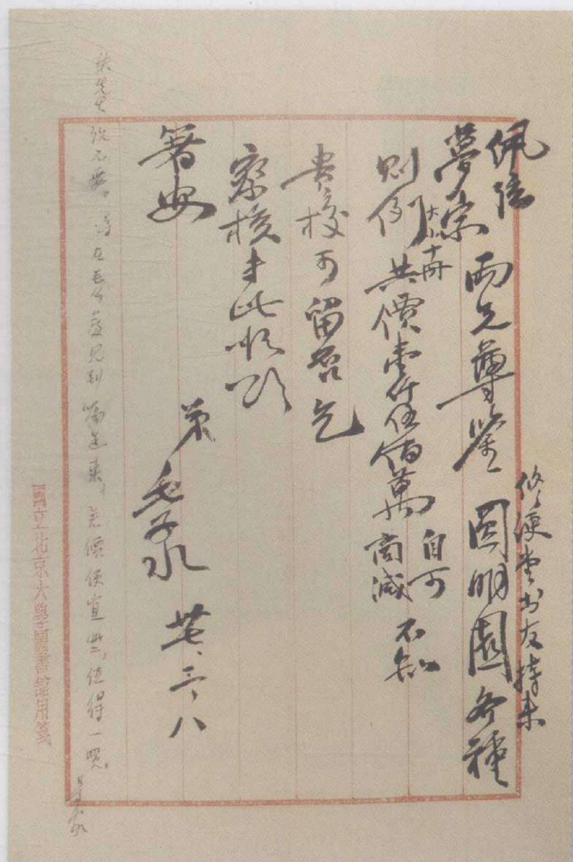




馆藏部分古籍珍品：上1为贤劫千佛名卷，五代后梁彩绘写本（敦煌卷子）；上2为《大方广佛华严经修慈分》，北宋元丰八年（1085）刻本。（摄影／王呈选）左下图为古籍部保存的当年收集圆明园则例时候的一份来往便签，这些珍贵的墨宝已经收录于《北京大学当代学者墨迹选》。右下图为保存善本古籍的樟木书柜，它们使古籍部弥漫着樟木的清香。

卷打开了半尺，似乎是精心装裱过的，纸色发黄，小楷字迹工整得颇似印刷品，这却是真真正正的唐代手书，时空再一次被缩短，千年之间竟如白驹过隙。

管理员的介绍打断了我的思路：“这是设计圆明园、颐和园的原始书稿、图画，包括了结构、用料、费用，看，这就是圆明园的西洋楼、大水法，你在外面看到的所有图画介绍，都是从这里拍照的。”


佩弦
夢家 兩兄尊鑒 修綆堂書友持來 圓明園各種
則例 共價 自可 商減 不知
貴校可留否 乞
箸安
弟 毛子水 三、八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用箋

这时，我留意到有个柜子里摆放的古籍尤其五花八门：《圣迹图》，大概是孔子或某圣人生前的“路线图”，就发问道：“这个《圣迹图》说的是……”

“是关于孔子的，明代所作，木刻彩绘本，是同类版本中相对较早者。”

“那这个奏折？”管理员回答我：“刘墉的呀，这里写着呢。这是何珅的《大清一统志》。”

“这里还有皇帝的圣旨吧？”我表示着自己的好奇，很想仔细看看电影电视中的道具和实际文物的差距。

“这些是明、清部分皇帝的圣旨、诰命，这是清兵入关后皇帝的敕令，上面有第一批‘南下干部’的名单。”管理员胸有成竹，还不失幽默。

既然是图书馆，它的价值自然同藏书紧密相关。而北大图书馆如此闻名遐迩，皆因为它有如此之多的“存史之藏”、“朝圣之藏”……有的时候藏书不仅仅是一种渴望拥有的欲望，还是一种担当使命的责任。

一国之史赖书籍以传承，兵火丧乱、霉烂蠹蚀、豪夺计赚、种种恶劫，致使古籍传至今日，百不一存，尤其是在朝代更迭、历史变迁的节点上，首当其冲受到迫害的往往就是历史书籍。在这间藏书室里，还有几份古籍让我体会到这样的沧桑巨变。

比如两卷已经被岁月洇得发黄的宋刘氏天



既然是图书馆，它的价值自然同藏书紧密相关。
而北大图书馆如此闻名遐迩，
皆因为它有如此之多的“存史之藏”、“朝圣之藏”。

香书院刻本《论语》，其身世飘零，曾经流失于日本多年，曾被人视如珍宝，也曾被人视如草芥，最后得以荣归故里，这些故事就写在它上面的那些批点题跋、墨迹手泽里。在书中盖有两方周周正正的“杨守敬印”和“星吾海外访得秘笈”的收藏印记，正是这两方印记，述说了这两卷古籍不平凡的身世。

这还得从我读过的一首欧阳修的《日本刀歌》说起：“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据传，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东去海上求仙的徐福带走了大量书籍，因此也就有很多古老的书籍内容在日本流传了下来。更确切的证据是日本有份汉朝书目《本朝见在书目录》，入目录的汉书书量传说有相当于两唐志著录书籍的一半。但是根据欧阳修诗中所载，日本严禁汉书回传，从而造成了中国历史文化的重大遗憾。时过境迁，到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整个日本的风气是提倡新学，唾弃守旧，汉学古风都被当成旧文化的代表。我们前文所提的杨守敬先生就幸运地在这个时间到日本寻书，他节衣缩食收购了大量的汉学书籍，他“日游市上，凡板已毁坏者皆购之。不一年，遂有三万馀卷。”宋刘氏天香书院刻板《论语》，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杨守敬还有一个习惯，每当他买到了一本新书，都会记入自己的“购书笔记”，后来在光绪二十三年（1898），他还根据笔记整理出《日本访书志》16卷，其本身就



今天的北大图书馆一方面秉承了现代图书馆将书籍知识通过更方便的借阅方式传递给师生读者的功能，另一方面却也继承了中国古代藏书的传统文化习惯。

是一本珍贵的版本目录学著作。北大图书馆的收藏有很多都是这样历经沧桑、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研究价值的古籍。

重新回到地面，外面阳光灿烂，历史好像也在身后关闭了它巨大的朱门。管理员还笑着补充了一句："你今天看到的，仅仅是北大的藏书，和北大合并的燕京大学的宝贝，你可还没看到呐！"

你是馆长还是我是馆长

"一座校园的图书馆，怎么竟有如此之多的宝贝？"作别善本库之后，我对北大图书馆产生了更多的好奇。对北大熟悉的人都不会对畅春园、蔚秀园、承泽园、朗润园……这些名字感到陌生，其实这些典雅庄重的名字，本身就记录了北大悠久的历史和与皇家密切的渊源。北大的未名湖还是和珅修的呢，当年康熙和雍正都是死在畅春园，而非死在城里皇宫内，那么北大和北大图书馆的历史是不是有很多雍容、难以言传的历史，这些和图书馆的古籍巨藏又有什么关系呢？

图书馆一词，说起来可是舶来品！中国过去上千年的习惯，是将浩如烟海的书册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然后这些书册又被按部类收藏于官方或私人藏书楼、藏经阁、守藏室一类的地方。《尚书·顾命》中对守藏室存放上古遗物的位置有如下记载："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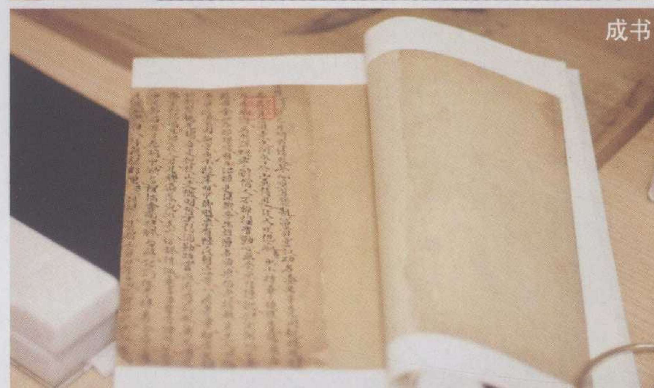
对古籍的修复是古籍部的重要工作之一。古籍修复的整个流程一般要经过十多道工序，如果遇到纸张长霉或酸化，还需用热开水清洗或蒸煮，脆化纸张还要先经过托裱等步骤，所以修复的速度非常慢。


拆分


润湿


修整


理平


成书

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后来人对文中所载熟悉的也只有河图和天球了。

据说当年老子就曾在洛阳周王的守藏室工作过，孔子闻之，还专程到周都向老子问礼，行前曾对南宫敬叔道：“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这句话被记载在《孔子家语》之中，后来，老子热情接待了孔子，除引见有造诣的同僚外，还领孔子考礼仪、祭典、乐理等。

这其实是一段学者到藏书馆查阅资料、会晤藏书馆工作人员的故事，我国早期“图书馆”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而且我认为，周的守藏室就相当于现今国家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三馆之合，上古遗物、秘藏图书（竹简）和历代方物都收集其间，但无论如何，这与现代意义的图书馆还是有着天壤之别。

今天的北大图书馆一方面秉承了现代图书馆将书籍知识通过更方便的借阅方式传递给师生读者的功能，另一方面却也继承了中国古代藏书的传统文化习惯。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国立图书馆之一，北大图书馆的馆史本身就见证了一段坎坷的中国历史，也是近现代中国文化史的生动侧影。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希望引进西洋的文化、制度、科技、典章，以便改革本国不合理的结构来富国强民。图书馆这个名词和它代表的先进思想性，

于是在那个大变革年代被引入进来。

1898年是中国难以忘怀的一年，梁启超、康有为等主张实施“戊戌变法”来推行新政，经光绪皇帝批准，设立了京师大学堂，这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有学堂自然会有图书。图书不仅是图书馆的灵魂，同时也是学校的一大特色。《京师大学堂章程》为梁启超所起草，里面就郑重谈到藏书问题：“今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以广天下风气。”当时的同文馆藏书、强学会书藏、官书局藏书均随京师大学堂的建立而归并其中，成了今日北大图书馆的最初一批馆藏。

目前的北大图书馆无论从规模、风格和管理上，都有独到之处。但个人以为，衡量一个图书馆是否优秀，首先要从人的因素上去考虑，而规模大小、建筑特色等并非首选因素。只要有了优秀人才来努力，任何事情都会极具特色，北大图书馆正是这样一家具有特色的图书馆。

古籍藏书乃是图书馆的基础，也是图书馆的根。衡量一个图书馆的规模和质量，其中一项就是看它的古籍拥有量。按照较为官方的说法，目前全国古籍藏有量较多的，共有四大图书馆，它们是：国家图书馆，藏书180万册；上海图书馆，藏书160万册；北大图书馆，藏书150万册；南京图书馆，藏书140万册。

国家图书馆就是以前的北京图书馆，它的建馆时间要比北大图书馆晚10年；上海图书馆解放后才建成；南京图书馆接收的是民国南京图书馆的图书，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把精华带到了台湾。

据业内人士介绍，古籍收藏的统计方法有种种不同：如某名人的信件、札记，装订后可计算为一册，也可以将每封信件计算为一册，统计方法可伸可缩，差别较大。但无论怎样计算，上述四个图书馆，其古籍藏有量在国际上是屈指可数的，而北大作为一个学校的图书馆，拥有如此丰厚的古籍，应当说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了。

北大图书馆藏书的主要来源，还是通过购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和嘉公主府（四公主府）成为京师大学堂，此楼于次年改为京师大学堂的藏书楼。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右图为楼前合影及部分北大图书馆馆长照片。左页图为今天的红楼。位于北京沙滩地区的红楼建成于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毛泽东简历上的“北大图书馆助理馆员”指的就是在这里的工作，而最为国人熟知的是这里曾孕育了伟大的五四运动。今天的红楼作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依然安静地端坐在车水马龙的城中心。





买和捐献两种渠道实现的。其实捐献，大部分也是要付给原主人钱的，这就使得藏书成了一项艰难的事业，收何种书，收多少册？这些都是当时作出抉择却会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事。

我听过一段关于北大图书馆藏书的有趣故事：抗战胜利后，胡适任北大校长，1946年，他任命毛准为馆长。这是毛准第二次当馆长了，第一次是在1931至1935年间。一天，胡适正在校园散步，忽然听到图书馆外有吵闹声，于是快步上前察看，发现一些学生正围着毛准责问：“今后不能再购买线装书了，为什么不多购买些进步书籍？”线装书，当然是指古旧书籍。

毛准回答：“不买！”

胡适连忙上前解围：“你可以买些左派的书籍嘛。”

毛准的回答令胡适难堪：“你是馆长，还是我是馆长？”

我们在这里不去谈论政治因素。从这个故事中可以透露出当时北大师生的民主风气和老师们为图书馆的古籍藏书事业所作的努力。

北大图书馆的古籍藏书，其实主要是在解放前那段时间收集的。当时的馆长，都是极负名望的学问家。许多馆长离任后，在专业上都有很深的造诣。我在这里极有必要提及他们的名字：佛学家梅光羲、古籍版本学家徐森玉、法学家章士钊、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法学家的李大钊、图书馆和目录学家袁同礼、考古学家马衡、校长兼馆长蒋梦麟、国学家毛准、图书馆和书简学家严文郁，还有1949年接任馆长的中西方交通史学家向达。

徐森玉，属于我国最早一代文物古籍专家，解放前曾任北平图书馆馆长、中央博物院理事，经过他的努力，大批文物古籍在抗战时期得到保护。解放后他曾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成为文物古籍鉴定专家。后到上海博物馆任馆长。

马衡，主攻考古专业，1934年就成为了故宫博物院院长，抗战期间负责文物南迁，这件事情已经拍成了电视剧。解放后，他继续留任院长职务。

这些馆长在任期间，收集图书自然是专心



致志、兢兢业业。比如李大钊，他在任的4年里，图书馆每年都有1万册的增长量。

1949年任职的馆长向达，是延安时期的干部。馆员们常常对其有意见，抱怨经常找不到他，实际上，他是在四处查找、收购古籍。向达经常出入于琉璃厂，或者在馆外路边和一些手拿兰布包的个体书商打交道。他最大的成果，就是收购了流散在外的敦煌经卷200多卷，堪称镇馆之宝。向达原是历史系教授，主攻专业是中西方交通史，对于丝绸之路了如指掌，有了这样的前瞻性，自然勤于其中。我想，如果没有向达的努力，这些经卷或可毁坏遗失，或可流散到国外，成为千古憾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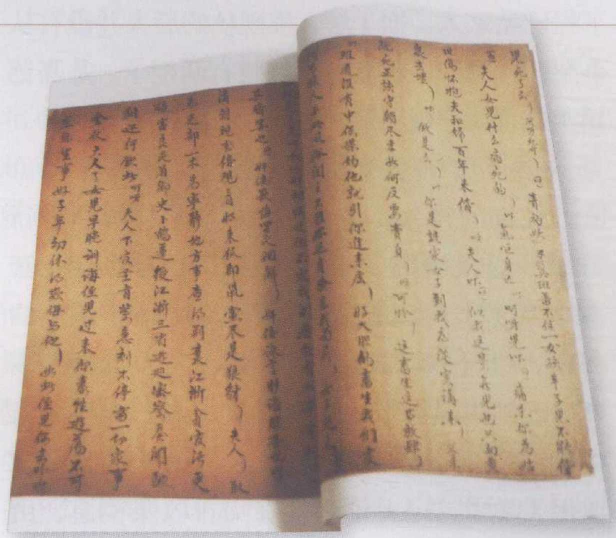
敦煌经卷，也称敦煌遗书，主要以唐代为主，是北宋时期为避西夏战乱，僧众藏于洞中的佛家经卷。当时的僧众将洞口封堵，又在墙上画上壁画作为伪装，就是现在敦煌莫高窟第十七号洞窟。1900年，居住在此的王道士无意间发现了墙壁裂缝，藏经洞终于现世。王道士虽然及时报告了敦煌县令，因缺乏重视和缺钱，虽然制定了保护计划，但并没有实施。自此之后，王道士经常将一些经卷送与当地官绅。消息流出，各地文物贩子开始活动。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带领探险队来到敦煌，经与王道士协商，购买了大量经卷，并许下修缮观宇的诺言，随后又第二次前来。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又买走了大量经卷。自此以后，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先后从藏经洞带走了大量经卷，明为购买，实为窃抢。据统计，流散在国外的经卷大约4万件。1910年，清政府开始醒悟，下令将剩余的8千件经卷运至京师图书馆保存。目前，全国各地保存的经卷约有1万7千多件，其中以国图为主。现在，藏经洞的文书已经形成了敦煌学，有许多人致力于佛家经典的研究对比。

每当我向图书馆老师们问起图书馆古籍都有些什么精华，或有什么镇馆之宝时，老师们总是表现出很为难的样子。这并不是他们有意保密或故作神秘，而是这里的古籍实在太多



古籍藏书乃是图书馆的基础，也是图书馆的根。要衡量一个图书馆的质量和规模，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指标就是看它的古籍拥有量。

左图为北大图书馆特藏的商代金石拓片《者女觥》。右图就是图书馆斥巨资拍得的程砚秋梨园剧本中的一册。这套梨园本的完整性和珍贵性让人叫绝，有了它，许多已经失传的明清戏剧都可以得到恢复。



了，你很难简单地分出高下。用他们的话说：宋元刻本就有300多种，明清善本不计其数，名家稿本、信札、手抄本、批改本不计其数，仅家谱一项就有1500多种，而各类善本中的孤本又有1500种。

如果一定要问北大图书馆都藏有什么宝贝，那么老师们会从反面来回答你：善本库里的好本子太多了，只是中医、算命的少，还有工程等偏门的少，你若不亲身经历其中，大概就只有翻阅北大图书馆所出版的古籍善本名录这类专著了。

550万拍得一套梨园本

2005年10月中旬，北京的许多报纸、网站都有内容相仿的报道：嘉德公司秋季拍卖会将于11月4日至7日在北京昆仑饭店开槌。其中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秘藏的一套千余册的《玉霜簃戏曲钞本》，将在古籍专场拍卖，拍卖估价目前尚不明朗。

程砚秋，京剧四大名旦之一，1958年去世。曾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有人评价说他的成就达到了京剧艺术近百年来的最高峰。

玉霜簃，是程砚秋家里的堂号。过去比较讲究的书香门第或有名望的大户，家中都有堂号。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松地将《玉霜簃戏曲钞本》理解为程砚秋收藏的戏曲抄本。

该抄本中有许多秘不示人的演出剧本和很多工尺谱、身段谱。对研究程砚秋的表演艺术、清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具有极高的史料文献价值，相关专业机构都对这批戏曲抄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沈乃文，54岁，研究员，北大图书馆系毕业，因从事古籍工作，所学甚博。他一直关注着各类文物古籍的信息，一如那些先辈学者所做。这一次，他从朋友处得到了程砚秋所藏《玉霜簃戏曲钞本》将要拍卖的信息，他断定，这些就是梨园剧本。

沈乃文迅速向图书馆领导作了汇报，并在预展时前往嘉德公司亲眼检验。现场翻看到的一些梨园剧本，完全证实了他的判断。只是这些本子数量太大，令人眼花缭乱，当场只能有一个大致的判断，不可能仔细品味其中内容。

这些梨园本虽并非出自程砚秋之手，却是程收集的当年徽班进京时的重要梨园本。大清乾隆皇帝八十大寿时，曾召徽班进京贺寿，嘉庆、道光年间，还有戏班进京加入了徽班演出，据称前后共有八大徽班。这些戏班，主要被曹家、陈家所把持。程砚秋收集的，就是乾隆时期曹家、陈家流传下来的梨园本。

程先生一直专注于戏曲抄本的收藏，对这

套《玉霜簃戏曲钞本》非常珍视，抗战期间一直带在身边。“文革”期间，程砚秋被抄家，抄本被没收。周总理为了保护这套抄本，指示编目造册，由北京图书馆代为保管，“文革”后退还给了程砚秋家人。据了解，程砚秋的后人并没有从事梨园行当的，这套抄本整整有两柜子，是嘉德拍卖公司从程砚秋后人的手中征集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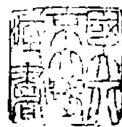
沈乃文的直觉告诉他这套书的巨大价值，经询问得知，该书从500万元起价。进行了一番谨慎研究，图书馆最后决定购买此套古籍。这对于正值发展期的北大，是个不小的决定。11月4日那天下午，沈乃文和古籍部同事李云到达昆仑饭店二楼拍卖大厅，大厅内人员并不多，约有五六十人，大都是文物收藏家和相关学者，记者忙碌地在后排收集消息。由于事先已给每个人发放了拍卖的顺序目录，两人已知顺序号，于是静静地等待着……终于，《玉霜簃戏曲钞本》登场了，从500万元起价，出乎意料，并没有激烈的竞争，两拍过后，就没有人再举牌，北大终以550万元竞得此书。沈乃文始终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要知道，当时北大也只能出这个价格了，如果再有竞争就只能拱手让人。

拍卖会结束后，嘉德公司立即在其网站上做出如下报道：“在古籍善本专场中，程砚秋藏《玉霜簃戏曲钞本》以550万元被国内某机构竞得，成为本场成交最高价。”

要知道，沈乃文与这套书籍接触的时间极短，因此对于以550万元的价格购得一事也始终惴惴不安。回馆后，图书馆的研究人员轻轻打开这摞老书，共1500本，一套套完整的剧本亮相了！明末清初的梨园本第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牡丹亭》、《荆钗记》、《琵琶记》、《牧羊记》、《红梨记》、《西厢记》、《太平钱》……当时所有的校领导都陆续赶来，大家在期待、紧张和兴奋中度过了漫长的一天。

到图书馆去看展览和听讲座已经成为今天学校生活常见的话题。在藏书之余，北大图书馆也在不断探索更多服务师生的形式。





如果你是图书馆的馆长，那要看你在任期间收集了多少图书古籍，这是衡量你事业的惟一标准。北京大学图书馆，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壮大起来的。

时年84岁的中文系教授林涛，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主攻古典文学，在戏剧方面有极深的造诣。据说，一些京戏、昆曲名人等都曾请他做过指导。图书馆将老先生请来以后，他拿起剧本，立即兴奋地按照工尺谱哼唱起来……

后来，凡是看到过这套书的人无不赞叹：这钱花得太值了，甚至有人私下说，像这样的本子花上1000万都不冤。要说，如果将明代某一个已经失传的剧本恢复起来，仅从经济效益上看，又何止550万，正所谓藏书有价，文化无价。

“人文”化借阅的传统余荫

关于北大图书馆古籍收藏的精彩故事，不知还有多少。其实，这和北京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息息相关。过去无论是学文科还是学理工的学生，传统文化的功底都极为深厚，有些人从4岁就开始进入私塾。

据说，当年一些学生入学时，不但能熟诵四书五经，竟然连《史记》、《汉书》这样的大书，也能背诵出主要章节，这种“童子功”，应该会让我们现在的学者或者学生汗颜。不仅仅是那些一馆之长，在北大教学的很多教授也都曾经亲自去收集过古籍，并且捐献给图书馆。这些学者在收购古籍后往往都含而不宣，从不透露详情，也可能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行为，并无特别之处。所以当我想再多搜集些古籍背后的故事，就显得异常困难。

过去在北大，有这样一种概念：如果你是学者，必须是以“学问服众”，而非取悦逢迎或者其他。因此，那些公认的学问家或者校方官员，都是建立在“学问服众”基础上；如果你是图书馆的馆长，那要看你在任期间收集了多少图书古籍，这是衡量你事业的唯一标准。北京大学图书馆，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壮大起来的，能超出任何一所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里我仍要再次回顾中国古代的藏书楼，中国历代藏书楼有上千处之多。这些藏书楼可能在某官府、宫墙之内；也可能在某书院、寺庙之中；或者名宦、书香宅里。它们与今日图书馆有相同之处，也有所不同。而北大图书馆却将中国古代藏书楼的人性化优点与现代图书馆的功能性优点结合一体。

据说，过去许多官办和私人的藏书楼是对外开放的，是允许天下读书人前往阅览的。那时书籍很少，并散落在各地书香宅院之中，交通不便，吃喝不便，没有汽车、手机，更没有电脑和扫描仪，阅读、抄录图书自然费时费力，绝对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情。因此，藏书楼曾经的规矩是管吃管住，或可数日、或可数月。有些学子能够在藏书楼里一读三月。当然，他们通常也为此付些费用，很少会“吃白食”。这种通行的惯例，大概是我国藏书楼的一大特色，西洋图书馆制度，绝对没有这样的内容。

如今，我每次前往北大图书馆古籍部抄录古书时，那里的老师们总是和颜悦色。每临闭馆，都会有轻音乐飘来，以提示你离馆。此时，老师们总是上前轻声询问众人：“这书明天你是否还要读，我好给你留着。”老师们的言行令我感动异常，和他们相处熟悉了，发现他们的视角与众不同，观点独到，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些古籍就是给你们这些喜欢读书的人准备的，保管了几百年没有人读，图书就失去作用了，现在我们的能力只能管你们开水。”这话听了让人心里很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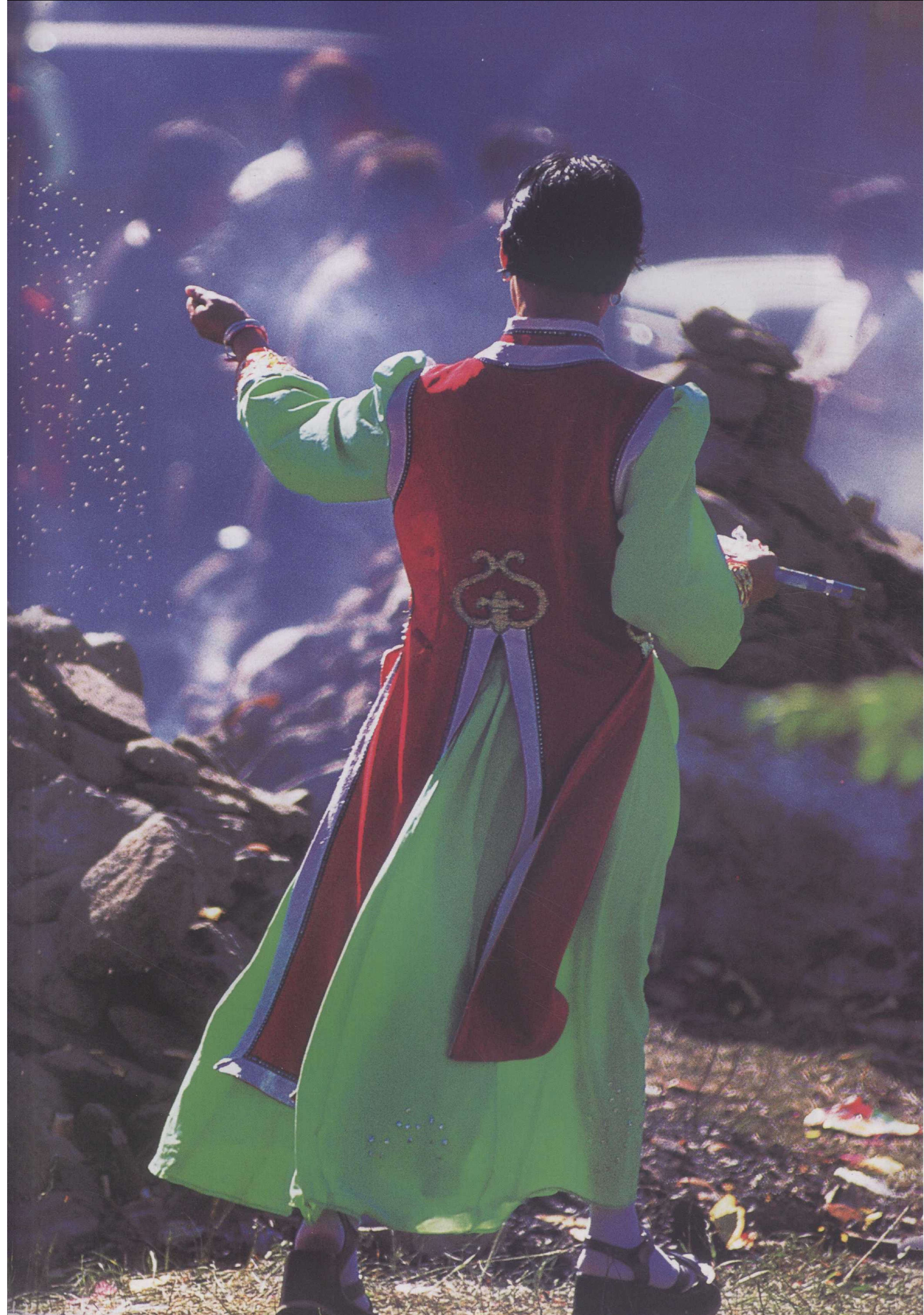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刘睿　图片编辑/何亮　版式设计/许丽娟

女真

跨越三千年的兴亡悲欢

撰文／祝勇　摄影／祝天华等

女真这个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间的民族，在跨越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创造了诸多奇迹，其在历史上建立的几个王朝曾一度刷新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纪录，成就了女真族几个世纪的辉煌。女真人和他们的后裔在神奇而瑰丽的黑土地上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跌宕起伏的长歌。



隐藏在文献中的族源密码

乾隆四十二年（1777）七月的和珅，突然忙碌起来，乾隆皇帝宣旨，指明他与另外三位大学士，即阿桂、董诰、于敏中，担负起为他们民族考辑源流的重要使命。深谙乾隆心思的和珅，当然不敢怠慢。这是清朝建国后一次规模庞大的官方修史活动，是一次文明的逆向之旅，它的意义对于这个第一次掌握全国政权的民族来说，可想而知。这个富于文化责任感的皇帝，希望自己的目光在穿越重重的宫墙与雾霭之后，能够看清这个民族被荒寂的林野覆盖的来路，并通过上天的暗示，确定自身的执政合法性。

“女真”这一名词出现在历史视野中，最早是在五代。我们查阅《大金国志》，可以知道，五代时，契丹人称黑水靺鞨为女真。在《金史》中，我们还可以查到对当时生活在辽阳以南的“熟女真”的生活纪录。

这些几乎是对女真民族的最早纪录，问题是，女真民族的历史，是否自五代以后才开始，我们的目光，能够穿透岁月的尘障，看出多远呢？

一部名为《松漠纪闻》的文献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这部书中写道：“女真即古肃慎国也，东汉谓之挹娄，元魏谓之勿吉，隋唐谓之靺鞨，其属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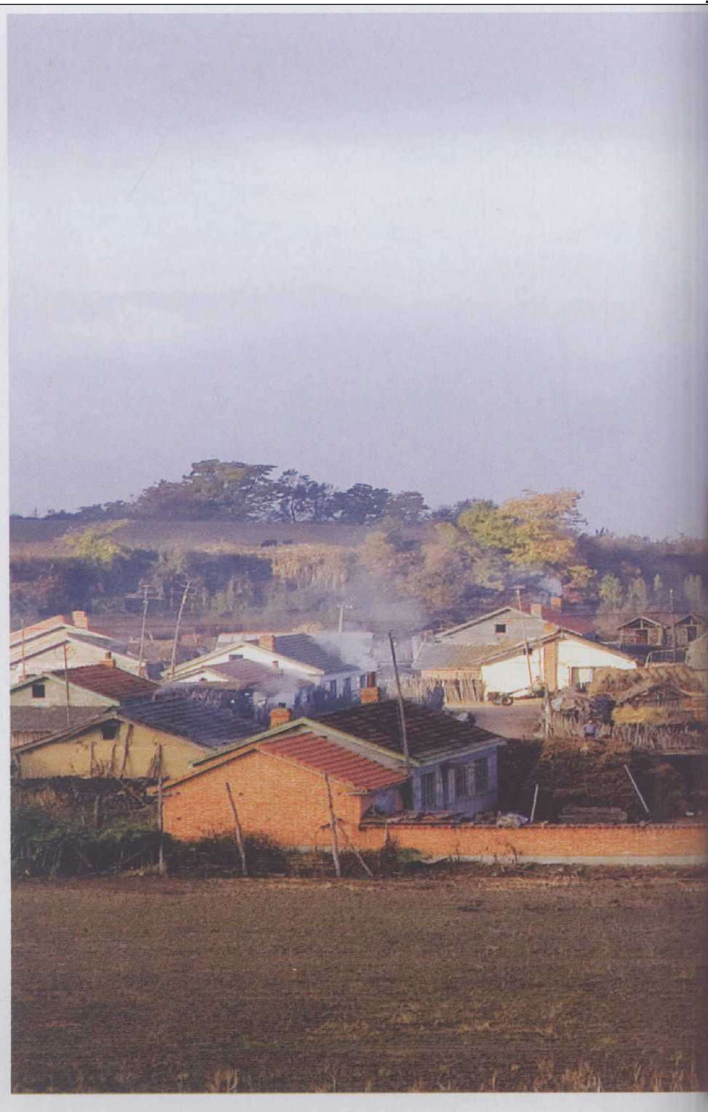
而在和珅书稿的“部族门”中，在阐明“满洲”为“本部族名”之后，也有这样的上溯：肃慎、夫余、挹娄、三韩、勿吉、百济、新罗、靺鞨、渤海、完颜、建州，这一脉络，显然与《松漠纪闻》的记载一致。1777年九月初八，和珅等给皇帝上奏，请求皇帝为这部著作定名，第二天，他们得到了皇帝的批示：“知道了，书名著定为《满洲源流考》，钦此。”

《松漠纪闻》仿佛一部重要的密码本，使古代文献中那些晦涩难懂的字句变得条理清晰。因为从中国古代早期文献中，我们可以寻找到肃慎（息慎）的名字，并且知道，这一古老的名称，与辽宁地区那支部落的联系。

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在历史中保持一脉相承的关系。任何历史的书写者都无法回避它们的存在，于是，女真人的历史，就自然而然地包裹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历史中。

五帝时期，北方朝贡的就有“山戎、北发、息慎”。周朝帝王认为，“肃慎、燕、亳，吾北土地。”

一群远方飞来的隼鸟死在陈国的宫廷上，每只身上都带着一支楛矢石砮，一种木石制成的箭镞，显然，是那种特殊的箭镞，改变了它们的飞行方向，使国君的宫殿成为它们的坟



墓。它们以死亡的方式使陈国国君得到了意外的礼物。国君并未因死鸟的降临而产生不祥之感，相反，他对从天而降的礼物感到新奇和兴奋。那礼物，就是刺在隼鸟身上的新式武器——楛矢石砮。陈国国君——陈湣公对它的秘密一无所知。于是，他派人找来了周游列国途经陈国的孔子。从孔子口中，他第一次听说了“肃慎”这个名字。孔子的回答是：“这些隼鸟来自很远的地方，楛矢是肃慎人制造的。过去周武王灭殷，势力扩大到九夷百蛮，命令各以本地名产朝贡，于是肃慎就贡了楛矢，石镞长一尺八寸……你们可以到旧的府库里去找一找。”陈湣公派人去找，他们在金柜里找到的楛矢石砮，居然与孔子的描述一模一样。

透过孔子浓重的山东口音，陈国国君得知



上：位于宁安兴隆寺的渤海古国石灯幢。摄影/肖殿昌

下：女真人在长白山中完成了无数次的部族力量重整。因此，历代女真人创建的政权都将长白山视为“兴亡之地”，先后封其为“护国灵应王”，“开天宏圣帝”。图为长白山蛟河红叶谷风光。摄影/徐美厦

女真人在自己的始祖神话中，最早置入了“满洲”这个词语，试图以此证明，“满洲”是一个古代国家，是以后女真人建立的所有国家的渊源。

了楛矢石砮的秘密，而我们，则从孔子那里打探了有关那支古老部族的消息，并且，根据孔子的描述，揣测他们的强悍不羁和精通骑射。所幸，《国语》记录了这段故事，使得那支古老部族的消息，没有消失在历史的杂音中。

由于女真族以口传的方式记录他们的历史，直到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才开始大规模编纂早期的历史文献，所以，我们只能在中原汉族政权的文字史料中，搜寻这一民族的影像来印证女真的历史。好在那些史料并没有使我们失望，在史料的引见下，我们与女真族一再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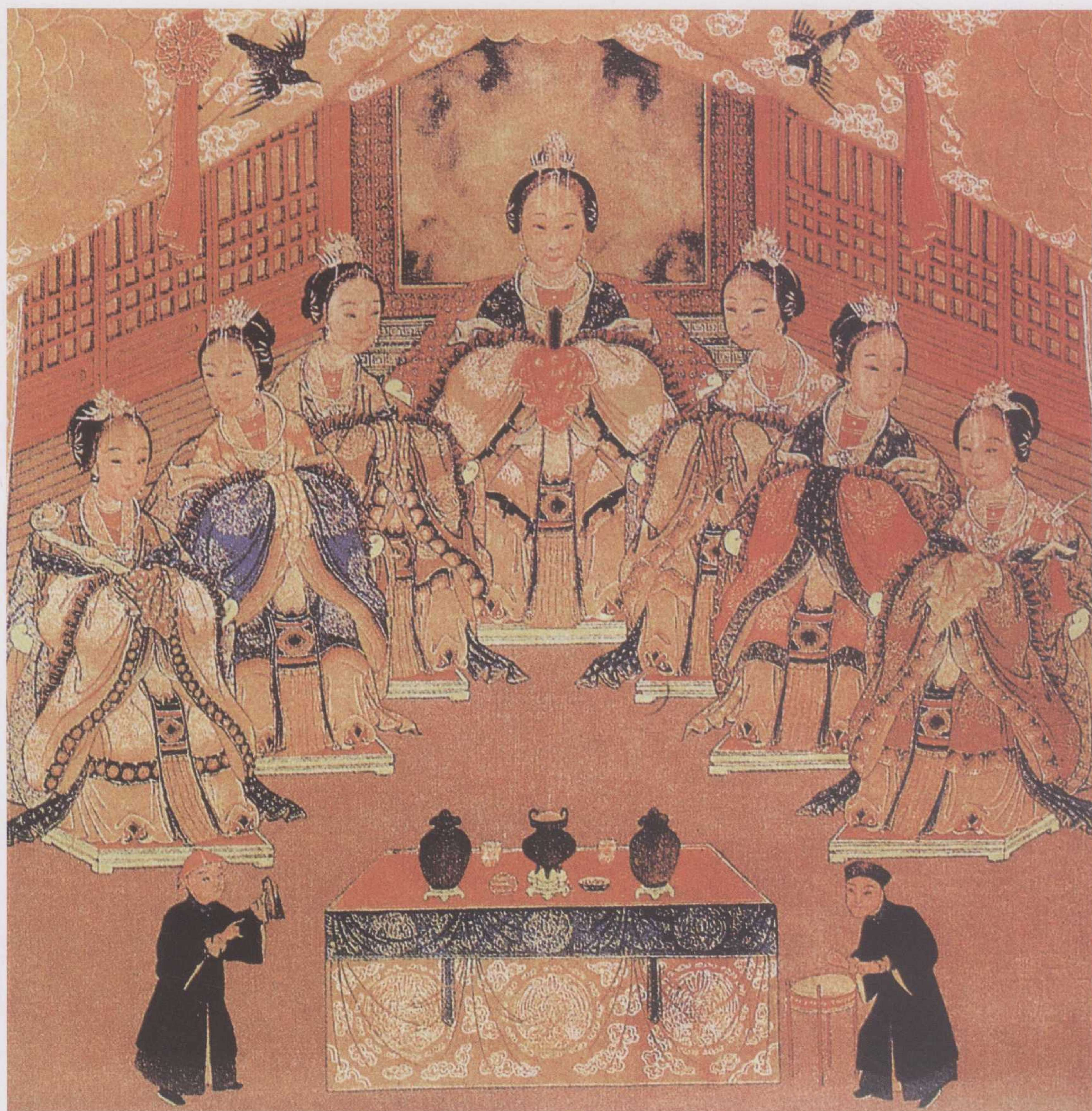
无论是舜禹、夏商、春秋时代的肃慎，入汉以后的挹娄，魏晋时的勿吉，隋唐五代的靺鞨，在历史中都保持了一脉相承的关系，环环相扣。通过《松漠纪闻》的导引，我们得以将那些松散的词汇联系起来，连接成一个民族复杂多变的史诗。他们的身影在《尚书》、《左传》、《国语》、《史记》、《山海经》、《后汉书》、《三国志》、《魏书》、《晋书》、《隋书》和新旧《唐书》等典籍中神出鬼没，并且日益占据着重要的篇幅。《隋书》中专设了《靺鞨传》，将这一民族分为七部：粟末部、伯咄部、安车骨部、拂涅部、号室部、黑水部和白山部。在《唐书》中，这一民族的活动区域为：“东至于海，西接突厥，南界高丽，北邻室韦。”任何历史的书写者都无法回避它们的存在了，于是，女真人的历史，就自然而然地包裹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历史中。



天命玄鸟与一个国家的诞生

当我们开始把视线投向女真民族的时候，我们显然不能忽略一只神鸟的存在。它为女真族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富于抒情意味的开始。在女真族的神话中，佛库伦是天上的三位仙女之一，她还有两位姐姐——恩古伦和正古伦。三位仙女在补库里山下的布勒瑚里池洗澡的时候，一只神鸟把它衔着的朱果放到佛库伦的衣服上。接下来的一切显示了神话的超现实色彩——佛库伦把那颗朱果放在指尖，在阳光下端详良久。那颗果实在阳光下发出神异的色彩，佛库伦将它含在嘴里，并且咽下去。不久，她怀了孕，无法飞上天了。姐姐们说：“你是天授妊娠，等你生产以后，身子轻了再飞回来也不晚。”她们飞走了，而佛库伦，则在不久之后，生下一名男婴。

那名男婴就是布库里雍顺，女真人的始祖。作为大自然的传人，他与神话里的各种始祖一样，有着超自然的力量。人们见到他，都不约而同地顶礼膜拜。他娶了一个名叫百里的女子为妻，并在长白山以东的鄂多里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满洲，而他的子



上：佛库伦仙女图。传说仙女佛库伦吞下神鸟衔来的朱果而受孕，后生下男婴布库里雍顺，他是满族的始祖。画中正中者为佛库伦。

左：金代皇帝车辇上的铜坐龙，现藏于阿城金上京博物馆。

孙后来又在距鄂多里城西方1500余里的赫图阿拉，建立了大金国（后金）。

作为大地与天空的连接物，在人类的早期思维中，乌成了超越现实的灵物，一种带有神异色彩的生命。女真人为他们的起源，提供了一种充满神性的解释。清太宗即位后主持编纂女真族早期文献时，对这一起源神话予以浓墨重彩的表达，这表明了这一起源神话的重要性。那是天聪九年（1635），当后金的版图已向西扩大到漠南蒙古时，皇太极发布御旨，禁止本族称诸申，只能以满洲相称。御旨内容如下：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之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

称。（摘自《清太宗实录》）

皇太极认为诸申的名称“与我国无涉”，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而以满洲命名他的国家，意在强化他自己的君权地位。但实际上，在布库里雍顺的时代，它仅仅是一个部落名称而已，与国家的概念相距甚远。

春秋、战国之际，肃慎的名字突然从中原先秦史籍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真番”这个生僻的新词。汉武帝平定朝鲜，设置四郡，真番就是其中的一郡。真番的方位，恰巧与肃慎从前的位置重合，可见，它们同属一块地域，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到后汉时，真番的名字又从史籍中消失了，挹娄这一称谓，则浮现出来，而肃慎的名字，有时与挹娄并用。《后汉书》中说：“挹娄，古肃慎之国也。……自汉兴已后，臣属夫余。”从北齐天保五年（554）的历史档案中，我们还能查找到有关肃慎遣使朝贡的记载。但从此之后，就再也见不到肃慎入献中原的记载了，而后，勿吉、靺鞨、女真，又相继出现。这一民族名称的更替，与中原王朝的朝代更迭相呼应，它们构成某种平行关系，自成体系，又遥相呼应。

根据恩格斯对于国家的定义，女真人在自己的文明源头建立的满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后汉书》中所提到的夫余，则被认为是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第一个建立政权的民族。它约建国于公元前2世纪，公元494年“为勿吉所逐”，宣告灭亡，存在了600多年。

朱蒙高句丽王朝存在了705年之久，它的寿命超过了任何一个中原王朝，除了女真人自己的记载，从中原王朝的记载中，我们很容易窥视到这个国度庞大的身影。

东方卫城和海东盛国的崛起

在夫余身后，白衣彩衫的朱蒙高句丽飘逸出场，被15个世纪以前辽河平原的阳光照亮。朱蒙高句丽兴起于浑江谷地，于公元前37年建国，在历经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之后，于公元668年灭亡，存在了705年。

高句丽这一名称，可以追溯到朱蒙立国以前，现在的辽宁省新宾县，就有一个地方，是以此命名。在这里居住的貊人，就被称作高句丽。高句丽的族源问题，是一个敏感问题。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学者王健





上：在群山环抱的东北通沟平原上，现存的近7000座高句丽时代墓葬，堪称东北亚地区古墓群之冠。古墓群中以将军坟（左图）为代表的十几座大型高句丽王陵以及大量的王室贵族壁画墓，是高句丽建筑技艺、艺术成就达到顶峰的一个缩影。 摄影/于志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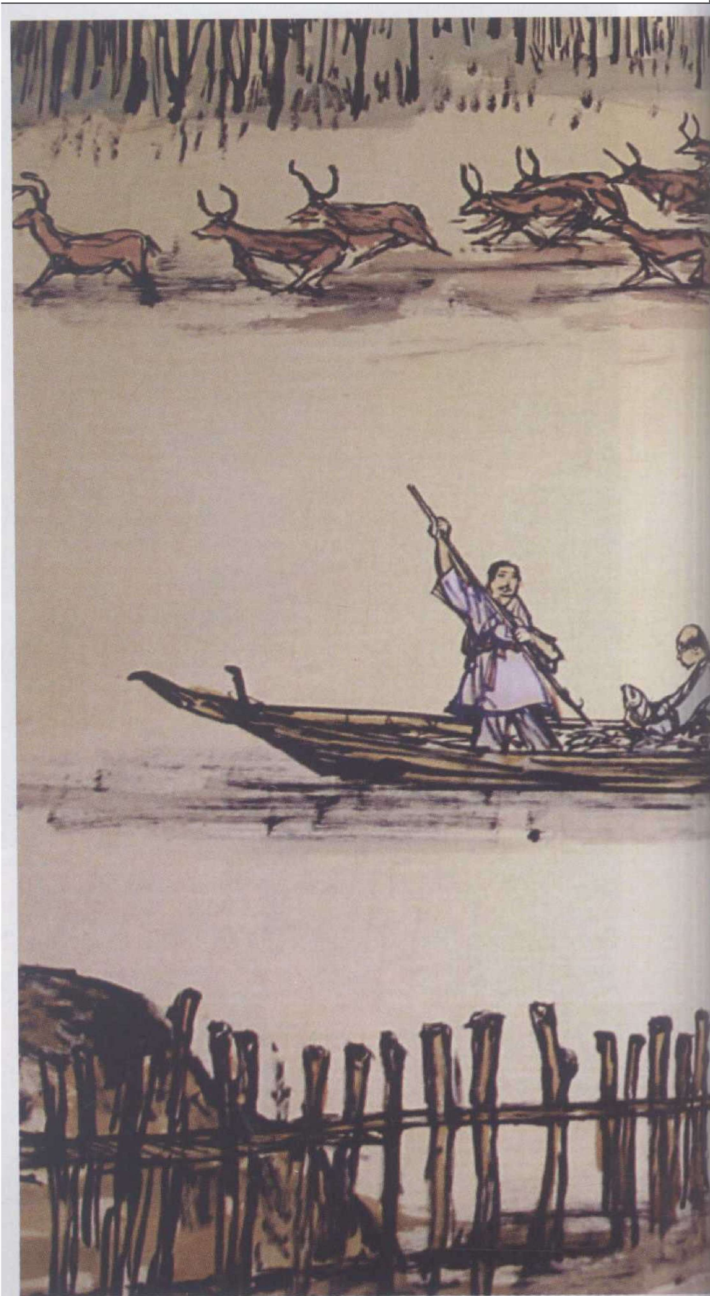
群认为，“高句丽人来自夫余，夫余是肃慎系统的通古斯族，即后来的女真族。高句丽人也应该是肃慎人的后代，与女真人同一族属。”公元前1世纪，来自蒙古草原的夫余族大规模东迁，被广袤的东北大地所接纳。一部分夫余人从夫余国中脱离出来，向东南进入浑江流域。史书对此提供了证明：《魏书》记其父为夫余王，母为夫余王侍婢。由于朱蒙有智谋，善骑射，遭到嫉恨，才南逃避祸，来到沸流谷卒本（忽本）川之地建国称王，即卒本夫余。卒本川，就是今天浑江与富尔江交汇处（辽宁桓仁一带）。浑江、富尔江下游陆续出土的3750座高句丽早期古墓，为史书提供了最有力的注脚。1960年的《考古》杂志登载文章指出：这里是“早期高句丽族长期居住过的中心地区之一”。《魏书》还提到一个陌生的名字——纥升骨

城。从中我们可知高句丽都城的位置，就是纥升骨城，史学家们认为，纥升骨城，就是现在辽宁省桓仁县境内的五女山城。

即使以今天的目光来看，高句丽的城池也是无比巨大的。它们以巨大的形骸，抗拒着黑夜和岁月蚕食。它们一般建在山上，三面高山峭壁围绕，这使它们具有了军事上的实用性，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具有浓郁的中世纪城堡特点，同时增加了技术上的难度。甚至有国外学者将它称为"东方的卫城"。纥升骨城建立在辽宁桓仁五女山山顶，南面下临悬崖，西面利用山势作屏障，东北随山势，取石筑墙，陡峭的山城，在北方的寒风中显得格外挺拔和威武。这些古代城池不仅与军事、建筑、美学密切相关，还关系到高句丽人险中求生的生存哲学。这些山城十分坚固，所用石材，都经过加工，依据城墙的位置和具体条件，选择适当的石头材料。城墙的地基，根据各不相同的地形和地质条件，用大小不一的石子加工夯固，使之能够承受城墙自身压力，防止水土流失。城墙使用大块巨石作基础，纥升骨城最大的基石长达2米，然后用加工成四角方锥的巨石自下而上依次堆砌。

纥升骨城城墙建筑的高度和斜度，与建筑学和军事行动的要求十分吻合。经测定，其倾斜比率的数值与现代石筑墙壁的倾斜比率几乎一致。

城墙建筑的高度和斜度，与建筑学和军事行动的要求十分吻合。经测定，其倾斜比率的数值与现代石筑墙壁的倾斜比率几乎一致。尤其是采用阶梯状加固设施和防止滑坡等独特的石彻方法，从而增加了墙垣的稳定



右：女真人主要生活在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带，这种地理环境使他们与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着明显的区别。历史上的女真族基本上是一个狩猎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兼有渔猎、农耕和畜牧三种形态。需要说明的是，女真人的畜牧业与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据1125年出使金朝的宋人钟邦直描述说，金源内地会宁府一带，"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家……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这是作为渔猎和农耕经济补充成分的定居畜牧业。　供图／袁心海

右上：金代女真族使用的青铜蒸馏酒锅。　摄影／袁心海

性。城门、瓮城、女墙、雉堞、角楼、暗水、水门等各种设施和细节一丝不苟，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这一不朽建筑，在2004年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与吉林省集安的丸都城、国内城等一道，作为“高句丽的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高句丽王朝存在了705年之久，它的寿命超过了任何一个中原王朝，除了女真人自己的记载，比如和珅等四位大学士联手打造的《满洲源流考》以外，从中原王朝的记载中，我们很容易窥到这个国度庞大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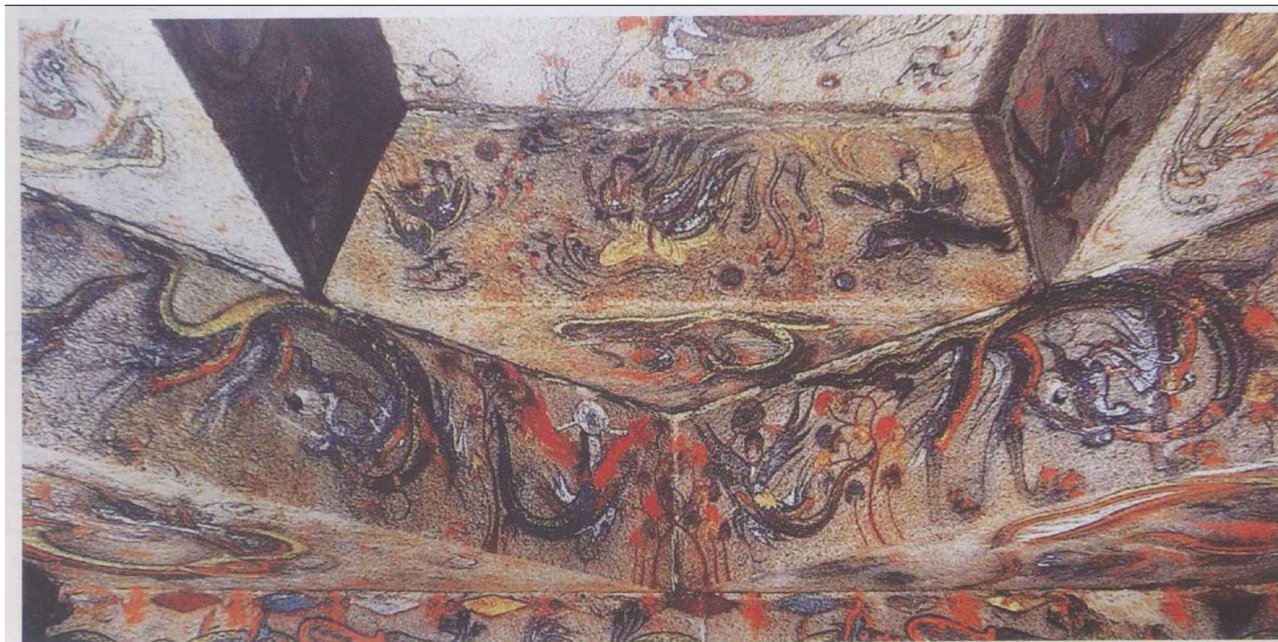
渤海国是女真历史上出现过的最强盛的王国之一。
这个国家孕育了一套华丽的典章制度和奇丽的文化。

比如，从我们熟悉的《三国志》中，居然能够看到这片辽阔的北方国土："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秽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都于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户三万。"辽东，就是今天的辽阳，而那时的首都，已经转换为"丸都"。

权力的更替从来没有空隙，一个王朝的衰落，意味着另一个王朝的必然崛起。698年，即唐代武则天时期，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乘契丹李尽忠反唐的时机，率部东迁，在今东北东部地区建立了一个地方二千里、户十余万、兵数万人的震国。开元元年（713），唐玄宗李隆基派遣鸿胪卿崔忻前往震国，设渤海都护府，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从此，"去靺鞨名号，专称渤海"，女真民族的称谓再次发生更替。而这个国家（隶属于大唐王朝的区域性政权），也被称为渤海国。关于渤海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以粟末靺鞨为主体，联合部分夫余、沃沮、高句丽等族集聚而成。渤海国至辽太祖天显元年（926）被契丹所灭，存在了229年。其疆域最大时，版图包括现今吉林省、黑龙江省大部和辽宁省部分地区，北达俄罗斯滨海地区，东南至朝鲜咸镜北道、南道、两江道和平安北道的一部分，是在东北亚十字路口上出现的一个关键性的政权，被称为"海东盛国"。

渤海国是女真历史上出现过的最强盛的王国之一。这个国家孕育了一套华丽的典章制度和奇瑰的文化。如同唐朝一样，这一政权的中央政府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为：政堂省、宣诏省和中台省，分别相当于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而六部分别以忠、仁、义、智、礼、信命名，与唐朝的吏、户、礼、兵、刑、工遥相呼应。渤海的地方政府如同唐朝一样，也实行府、州、县制，军队亦仿唐制，设立十卫，每卫设大将军、将军各一人统领，表明它们强大的文化吸纳能力。

在典章之外，宫殿城池在茁壮成长，并且被各种精雅的器皿所修饰，即使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精制的玛瑙柜、紫瓷盆、玳瑁杯、千佛小像、金耳环、骑马铜人、石狮、石龟、莲花瓦当等等，《古今图书集成》里有对玛瑙柜的描述："玛瑙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





上：砖雕上的女真族人身披胄甲、双目圆睁，手握兵器，脚踏战马，一副好战的神态，不禁使人联想到千年前女真人征战沙场的场面。

左：集安高句丽壁画墓记载了女真族的特殊文化，壁画的内容大多是高句丽王公贵族家居、宴饮、歌舞、百戏、出行等社会生活。 摄影/迟海峰 新华社

工巧无比，用贮神仙之书。”

渤海国并没有像契丹、蒙古那样创建自己的文字，而是沿用了中原的汉字。但是，考古工作者从渤海遗址中发现一批带字瓦，上面的字迹多为汉字，此外，还夹杂了一些看上去很像汉字，却又无法认读的怪字，比如：“仫”等。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解释。日本学者稻叶岩吉认为，它们是“渤海创制的文字，类似日本的万叶假名。”也有学者认为，这是采用新罗的吏读而创制的文字。著名史学家金毓黻认为，它们是“渤海人特制之字，以表特有之音”，用以表示靺鞨人特有的发音，补充汉字之不足。如今，那些发音与古代靺鞨人的嘴唇一道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我们站在遗址上，对昔日王朝的想象。

金戈铁马入梦来

如同名字一样，金朝是带着金属的光泽进入我们视野的。完颜阿骨打在1115年称帝的时候，对他的国号作出如下解释：“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这位金朝的太祖从一开始就把他的崭新王朝坚硬的质地，作为他的信念。正像完颜阿骨打所描述的，与这个满怀新锐之气的新王朝相比，那个已经维持了二百年的契丹王朝，已显示出衰败之态。

辽天祚帝几乎与所有的末代皇帝有着相同的癖好，史书将他的习性概括为“耽乐无厌，不恤国政”，“禽色俱荒，嬖倖用事”作为对于皇帝的配合，契丹贵族们开始争相到女真民间渔色。“银牌天使”作为一个刺目的名字出现在史籍中，对于契丹人而言，它意味着骄傲——所有派往各地的使者，都会佩带一枚银牌，他们因此而得名；而对于女真人而言，则意味着邪恶，因为与这个优雅的名字相反，“天使”们专营着魔鬼的勾当，不仅贪纵骄横，而且恣意玩弄女性。起初只要女真民间待字闺中的少女陪宿，后来求“海东青使者络绎，恃大国使命，惟择美好妇人，不问其有夫及阀阅高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女真人是在契丹人的逼迫下，跃上历史舞台的。

实际上，天祚帝耶律延禧与完颜阿骨打于1112年有过一次会晤，只是那时的完颜阿骨打还仅仅是辽国治下一个女真部落的首领。那年，天祚帝到春州巡游，完颜阿骨打作为酋长之一前往朝见。这或许是他们平生唯一一次会面，这次会面显露了阿骨打不甘居耶律延禧之下的野心——在宴席间，所有亲王长都起舞为皇帝助兴，只有完颜阿骨打面无表情，一动不动。他的这一“举动”，当然无法逃脱天祚帝的眼睛。即使在载歌载舞的宴席上，天祚帝仍然感受到一种不祥的杀气。尽管阿骨打什么都没做，但是，他的不做，在这却意味着挑战，对皇权的挑战。宴席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天

如同名字一样，金朝是带着金属的光泽进入历史舞台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从一开始就赋予他的崭新王朝以坚硬的质地，作为他的信念，新锐之气明显强于正走向衰败的契丹王朝。

祚帝一言不发，双目紧盯着完颜阿骨打。完颜阿骨打岿然不动。这是一场心理上的较量，是他们兵戎相见之前的一场预演。

1114年，一个名为阿疏的首领，从女真部落中叛逃，投奔辽国，把完颜阿骨打准备秘密起兵的消息，透露给辽国。愚蠢的辽国此时并没有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而是给完颜阿骨打去了一封信，对他进行指责。这已经证明了辽国的昏弱无能，而完颜阿骨打的回信，则义正辞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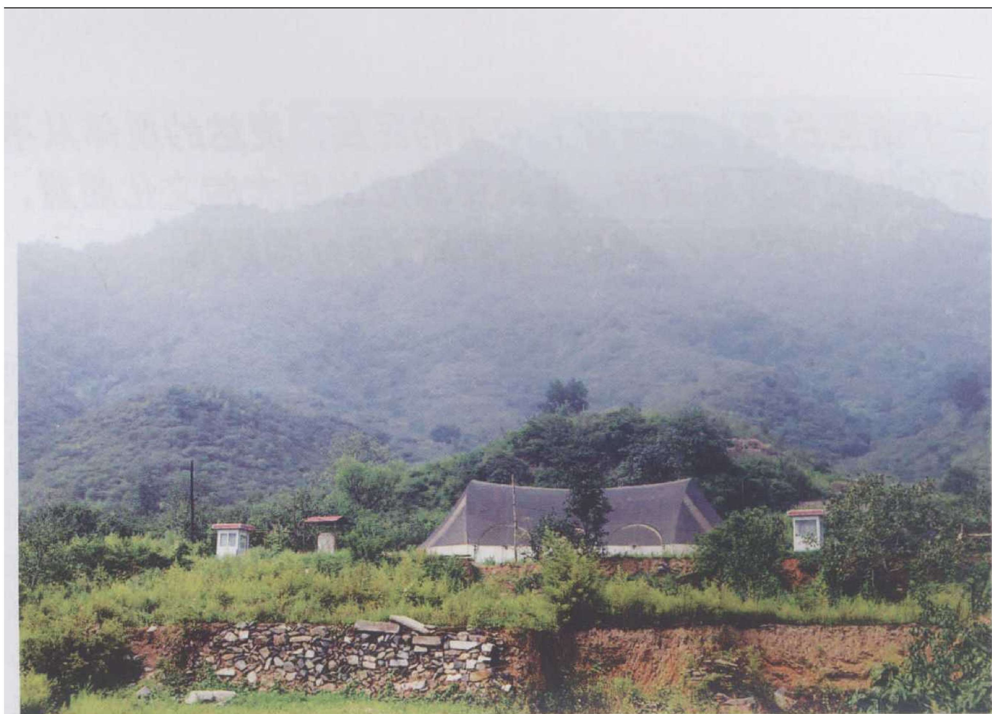
我们是附属小国，遵从大国不敢缺少礼节。而大国不但不施加恩惠，反而包庇罪人，用这样的办法来安抚小国，小国能不心怀不满吗？如果把阿疏交还我们，我们就进行朝贡。



如果不能满足我们的条件，我们难道能束手就擒吗？

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来流水畔成为完颜阿骨打率军誓师反辽的壮观现场，这时是1114年9月，辽河平原的收获季节。金色的戈矛在麦浪中熠熠发光。所有的锋刃在呐喊声中汇集成一股洪流，以强大的势能，冲向大辽的城池。1116年5月，金军在照散城歼灭辽军6万人之后，乘胜进攻沈州（今辽宁沈阳），进行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史书以简练的笔触写道："五月，斡鲁与辽军遇于沈州，败之。进攻沈州，取之。"

1123年，完颜阿骨打在节节胜利的凯歌里去世，其弟完颜晟继位。两年后，溃逃的天祚帝在山西应州，被金兵重重包围。无奈之中，



上：完颜阿骨打是女真族的杰出首领，1123年在伐辽途中病逝，葬于金上京宫城之西南，并在陵上建有宁神殿，又称太祖庙。后又迁移至北京房山县，称为睿陵。陵址现高约10米，周长约100米，宁神殿早已倒塌，但大量的建筑构件尚存。

下：金朝的套马图，又称"二骏图"，骑马者梳裹头长辫，身穿圆领窄袖裘服，生动描绘出金朝女真骑士的形象。



一个披坚执锐、在马背上冲杀的民族，发达的肌体从不拒绝文化的浸透与滋润，居然还释放出巨大的文化能量，这一点，或许出乎金国创立者完颜阿骨打的意料。

天祚帝，对金兵说：

“我就是大辽天祚帝！”

金兵上前绑他，他奋力挣脱，大声喝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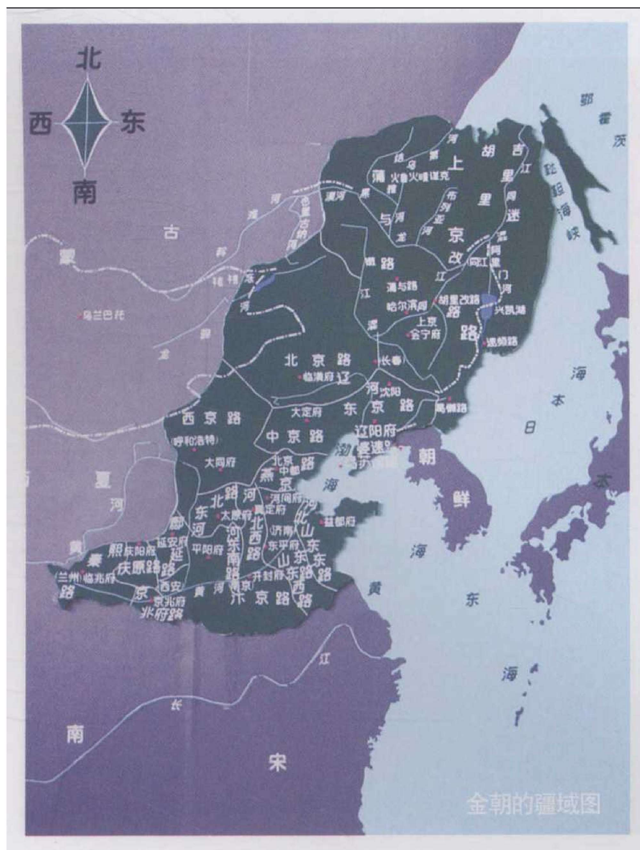
“放肆！你们敢绑天子吗？”

金将完颜娄室策马到天祚帝面前，翻身下马，跪地作揖，说道：

“奴婢不才，乃以甲胄冒犯天威。请陛下下马！

天祚帝凄然一笑，下马。马鞍上的王朝，在他的下马动作中，悄然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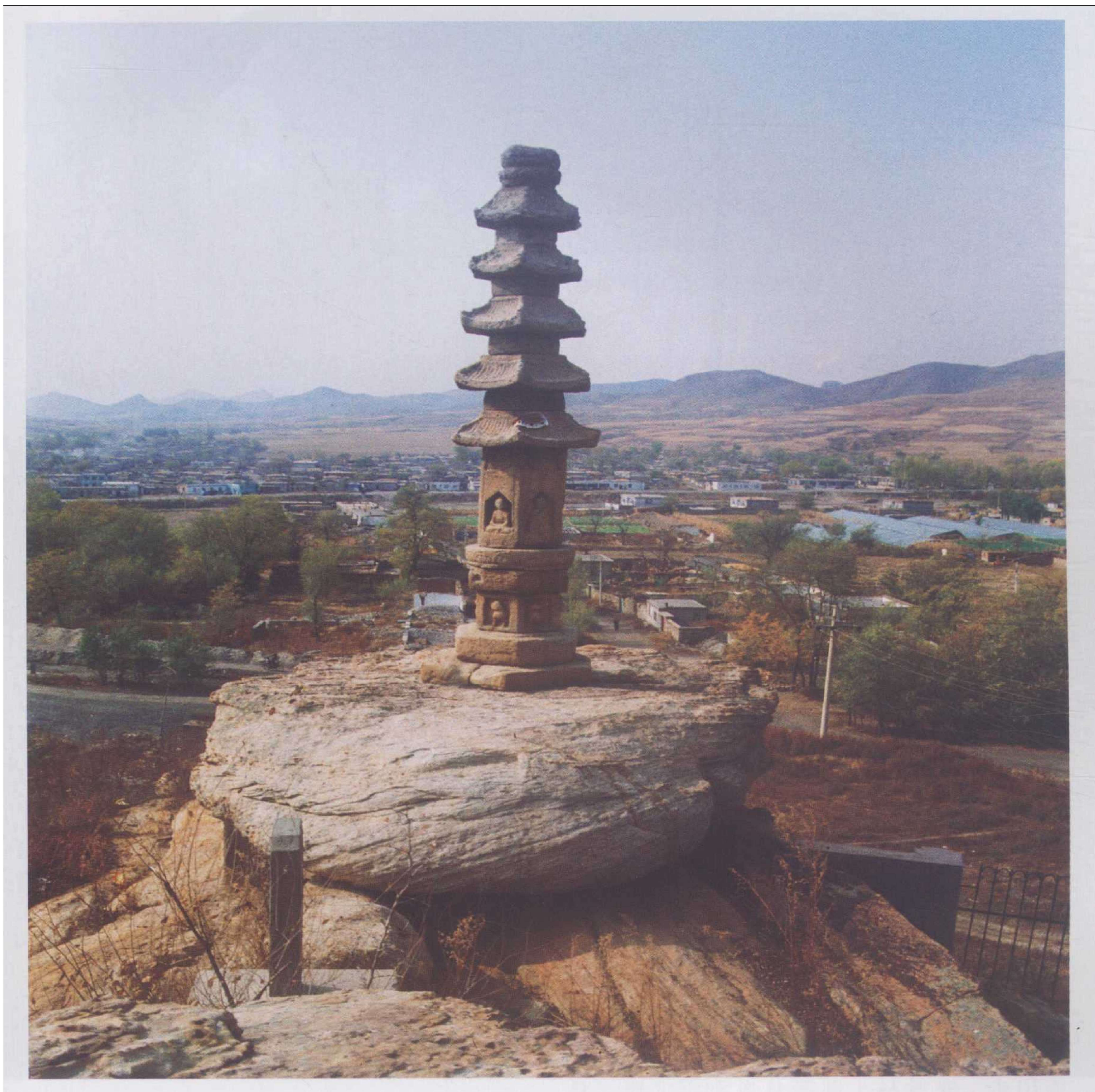
1234年金哀宗自缢，完颜阿骨打开创的基业在存在了120年以后，被蒙古人灭亡。但他们毕竟创造了自己的辉煌。这个披坚执锐、在马背上冲杀的民族，发达的肌体从不拒绝文化的浸透与滋润，《金史》表明：“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并进而总结道：“金用武保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一个以武立国的王朝居然释放出巨大的文化能量，这一点，或许出乎金国创立者完颜阿骨打的意料。应当承认，依靠这些凭借原始的热情与冲动生活和搏击的身躯，北方大地迎来了自渤海国之后的又一文化鼎盛时期，在书法、绘画、文学、舞蹈、音乐几方面达到高峰。1125年，金军灭亡辽国之后，乘胜挥师南下，直捣黄河岸边，威逼北宋首都汴梁，此时，金国咸州（今辽宁开原）的一场酒宴，也进入了宋朝派往金国求和的使臣许亢宗的笔下：“每乐作必以十数人高歌以齐管籥，声出从乐之表。”“又有五六妇人，涂丹粉艳衣立于百戏后，各持两镜高下其手，镜光闪烁……”在国难当头时刻，如此精妙唯美的文字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它向我们保留了金国文化的原始标本。这类手持双镜的舞蹈，类似于萨满教中身着彩衣，手持鼓铃的表演形式。在时隔近七百多年之后，我们通过金代的出土文物——比如：双鱼纹铜镜——看到了许亢宗文字里的镜子。



金朝的疆域图

十三副铠甲的神话

历经沧桑的女真族在进入明代以后，主要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1583年，一个叫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人凭借13副铠甲和不到100名士兵开始跃上历史的舞台，他的目标是成为女真的领袖。在努尔哈赤的统一大业中，起初，复仇是成就他的最大动力。由于受尼堪外兰的挑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在一场战役中被明朝军队误杀，复仇的愿望在努尔哈赤的血液里燃烧，并最终在这1583年5月化为一场军事行动。



上：这是位于辽宁葫芦岛南票区沙锅屯的石龙山石塔。古时有古塔寺，现仅存遗址。塔建于金王朝泰和6年（1206），在辽西，金代石塔仅此一处，也是女真族的唯一石塔。 摄影／安保全

左：金朝的疆域，东北到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北到外兴安岭，西北到蒙古国，西以河套、陕西横山、甘肃东部和西夏交界，南到秦岭、淮河与南宋对峙。金代共历经十代皇帝，存在了119年，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地方政权。 摄影／袁心海

尽管手中只有13副铠甲，但努尔哈赤还是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此时，来自苏克素护河部萨尔浒部的诺米纳，因同尼堪外兰有仇，联合本部落的另外三名小酋长，即噶哈善、常书、杨书，投奔努尔哈赤，成为他最早的盟友。然而，一个叫龙敦的人，却开始挑拨努尔哈赤与诺米纳之间的关系，导致诺米纳背叛了同努尔哈赤的盟誓。不久，努尔哈赤采用噶哈善等人提供的一条计策，兵不血刃地除掉了诺米纳，占领了他的萨尔浒城。1586年，尼堪外兰也成为努尔哈赤的刀下之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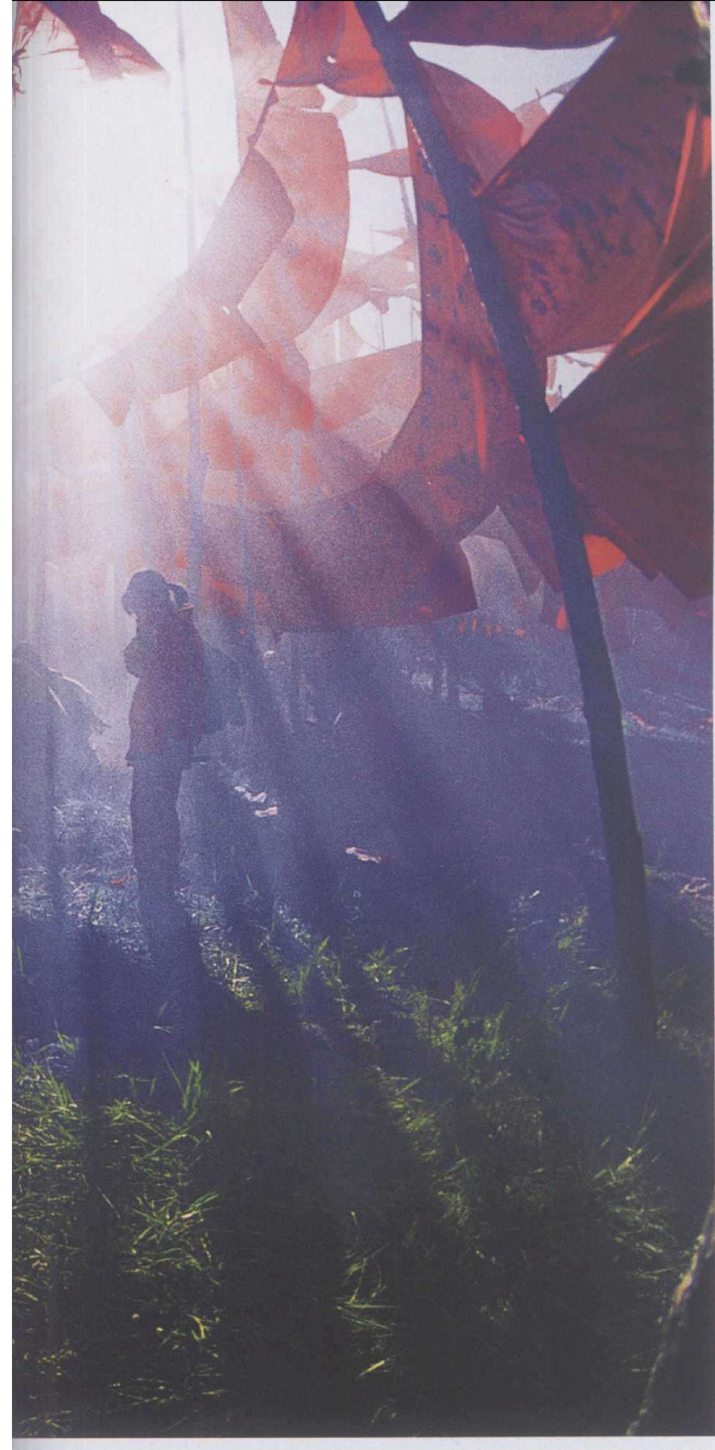
可以说，是仇恨引发了统一女真部落的战



争。1585年4月，统一女真的战争，在以赫图阿拉为中心的东西两侧艰难进行。努尔哈赤同他的弟弟穆尔哈赤领兵五百，西征浑河流域的哲陈部。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几乎冲溃了他们的军队。就在他们与洪水搏斗的时候，已经有人向对方告了密，托漠河、章佳、巴尔达、萨尔浒、界藩五城已经联合起来，准备共同对抗努尔哈赤。对此，努尔哈赤却一无所知，他依然带着所剩不多的人马，孤军深入。这场战斗的过程，史书上的记载并不很多。现在我们知道它的结局，那就是努尔哈赤胜利了，否则，努尔哈赤以后的故事将无法延续。而他究竟是如何取胜的，至今是一个谜。

应当说，努尔哈赤的目标，在开始时处于复仇阶段，统一女真的目标，则是试探性的。后者是由接踵而至的胜利送给他的礼物。复仇，依靠匹夫之勇加上适当的运气，就可以成功；而统一，除了锐不可挡的气势之外，更需要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和精密可行的战略。最后的胜利，不可能建立在运气之上。好在，血雨腥风已经让努尔哈赤意识到这一点。

实力的增强与野心的扩大永远成正比，



女真民族信仰萨满教，萨满教曾谱写过女真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篇章。作为女真民族的一种文化现象，萨满教是女真文化的摇篮。今天生活在北方的人们仍然保存了萨满祭祀的古老遗风。

现在，努尔哈赤的理想，已经不是消灭一两个对手，他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女真帝国。至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攻克完颜城，杀其酋长岱度墨尔根。至此，建州部所属的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或征服，或招抚，基本上归于一统。20年后，努尔哈赤的所有政敌，都已经从这块土地上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他的拥护者。当努尔哈赤把他手中的地图展开的时候，女真帝国已经真实地展现在面前了：它南自鸭绿江，北达黑龙江，东濒大海，西到辽东明朝长城，它的政治中心，于1603年，由费阿拉城，迁移到赫图阿拉。1616年正月初一，58岁的努尔哈赤，在连续征战34年之后，得到了应得的荣耀。这一天，天还没有亮，皇太极等诸贝勒、大臣们，就作出一个蓄谋已久的集体决议：我们没有汗时，忧苦极多，蒙天保佑，为使人民安生乐业，给降下一位汗，我们应给抚育贫苦人民、恩养贤能、应天而生的汗，奉上尊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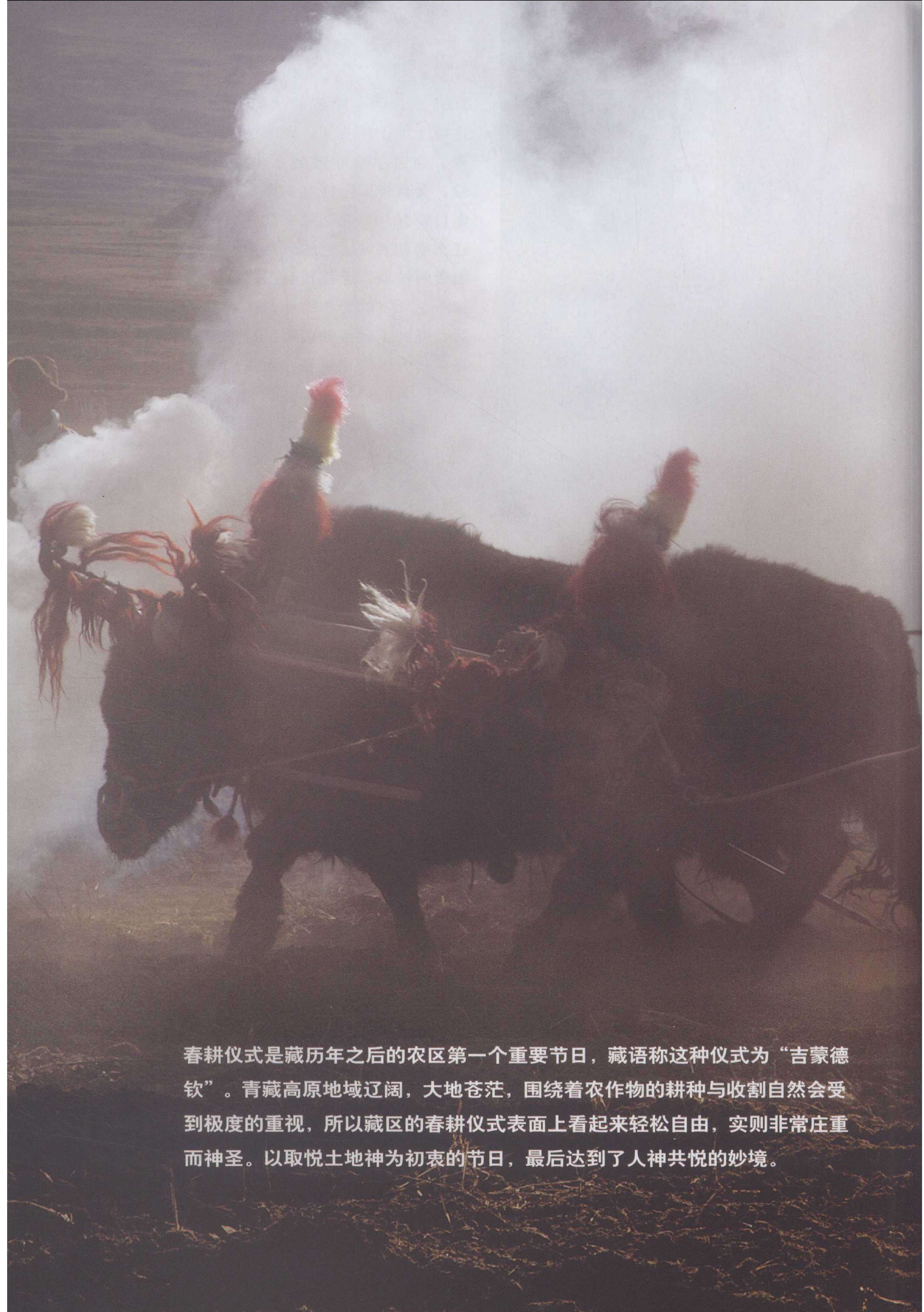
议定后，在以皇太极和他的三位兄长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为首的八旗诸贝勒、大臣的率领下，文武百官们各就各位。八旗八大臣从众人中走出，手捧文书，跪在前面。八旗诸贝勒、大臣率众人跪在后面。阿敦虾（虾，即侍卫）站立在汗的右侧，额尔德尼巴克什（巴克什，即学者）立于汗的左侧，从两侧前迎八旗八大臣跪呈的文书，奉于汗前，置于桌上。额尔德尼巴克什站立在汗的左前方，在黎明的寂静中，庄严地宣读上尊号：

“奉天覆育列国英明汗。”

刚读完，跪着的各位贝勒、大臣纷纷起身，努尔哈赤也从御座上站起来，走出衙门，向天空叩首三次，之后，努尔哈赤回坐在御座上，这次，他要接受八旗诸贝勒、大臣的叩首。人们行礼如仪。

从这一天开始，一个以“金”命名的朝代，进入中国的朝代序列中，只是为了与完颜阿骨打创立的金朝相区别，后人称之为“后金”。曾经一团散沙的女真人在努尔哈赤的聚合之下，终于变成铁板一块，出现在大明帝国的卧榻之侧。这时，一个更大的野心开始在努尔哈赤心中孕育，那就是吞并大明王朝。□

责任编辑/杨飞龙　图片编辑/杨剑坤　版式设计/杨东海



春耕仪式是藏历年之后的农区第一个重要节日，藏语称这种仪式为“吉蒙德钦”。青藏高原地域辽阔，大地苍茫，围绕着农作物的耕种与收割自然会受到极度的重视，所以藏区的春耕仪式表面上看起来轻松自由，实则非常庄重而神圣。以取悦土地神为初衷的节日，最后达到了人神共悦的妙境。

藏区
白定村的春耕节

撰文、摄影／王郢



2008年的藏历新年和春节在同一天，两天后的清晨，满天还是星星，我们从拉萨出发前往白定村采访当地的藏区春耕仪式。

白定村距离拉萨市区不足百里，出拉萨之后一直东行，向南转上土路穿过一个大村庄，是一片河谷，当地人说夏天这里河水流淌，绿树成阴，是附近的人们最喜欢的过林卡的聚会地。每到周末，河两岸都支起无数的藏式帐篷，人们尽情吃喝歌舞。在拉萨周边正渐渐疏忽传统的今天，这里依然按部就班地保持着藏区传统的风俗与细节。

中原人认为抬头三尺必有神明。而在西藏这样充满神秘气质的地区，更是信奉万物有灵。

春耕在藏区已经演变成取悦土地神的仪式。以拉萨为界，北边为牧区，南与东为农区。在以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心目中，没有什么比土地更神圣、更崇高。《西藏民俗志》主编、西藏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张宗显认为：春耕仪式本质上说就是取悦土地神的节日。

开春前的激动

清晨，我们到达的时候，村子里还是一片宁静。山谷底部泛着微微的蓝紫色，而山尖上已染上了潮红。每户宅院屋顶的经幡都是崭新而浓艳的，带着藏历新年的喜庆。村中的巷子还见不到人影，只有犬吠从四面八方传来，唤醒了村庄，带来了人间的气息。

每户的院子不知是根本不关还是一早便打开，探头往院子里看也还没有期望中的过节景象。也许还是太早。一位提着水桶打水的姑娘，羞怯却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她家里喝茶。一进院门，老人家已从屋里迎了出来，先进佛堂，藏柜上供着一排的佛像，佛像前供着酥油灯、水和各种食物。顺时针转着屋中间的柱子转过来，用手将“切玛”左边的青稞和右边的糌粑各扬撒三下。供台上摆满了藏历新年时才会有的油炸食品像个小塔一样。

在客厅的卡垫上坐下，阿妈亲手给每个人倒上酥油茶。第一次喝酥油茶须用无名指沾

春耕在藏区已经演变成为取悦土地神的一种仪式。以拉萨为界，东南片都为农区。在以依靠土地为生的藏区农民心目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土地更神圣、更崇高。



上：拖拉机的装扮基本上头夜就做好了，待早上开出院子时已是光鲜非常。牛的装扮需要一家人来共同完成，装饰物早已准备好，将牛牵出，饰物虽多但按程序逐一而上，转眼间，牛便焕然一新了。

左上：清晨的村庄，炊烟袅袅，远山缥缈。田间小路上，拖拉机在轰鸣，妇女牵着孩子背着祭品，匆忙赶路。一场仪式在没有开始之前便已呈现出了将有的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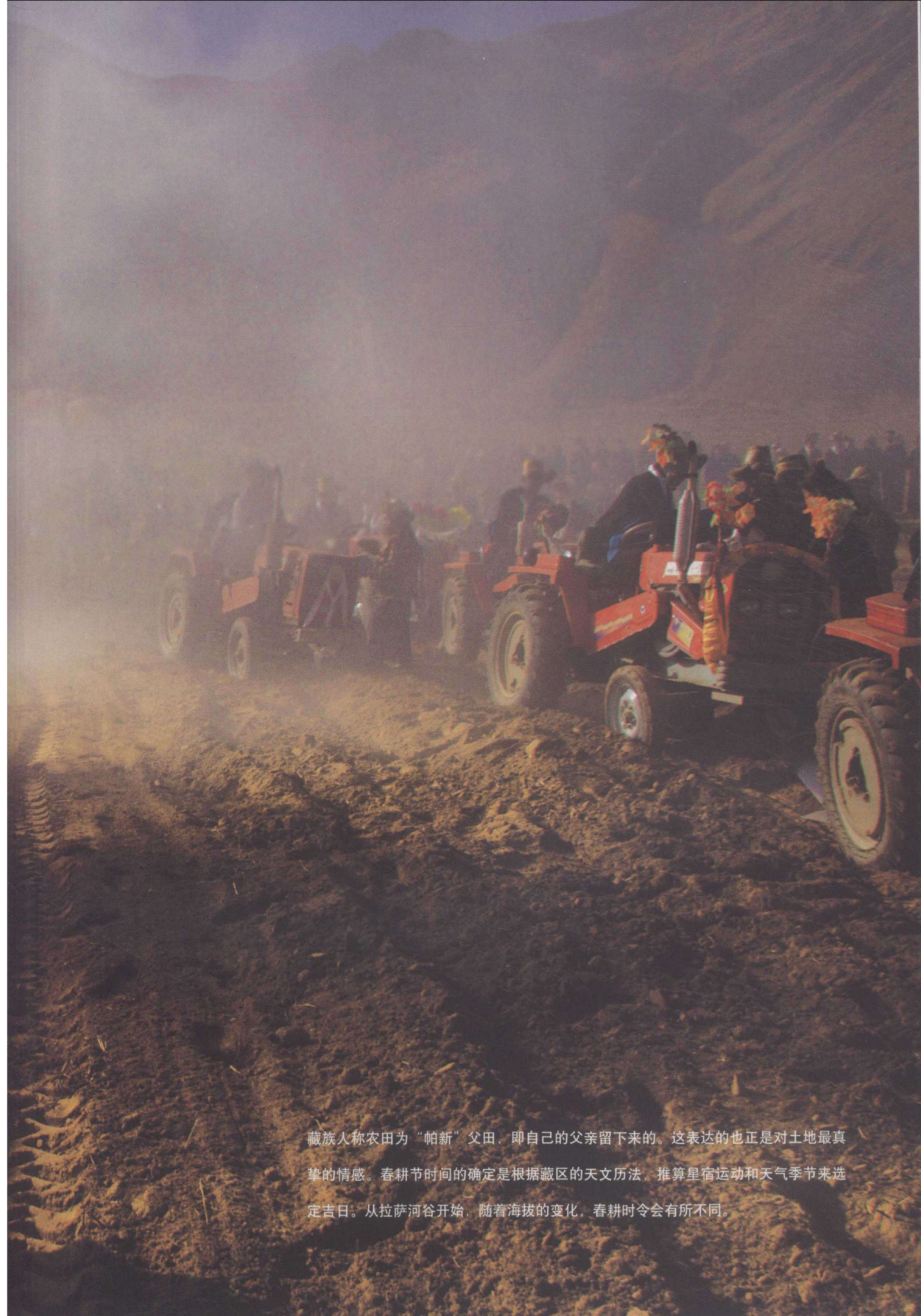
了茶，与大拇指相合向上弹，反复三次，然后才开始喝，意为祭拜神明在先。主人家的两个女儿都是在内地读的初高中，再考上了内地的大学。给我们续茶的宗嘎已经大学毕业，分配在那曲的一个镇上做中学老师，她戴着金边眼镜，穿着牛仔服。只有粗而黑的长长发辫还是纯正的藏族姑娘模样，在谈吐气质上她已与内地姑娘无异。而她正读大四的妹妹因为要准备考研今年就没有回家来过年。

倒过茶后，宗嘎在院子里给大约四岁的小外甥女整理艳丽的百褶公主裙。小姑娘穿着一双红色的小皮靴，头上扎着无数根小辫子。笑着问她为什么没穿小藏袍？小姑娘扭着身子不说话。宗嘎说：她就是说这个好看，说藏袍不方便。此时，一道阳光投在了边上小院的墙上，院子里的鸡正在觅食，牛在吃草，墙边的拖拉机已经用各种鲜艳的假花装扮得极其耀人眼目。

走出这个院子，立刻感觉到了热烈的节日气氛。既然是春耕，牛就一定会出任最为重要的角色。强壮的黑白花脸犏牛在这一天里“花枝招展”而又“无法无天”。它们的额头被贴上酥油花，犄角上插着经旗和鲜艳的毛花。肩上披挂彩缎，缎子上缀满贝壳和松石。尾巴上系着五彩的绸带。这一天的牛不仅气度不凡，更要有好酒量，即使没酒量，喝多了青稞酒四处狂奔撒野，主人家也决不会赶来教训，而且还会对此开怀不已，因为在农家看来这是兴旺发达的好兆头。

隔着一道贴满了牛粪饼的墙，听到院子里的牛叫。径直推门进院，狗见了生人急得





藏族人称农田为“帕新”父田，即自己的父亲留下来的。这表达的也正是对土地最真挚的情感。春耕节时间的确定是根据藏区的天文历法，推算星宿运动和天气季节来选定吉日。从拉萨河谷开始，随着海拔的变化，春耕时令会有所不同。



乱叫乱跳。女主人站在屋门口穿戴打扮得干净漂亮。有着红扑扑脸膛的她满脸是笑地边喝住狗叫边和我们打招呼。

男主人正在院中打扮他的牛。两头牛用一根粗粗的木柱子架在一起，挂上崭新的脖绳，尾巴上挂上染成红色的尾饰，耳朵两边垂着鲜艳的耳坠。最不可缺少的自然是铁铃，牛在一行一动之间叮叮当当招摇不止。作为有经验的牛，也许还记得去年此时的风光，此时表现得既兴奋又配合，四条腿不停地蹶着，扬蹄而奔、势不可挡。而牛一旦得到安顿妥当的信息，立刻夺门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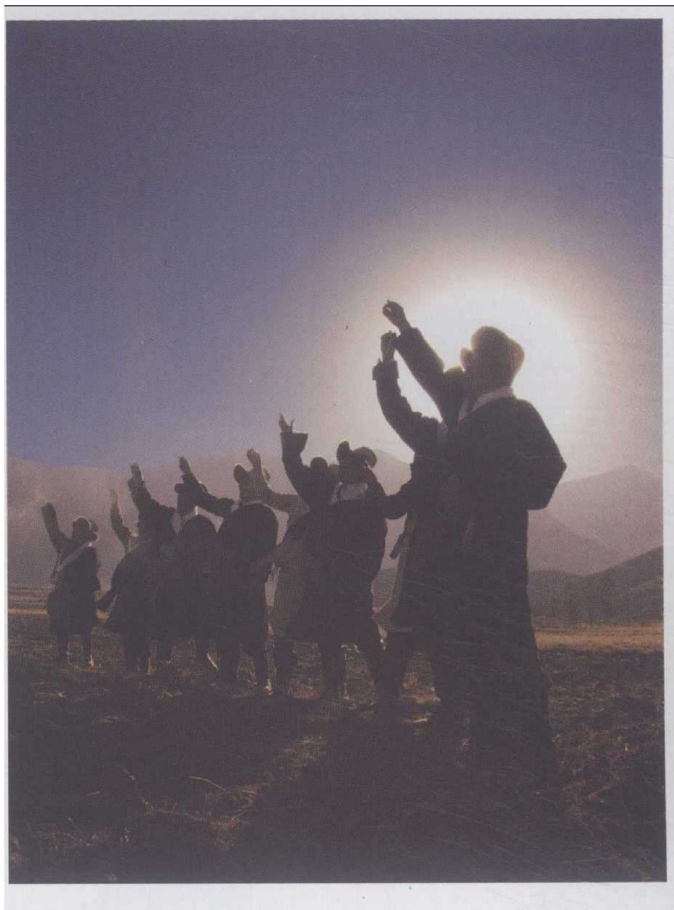
村中小路上，几户人家还在装扮着自己的牛，真是极尽所能，除了各种色彩披挂在身，牛的两个犄角上高高地束起彩色经旗，在两个旗边上竟然还各悬垂着两片CD光盘，阳光一照顿时光芒耀眼。在我看来，如果有年度春耕牛饰设计最佳创意奖，那这头牛绝对夺冠而无愧。

春耕的仪式在村外的一块公认最好的土地上举行。我们和村民们一起追在牛飞奔而扬起来的尘土里出了村。乡村的小路上，背着供品穿着盛装的妇女领着孩子正疾步而行。村南口的小路上正冲出两头并驾齐驱的壮牛，任是主人在后面如何吆喝与拉扯，跳过小水渠跑过小树林，就是一路狂奔，绝尘而行。举着酥油的老阿爸哈哈大笑：一个冬天关在院子里，终于跑出来了！

桑烟中的神秘仪式

藏区流传的关于春耕秋收的谚语是这样说的："昂宿（二十八宿之一）上山，耕牛下河，桦树红如僧袍时，即是青苗也要割"。意思是说"昂宿星走到西边山顶上的时节就要耕种，耕地的牛可以喝到河水。到了树叶发黄的秋季，桦树叶变红，哪怕是地里的庄稼还是青苗也要开始收割了。"通常藏历的正月初五是拉萨周边农区的春耕节，也就是庄严的开犁仪式。但在藏区随着海拔不同，每个地区的春耕时间也是有所不同

***藏民们装扮自己的耕牛
真是极尽所能：
各种色彩披挂在身，
牛的两个犄角上
高高地束起彩色经旗，
在两个旗边上竟然还各悬垂
着两片CD光盘。
这头牛绝对可以得到年度春
耕牛饰设计最佳创意奖。***



上：在正式下田耕种之前，身着传统服装的耕手站在田边，右手握着青稞，集体吟诵，神情庄严而肃穆。高声的祈祷之后，再将手中的青稞用力向空中抛撒，然后，人们便牵上耕牛开始下田犁种。

左上：藏历的正月初五通常是拉萨周边农区的春耕节，人们给每一头耕牛喂青稞和青稞酒。每一户都敬过了，牛才开始准备下田。

的。基本上20公里之内相差不多，而时间的确定是根据藏区的天文历法，推算星宿运动和天气季节来选定吉日。从拉萨河谷开始，随着海拔的变化，春耕时间会有所不同。

在举行仪式和真正播种之间，大约有7天到半个月的时间。仪式并不代表着春耕开始。春耕的仪式只能算作是试种，会在一块最好的地里播种各种种子，过几天之后，苗长出来了，村民会根据苗的成长情况来判断全部播种哪类种子，以利于丰收。直到今天，西藏的乡村依然保持着互帮互种的民风民俗。大家商量好，从某一家开始耕种，然后逐户完成。如果一个家族足够大，自家也可以独自完成。

早上，参加仪式的全家人都要穿上传统服装。 这一天见到的男主人全部盛装在身：黑色的羊毛藏袍，黄花缎面翻卷着长毛的帽子，黑色的长马靴，身型健硕——绝对的一身阳刚之气。女主人的服饰有的是贡布江达的藏装，头戴着两边翘角的帽子，身着直筒束腰的羊毛藏袍，也有人穿着拉萨式的藏装，已婚妇女的身前都会带着帮典。

人们细心地把犁、夏拉（耙）、桑（煨桑烟用的柏树叶等）和种子送到地边。把所有的耕牛面朝东在地边排好，每两头耕牛套上一犁，将两牛架在一起的木柱两端挂上一个红色的牦牛尾巴。

藏族人称农田为“帕新”父田，即自己的父亲留下来的。这表达的也正是对土地最真挚的情感。每年秋收时节，农人会从家里扛出一块被称之为“阿妈色多”（意为“金石头妈妈”）的白色石头，这是去年从农田



人们细心地把犁、夏拉（耙）、桑（煨桑烟用的柏树叶等）和种子送到地边。仪式之前，要在一块象征着神位的石头周边煨起桑烟，并撒酒以示祭拜。一时间，桑烟滚滚。





请回来收藏好的，在这一天重新恭恭敬敬地放在农田中央，这是庄稼的保护女神。仪式之前，要在这块象征着神位的周边煨起桑烟，撒切玛，撒酒以示祭拜。

不过，在白定村的春耕仪式上，我并没有看到地中间摆着白石头作为地神和水神的宫殿，但是在整个仪式开始之前，地中便已煨起了桑烟，每家每户都在不断地向里面撒叶子，烟越来越浓，气氛也就越来越热烈。

选出来的小姑娘和小男孩，一人手捧着切玛，一人拿着青稞酒壶，给每一头耕牛喂青稞和青稞酒，给牛的主人敬上青稞酒。之后，每一家藏民都会带着青稞和青稞酒，一边说着吉祥话一边敬人与牛。牛的左右角的尖顶、中端、脑顶及额鼻梁等七处点上天尔坚也就是酥油花表示吉祥。等到每一户都敬过了，耕牛开始下田。在开始犁田之前，男人们面朝北方一字排开，右手拿着青稞，一

在春耕仪式上，耕牛与拖拉机先后下田，围着桑烟一圈一圈地耕种，桑烟腾空，牛奔尘扬。绿色即将在大地复苏，生命将呈现出蓬勃的生机。

起高声吟诵吉祥祝福的词，最后向上用力抛撒。光线从东方照在这排勇武而专注的男人们身上，传统的服装、传统的仪式、传统的语言，一种厚重的力量与神圣感一下子便呈现出来。

播种的感恩与喜

下田耕种的仪式过程正式开始，耕牛先是一字排开。进地之后却形成了前后排列以桑烟为中心的圆形，两头牛在前奔跑，男主人在后扶犁追逐，女主人紧随其后抛撒种子。女主人撒下的第一把种子必须是自西向东。如果家里没有女人，则会由主要的家长来播种。

烟高经尺，奔走的牛与人似乎从幻境中走出，人在高声吆喝，牛在奔跑，道道黄尘飞扬。围观的人群在欢呼，大地在燃烧，天空在颤抖。人与土地统统陶醉在狂热中，这也正是春天应有的气息。

现在在西藏的农区，拖拉机正逐渐取代耕牛而扮演起更加重要的角色，在耕牛犁过土地之后，拖拉机开始下田，之前，每户人家都会向拖拉机手敬上青稞酒。被鲜艳的塑料大花装饰的拖拉机也一样围着桑烟一圈圈地转，继续将空气搅得更热。春节前，在拉萨的八角街上有无数个卖假花的摊位，我一直困惑这样大而艳丽的花都买去做什么呢，如今找到了它们的好去处，在这一片沸腾的田野里，非得有这样的艳丽才可相衬。

在最后的长烟中，全村的男人们再次面向北排成一列，右手拿着青稞粉，高声吟诵，最后将青稞粉抛撒向空中。播种之后，全村的人找一块公众聚会的向阳的开阔地坐下，开始互敬青稞酒和食物。

牛开始自由活动，喝醉了的牛在田野里奔跑，甚至撞倒了村口的两堆干牛粪垛，人们大笑躲闪，以极度纵容的心态看着比人更加肆意狂欢的牛们。

在整个藏区随着海拔的变化，播种的时间依次推移。每一个地区甚至村庄确定春耕仪式的时间都是不同的，但确定的方式却基本一致，一个是根据藏历约定俗成，一个是根据物候，也就是经验的判断。就像是黄河



两岸地区流传的关于数九的口诀一样，西藏当地也有自己的口诀。有经验的老人根据雪化的程度等积累一定的开春的经验。更主要是当地的喇嘛也会根据藏区天文历法、当年的五行和星曜推算星宿运动和季节变化，择定耕播的日期。藏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择吉日进行。在方圆十几公里，差不多以乡为单位的播种时间都大致相同。

不同的藏区有不同的春耕仪式。林芝地区最主要的特点是在举行春耕仪式这一天男人祭山神，女人祭土地神。在确定了春耕仪式的这天一早，家里的男主人带着各种祭品，用背斗背到山上。而女主人把早已准备好的松树枝扛上，带着女儿到田里去。这松树枝要选得直而漂亮，上面用彩色的羊毛线装扮得花枝招展。女主人还用背篓背上过年时的各色油炸食品，到自家最好的一块田中央，把树枝插上，食品摆在周围，以青稞酒祭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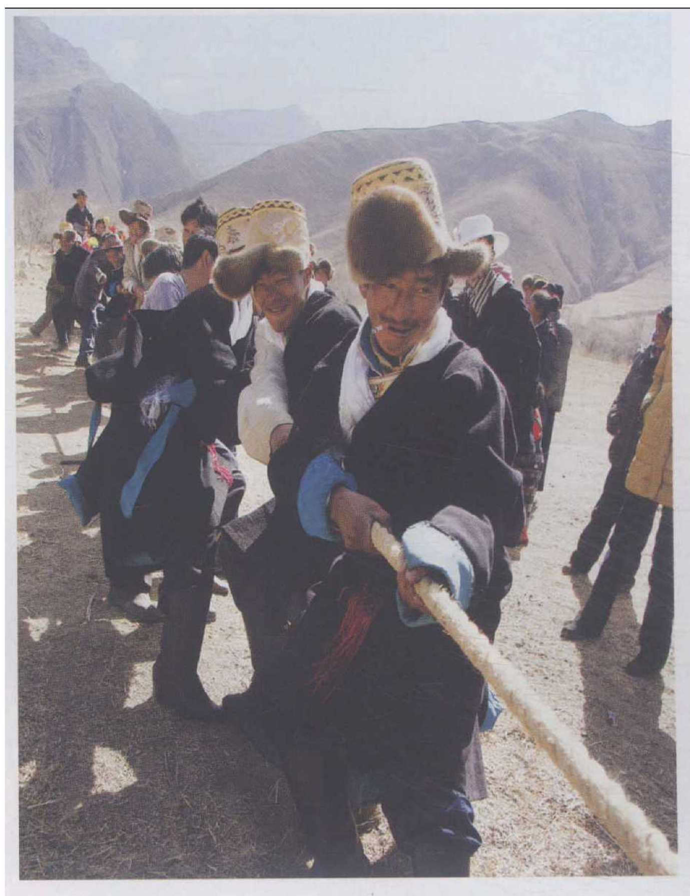
田野之中，每家都举行仪式。结束时，大家到达约定的一处聚会地点，女人们集中在一起，席地坐成一圈。拿着食盒敬给在座的每一位，每人三口一杯喝着青稞酒。这一天，女人们会穿上最漂亮和干净的衣服，色彩鲜艳，空气里似乎都传达着欢乐的情绪。

临近中午，女人们吃喝得差不多了，祭山神的男人们也回来了。男人和女人一起聚到村子的公房里，再次品尝事先准备好的茶、酒以及各种食品。吃喝尽兴之后围着经幡旗杆，藏语称为“塔钦”，男半圈，女半圈手拉着手开始跳锅庄，一边唱歌一边跳舞。

日喀则的江孜土地平坦而广阔，人口集中。春耕的时间也相对固定。藏历的正月十五是春耕的前奏曲，几乎全县的人都会聚到白居寺，背来青稞酒和糌粑还有炒熟的青稞。寺中的经杆在年前放倒，蜂拥而至的人们纷纷往经杆上撒青稞、糌粑和青稞酒，献上哈达。女人们走到经杆前都要顶礼膜拜。

祭拜到最后就演变成了一场欢庆，彼此之间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互相撒糌粑。一片

在最后的长烟中，
全村的人在一块
向阳的开阔地坐下，
开始互敬青稞酒和食物。
牛也开始了自由活动，
喝醉了的牛,在田野里奔跑，
人们以极度纵容的心态，
看着比自己更肆意的牛群在
春天的田野里狂欢。



上：吃喝一场之后，开始准备拔河比赛。全村的人都上阵，眼看着哪边要被拉倒，旁观的人就冲上去帮忙。大家欢笑着挤作一团。

左上：耕种仪式结束后，全村人来到村边开始聚餐，每家每户都拿出食物与大家共同分享。阳光照耀着富足而吉祥的村庄，令人无限喜悦。

白色的糌粑飞扬，白居寺内欢声笑语，四周弥漫着吉祥和欢快的气息。

仪式之后，人们沿街而坐，打开自带的食物开始吃喝。酒足饭饱之后，男人们开始选购农具，女人们添置东西。黄昏时分，人们满意而归。

经过一天的休整，正月十七才开始正式春耕仪式，所有人家有牛的牵牛，有拖拉机的开着拖拉机来到田里，由两位当天不犯忌的女人，一人手端着五谷斗，一人拿着青稞酒，敬给每一位下田的男人与牦牛。田中央煨上桑烟，吉祥的时刻一到，披着哈达的耕牛开始狂奔着犁地。当地人不仅给牛喂青稞酒还要在牛的额头上点上酥油花，说吉祥话。撒在犁起土地上的不仅有青稞种子，更有糖块、各种水果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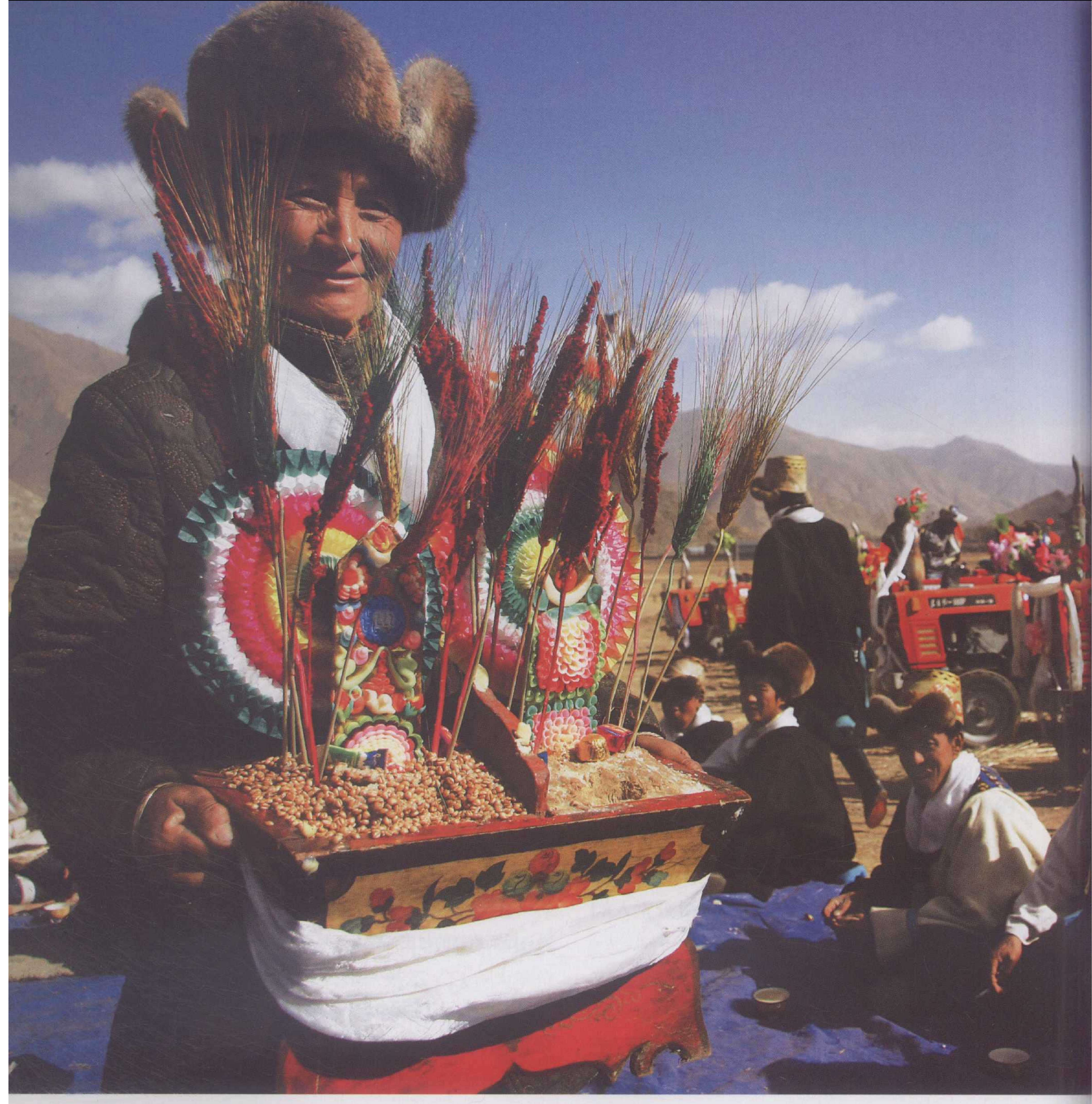
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扎囊县，在土地比较集中的地方还有类似于“神殿”的祭祀场所，举行春耕仪式这天，人们来到这里先煨桑，之后不仅要祭土地神，还要祭水神。

以耕种名义肆意狂欢

站在人群散去的空地上，突然可以听到成群的鸟鸣，大量的黑颈鹤正在河谷里起落飞翔，每年的冬天它们都会在这里越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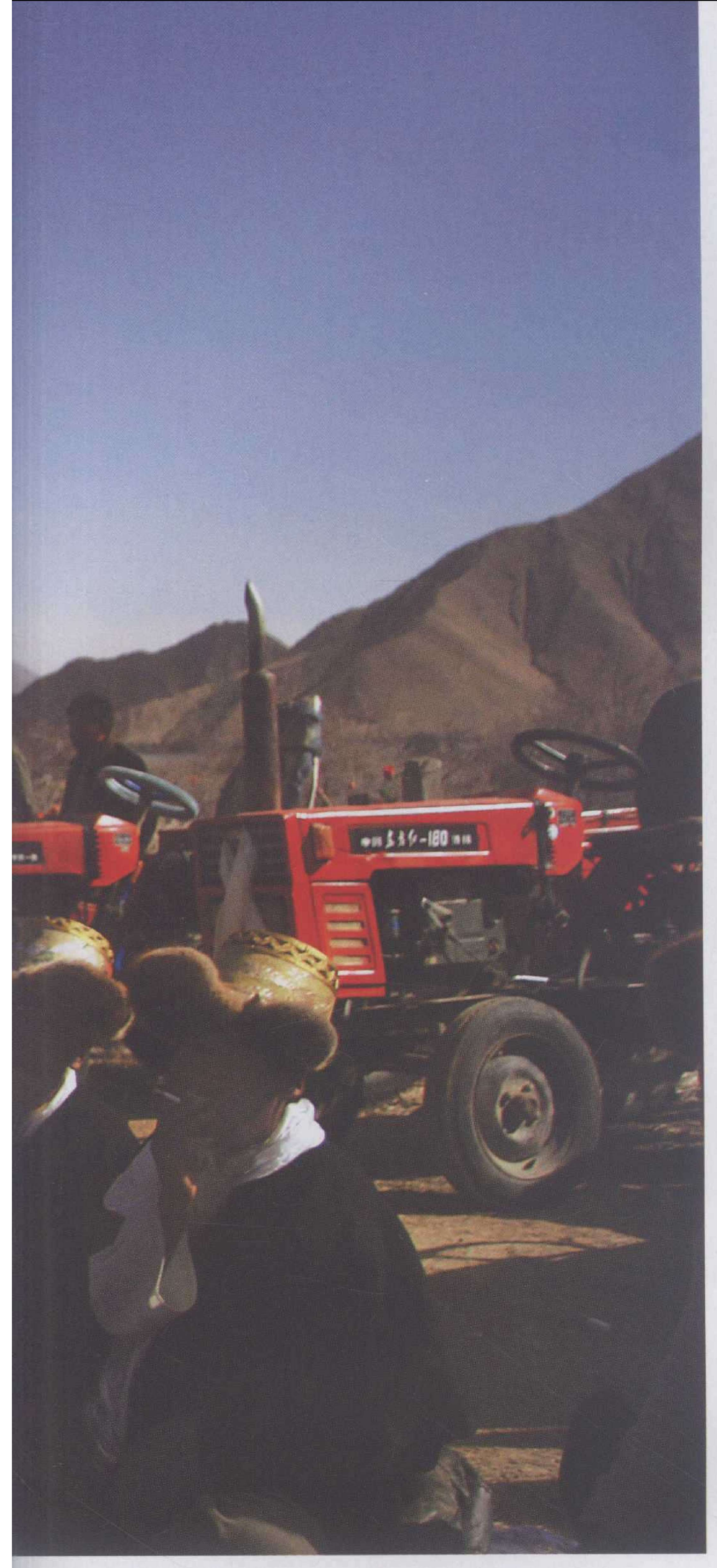
以耕种名义聚在一起的人们此时全撤到了村边的空地上。被大花装饰的拖拉机在边上一字排开，而人们围坐在铺了席子的地上，三位妇女举着酒碗给每一个人敬酒。每一户人家都拿出自己的食盒互相敬送，食盒里有春节时油炸的面食，有各种糖果，小点心。我们四处闲溜达，总是有人会把食盒举在面前供你选择。

“扎西德勒！”我们对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也对我们说。



最后我们被邀请坐在他们中间，年长的老人家给我们献上了洁白的哈达。三位盛装的阿佳敬上青稞酒：一人提壶，一人捧碗，一人劝酒。藏区喝酒讲究的是三口一杯，就是喝一口倒一下，再喝一口再倒满，最后一饮而尽。我忽略了这一过程，第一口就喝了半碗。酒是自酿的，味道真是不错，再喝个三口一杯我也还是能接受的。

酒过三巡之后，人们全部站起，把席子收起。拎出一根长长的粗麻绳——拔河比赛马上开始了。麻绳中间系上一根红领巾，压上一块石头，向左走三步画一条线，向右走三步画一条线，赛区就划分出来了。先是男子组上场，人们脸蛋泛着酒后的红色，也不管左右人是不是对等，等到站在中间的裁判举起手中的小木棍向下一挥：开始！两边就用力向后拉，看着哪边要过线了，围观的人就冲向哪边去帮忙。而等到女子们上阵比赛就演变成了一场混战。那绳



村支部书记是一位阿佳。据说，也正是在她的带领下，白定村还一直保持着各种传统仪式的传统形式。拔河比赛之后，村民们继续饮酒歌舞直到太阳西下，整个村子笼罩在祥和而愉悦的气氛里。

阳光照耀着村庄、
照着欢笑的人们、
照着去年堆在这片
空地边的青稞秸垛。
阳光下的青稞秸闪着金光，
积雪融化成的小水洼里
映着天空的湛蓝。
远处白雪覆盖着的山峦
绵延起伏。
一年就这样开始了，
春天，就这样降临白定村。

子纵然是粗也难抵这样的力量，突然毫无预兆地断开了，人们纷纷向两边倒去，狂笑之声顿响山谷。

人们都说藏族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能跳舞，在任何一种活动中，歌舞都是必不可少的。据说在拔河比赛之后，村民们将继续饮酒歌舞直到太阳西下。但是，我们出来得太早，在村庄与田地之间奔跑追随，又喝了大碗的青稞酒，暖阳照射下，失去了继续观望的力量。于是，驾车回到拉萨以狂吃的方式缓解刚刚感受到的激昂。

归路上，阳光照着村庄、照着欢笑的人们、照着去年堆在这片空地边的青稞秸垛。阳光下的青稞秸闪着金光，积雪融化成的小水洼里映着天空的湛蓝。远处，以及更远的远处白雪覆盖着的山峦绵延起伏。

一年就这样开始了，春天，就这样来临了，这一年的收成一定不错！□

责任编辑/杨剑坤　图片编辑/杨剑坤　版式设计/杨东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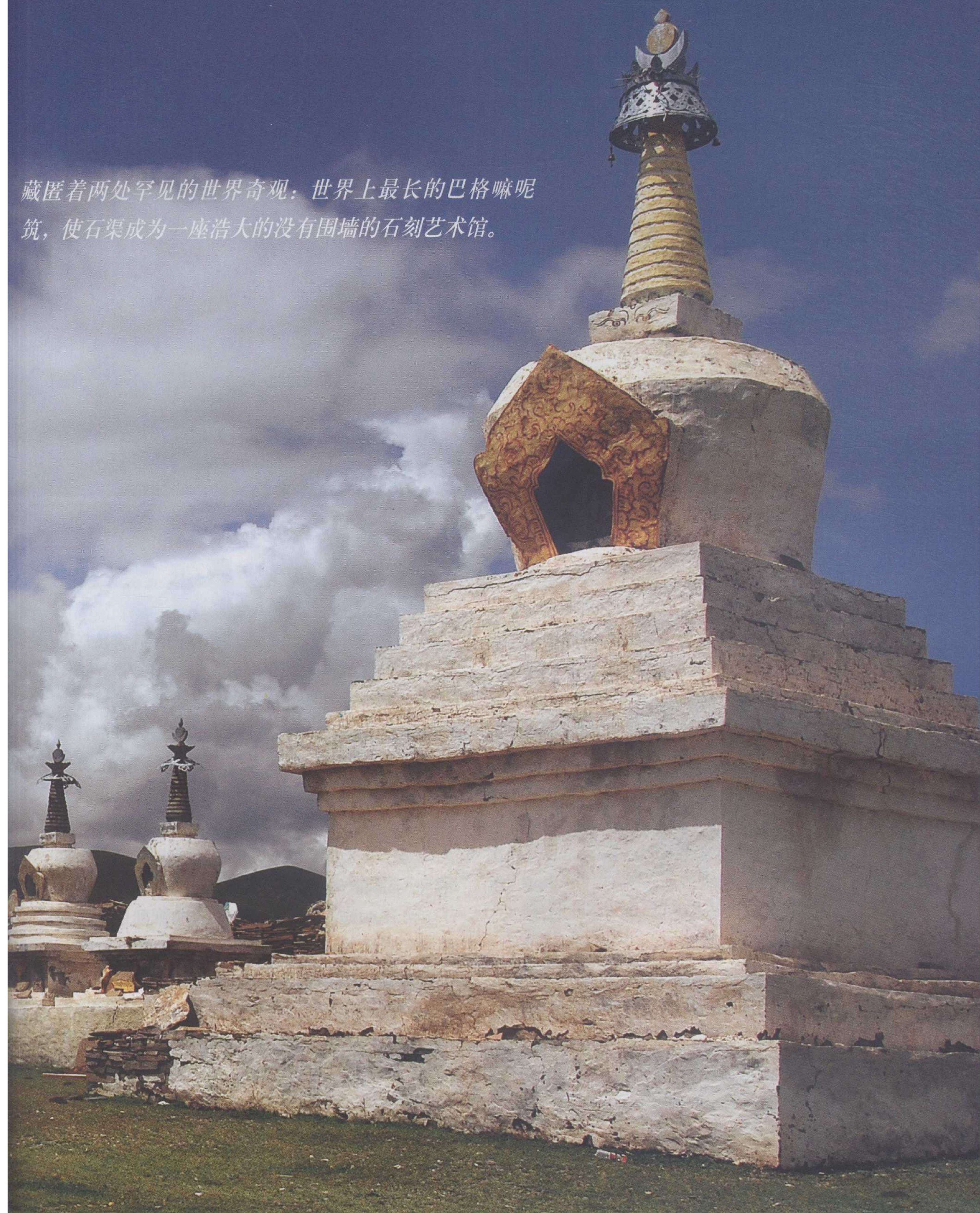
石渠 大地的经石板

石渠，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川、青、藏三省区交界处。在高原牧区的深处，石经墙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松格嘛呢石经坛城。这些全由嘛呢石堆砌起来的建

撰文／焦虎三　摄影／焦虎三等



藏匿着两处罕见的世界奇观：世界上最长的巴格嘛呢
筑，使石渠成为一座浩大的没有围墙的石刻艺术馆。





扎溪卡草原上的网状河流

雅砻江为金沙江最大的支流，流经石渠境内。其水流平缓，草坝连绵，形成广袤神奇的扎溪卡大草原。这里有着罕见的高原湿地景观，美

在藏区，凡人迹所至之处，随处可见一种被称为嘛呢石的石刻品，它是藏族人刻在石头上的追求、理想、感情和希望。其中，类型最丰富、特点最鲜明、规模最宏大的石刻群，位于四川石渠，这里有“青藏高原石刻之都”的美誉。而令其拥有这一美誉的就是境内的两大奇观：世界上最长的巴格嘛呢石经墙与藏区历史最为悠久的松格嘛呢石经坛城。那每天都在增高的石经墙与每日都在扩大的石经坛城，承载着藏族人对生命的感悟和永不褪色的信仰。

一个民族的信仰长城

巴格嘛呢石经墙与松格嘛呢石经坛城，分别位于石渠县东西两侧的扎溪卡大草原上，2007年夏秋之交，我们慕名前往。

从石渠县出发，我们的越野车奔驰于崇山峻岭之间，驶入长沙贡马乡境内后，奔流不息的雅砻江的倩影便出现在车窗之外，这是源头的雅砻江，站在号称雅砻江第一湾边的一个小山坡上，那在下游穿山越岭、气势磅礴的江水，此刻却缓慢流淌着，显得温和而平静，如一位蹒跚的老者。远山之上，随处可见一排又一排或红或白的经幡旗，点点星星，如撒落在大地之上的信仰之花。而石渠县的别称“扎溪卡”，在藏语里正是“雅砻江边部落”的意思。

几多颠簸，几多跋涉，当汽车骤然停在巴格嘛呢石经墙外时，打开车门，悠长的石经墙如一道神秘的大门，在阳光下透出让人窒息的光芒。在藏区随处可见的嘛呢堆，在这里被垒成了嘛呢墙。墙外的白塔正对着雄伟的扎加庞秀神山，塔的纯洁与山的雄伟，人的虔诚与大自然的永恒，被那一块块嘛呢石凝固起来，一

丽一如梦境。 摄影/钟键

远山之上，随处可见或红或白的经幡旗，
如撒落在大地之上的信仰之花。
而石渠县的别称“扎溪卡”，
在藏语里正是“雅砻江边部落”的意思。

排又一排，一层又一层堆放于大地之上，傲然而壮观。远处，蛮姆坝草滩上的白帐篷如朵朵白色的莲花点缀在空旷的天地之间，空中隐约传来此起彼伏的雕刻石经板的清脆敲击之声。

石渠相传曾是当年藏族英雄格萨尔所创建的根据地之一，今扎溪卡草原一带仍保留有许多关于格萨尔及其活动的遗迹。就在巴格嘛呢石经墙端头附近，我们发现了众多的佛龛，其中，偌大的一尊格萨尔王石刻在强烈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据当地人介绍，石经墙初建时，最先刻制的石刻中，除了一尊摆在经堂内的“六字箴言”石刻外，就是这尊格萨尔王石刻，而它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漫步于巴格嘛呢石经墙，犹如进入了一座浩瀚的石头图书馆。据说，现在这里还能看见念青唐古拉山神赠送给第一世巴格喇嘛桑登彭措上师的两块浮雕石刻板。这是巴格嘛呢石经墙中最为神圣的“镇馆之宝”。传说在公元1640年，桑登彭措授诸上师指点来到藏区十大神山之一扎加庞秀神山上的哲嘎山洞隐居修行，他梦见一位骑白马、身着白袍的人走到跟前说道：“你的功业在于修筑嘛呢石墙。”桑登彭措受此点化，开始四处选择合适的修筑地点，当他走到现巴格嘛呢石经墙所处的位置时，在地面发现一块天然嘛呢石，而与此同时天空也显现出诸多吉兆。于是桑登彭措上师便选择在此地修筑嘛呢石经墙，就在这时，来了一位神秘之人，他将刻有藏文六字箴言的浮雕与刻有莲花生大师真言的浮雕敬献给上师，上师问来者姓名，来者答曰：“我叫雕刻师嘛呢泽仁。”“嘛呢泽仁”藏语意为长寿嘛呢，上师闻之大喜，欲赠来者一头白骡子，却被谢拒。大师后来才得知，来者正是念青唐古拉山山神的化身，是专门为上师送吉兆而来。

在石渠民间，关于巴格嘛呢石经墙还有许多传说，而其中流传最广的则是有关“善墙”

草原上“盛开”的经幡

藏族人相信，风是传送经幡上的经文远行的工具。蓝天白云下，红色的经幡随风而舞，向神传达人的祈愿。 摄影/梁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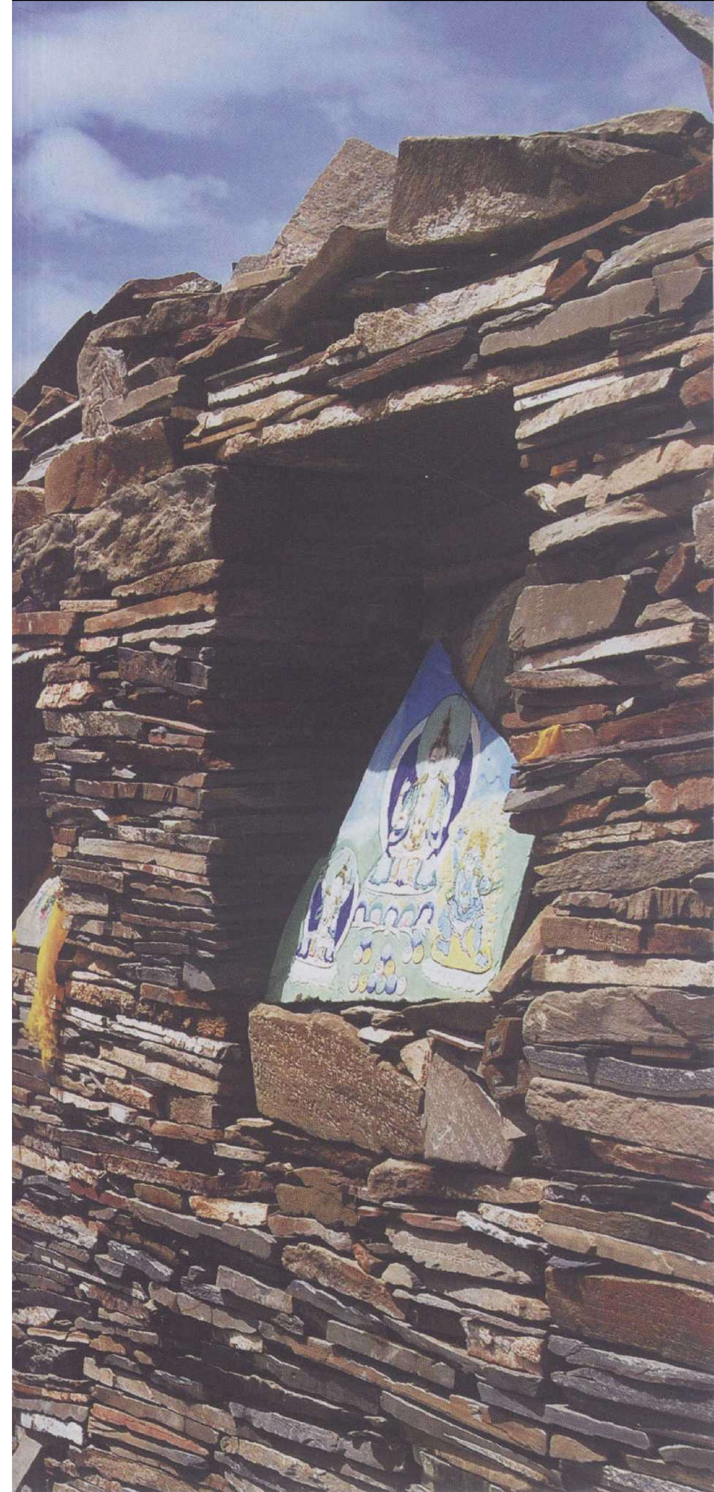




墙与塔的相守

巴格嘛呢石经墙绵延的墙体上嵌着窗口式的佛龛，类似于城墙上的烽火台，里面供奉着雕刻精美的石刻佛像。108座佛塔排着长长的队伍，

与“恶墙”的故事，现记载于当地县志之中。相传，草原上有一对情投意合、青梅竹马的恋人，但因双方家庭贫富悬殊，他们的相恋遭到各自家族的强烈反对，为争取自由幸福的生活，他们相约渡过雅砻江去追寻他们的美好未来，渡江时，女孩不幸被江水卷走，男孩在江边无数次寻找呼唤，终究没能寻找到他心爱的姑娘，他在悲痛欲绝之际，准备投江自尽。此时，恰遇巴格活佛路经此地，活佛劝男孩皈依佛门，于是，男孩出家当了喇嘛，并将所有的家财供奉给了巴格活佛。巴格活佛为劝诫世人爱惜生命，超脱尘世，净化灵魂，便用男孩供奉的财物修建起巴格嘛呢的“善墙”。而“恶墙”则来自于另外一则故事，据说，有两个情



和石墙并行。

同手足的好朋友结伴同行，其中一人见同伴行李中财物颇丰，遂起了谋财害命之心，他于同伴不备之时杀人劫物，不料逃至江边遇见巴格活佛，巴格活佛观其言行即知其犯事而逃，遂劝其回头是岸，此人在巴格活佛的劝导下，灵魂深受震撼，恶念尽去，即随巴格活佛皈依佛门，巴格活佛用此人所抢财物修成巴格嘛呢的“恶墙”，以警后人。

正如罗马城不是一夜建成的一样，巴格嘛呢石经墙历经历代巴格喇嘛活佛300多年的维修和加长，才得以达到今天宏大的规模：石墙以1.7公里的长度而举世无双，墙体内有石刻佛像3000多尊，刻有藏文佛教经典《甘珠尔》、《丹珠尔》各两部，《贤劫经》1000部，《解脱经》5000余部，还有数以亿计的大大小小的嘛呢石。据相关史料考证，在桑登彭措上师以后，第二世巴格喇嘛根绒活佛不仅在原有的基础上对石经墙进行扩建，还在此地长期举行转法轮会。传说第三世巴格喇嘛尼美曲翁还曾亲眼目睹观世音下凡，面对广阔的好似一片草海的马莫草滩，观世音将佛珠交给上师示意其将佛珠撒向“海面”，顷刻间，马莫草滩上如海市蜃楼般隐约浮现出一段长长的嘛呢石经墙。观世音菩萨对尼美曲翁说：“你的

格萨尔文化遗存

这尊刻在片石上的格萨尔像，人物造型生动，色彩丰富。格萨尔既是英雄的象征，也是藏人的护法之神。 摄影/钟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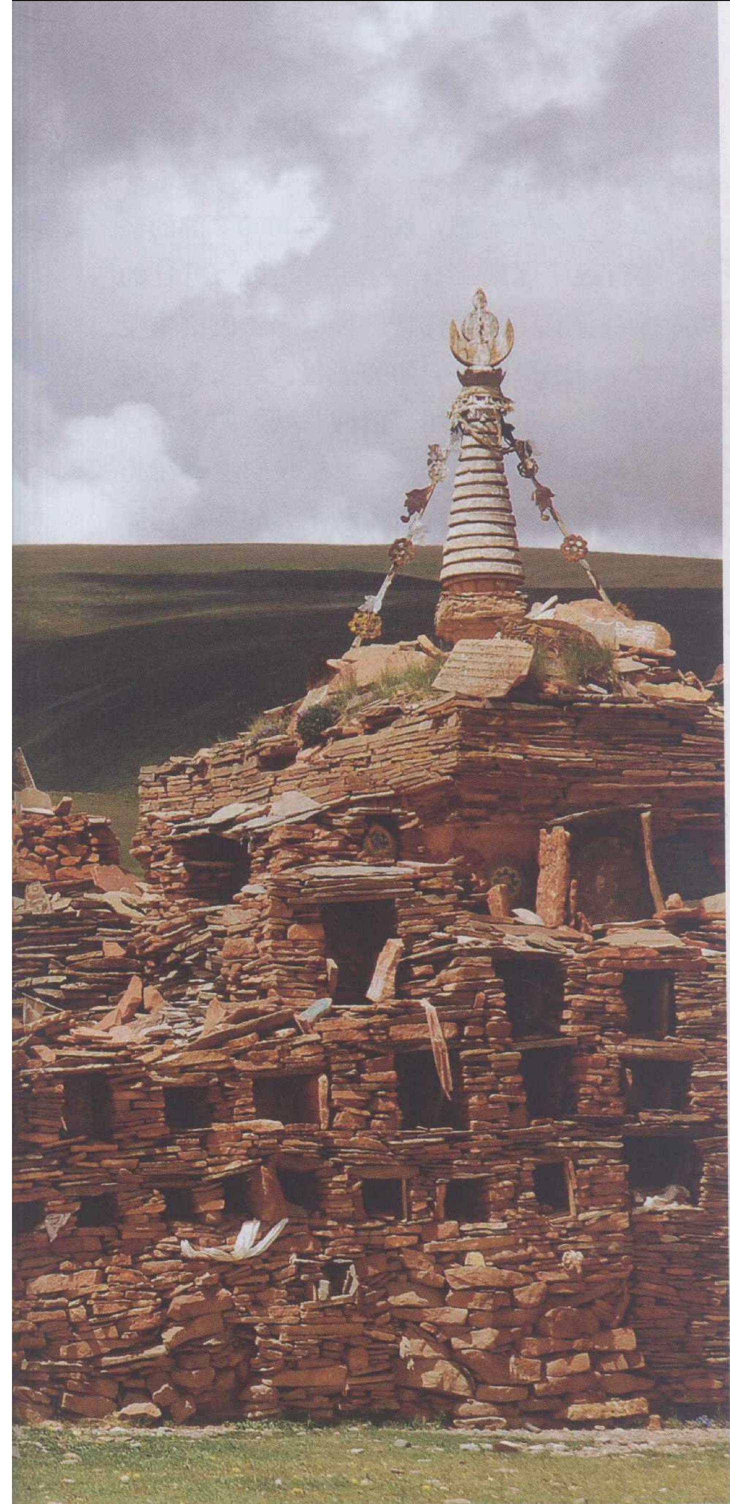


石经城，一座奇迹之城

松格嘛呢石经坛城内密密匝匝地堆满了一块块刻有各种经文和佛像的嘛呢石堆，没有任何框架做支撑，却巍然屹立，实属奇迹。石块每日都在

功业在于修筑嘛呢石墙。”第三世巴格喇嘛尼美曲翁还遵照观世音指点，不仅扩建了嘛呢石墙，还邀请降拥·嵌哲翁波等大德高僧前来开光灌顶。

与前三世巴格喇嘛活佛相比，第四世巴格喇嘛贡夏·曲尼多吉扩建石经墙的经历更富有戏剧性。传说，贡夏·曲尼多吉40多岁时才受上师指点来到巴格嘛呢墙成就功业。人到不惑之年的贡夏·曲尼多吉在石墙边遇到一位转经老者，他便走上前问老者姓名，老者说：“我叫然休·泽休。”然后，老者反问上师：“此居何处，可有衣食？”上师据实回答：“我什么也没有，想在此地居住。”老者一听，便从马背上取下坐褥请上师坐下，并说：“请暂用



垒积，木楼梯成了人们加高嘛呢石的工具。

虽历经风吹雨打、日晒雨淋，
数以亿计的经石板堆积出的城堡，
仍巍然屹立，这独特的坛城，
犹如上天所赐的一座通天之城。

此褥，我家在扎·岗青山上，明日给你送来食物和生活用品。”第二天，老者便送来了一顶帐篷和保障三个月的食物，在这位老者的资助下，上师贡夏·曲尼多吉一心一意扑在扩建嘛呢石经墙的功业上，他在墙上增加了《甘珠尔》、《丹珠尔》等经书的内容，同时还修建了八座佛塔，邀请了四十七座寺院的僧侣两次为其开光加持。

如果说古代的巴格喇嘛与巴格嘛呢石经墙的关系还只存在于尘封的历史与离奇的传说之中，出生于嘎依乡八若村的第二世贡夏活佛与巴格嘛呢石经墙的联系，在当下便显得无比真实与鲜活了。贡夏活佛的家离巴格嘛呢石经墙只有几公里的路程，坐在活佛十分简陋的客厅中，贡夏一边真诚地为我们一行人一一送上祝福的“金刚结”，一边通过当地的翻译与我谈起他的经历。1977年，第一世贡夏活佛圆寂后不久，刚满两岁的他便被认定为第二世贡夏活佛的转世。与历代巴格喇嘛活佛一样，扩修与加持巴格嘛呢石经墙成为贡夏活佛成年后毕生发愿精进的事业。2006年，长沙贡马乡扎加寺69岁的活佛降称让拥圆寂后，为第二世贡夏活佛留下了一笔财产，“老活佛留下的东西全卖了，光那些精美的镶嵌金银珠宝的家具就卖了100多万，只余下这五间房子，钱，我们全用在修建石经墙上了。”贡夏活佛说。接着，活佛为我粗约算了一笔账：现在为了保证巴格嘛

藏区绝无仅有的石经坛城

松格嘛呢石经城坐落在一处两山相望的草原间，按照佛教坛城的形式构建。远远望去，就像一座小土丘。 摄影/梁准



呢石经墙的建设，聘请的刻石板的工匠就有70多位，我先前在蛮姆坝草滩上所见的那些林立的白帐篷人家，除了游牧外，几乎家家户户都在贡夏活佛组织下进行石经板的雕刻工作。他们一天刻的石板要装满小型载重汽车15车次，每车装载60至70块经板。光费用这一项，一年就要花费80万元左右。“巴格嘛呢石经墙，我们要继续修下去。去年，我们刻完了全套《甘珠尔》，今年开始要刻完《丹珠尔》。”贡夏活佛一脸庄严地说道。《甘珠尔》为西藏所编有关佛陀所说教法之总集，包括经藏与律藏两大部门，以德格藏《甘珠尔》为例，其总100函700余部。而《丹珠尔》其内容包含诸论师之教语、注释书、密教仪轨、记传、语言、文字等甘珠尔所未曾网罗者。其中德格藏之《丹珠尔》包括赞颂部、秘密部、般若部等，总计213函，3400余部。

贡夏活佛的宏愿，就是将这4000多部的经书，逐行逐字雕刻在石头之上，数以百万计的经石板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增添到巴格嘛呢石经墙上，这项规模宏伟的工程，对人灵魂与意志的考验，也只有用“信仰长城”四个字，才能说得清、道得明了。“现在我们主要在为巴格嘛呢石经墙加高，它太长了，如果再延伸下去，群众转经就不方便了。”对于巴格嘛呢石经墙建设的规划，贡夏活佛胸有成竹。

一座石刻艺术的宫殿

与巴格嘛呢石经墙相比，我对号称“高原吴哥窟”的松格嘛呢石经坛城的拜访更像是一次荒野中的朝圣。临行前一天的晚上，石渠县县长亲自在宾馆，当着我们的面一一交代翌日

石刻艺术的殿堂

石刻佛像和神像是信众主要供奉的对象，种类繁多、神态各异。不少石刻像历经岁月风雨的侵蚀而褪去了颜色。



在松格嘛呢石经城的石板上，
刻有不同的经文和各种不同的佛像，
每一块经文都刻得工整有序，
佛像雕刻得栩栩如生。

的工作，他反复强调陪同工作人员带上尽可能多的瓶装水和食物，“在松格嘛呢石经坛城，我们只能坐在草地上野炊了。”同行的甘孜州文联主席蒋秀英大姐对我说道。

我们的车从石渠出发不久，柏油马路便在前方消失了，窗外，黄土马路上尘土飞扬，峡谷两侧，大山寂静，了无人烟，雅砻江的支流葛曲河在峡谷深处默默流淌。不久，我们的车驶进大山深处，除了蓝天白云，举目望去，视线中惟有连绵的群山。山峰高耸入云，在蓝天白云中，如一位位顶天立地的巨人。山坡上，一片花海摇曳其间，白色，黄色，还有红色的格桑花，如大山的女儿，簇拥着，在山风中涌动、跳跃，宛如一群阳光下天真嬉戏的儿童。

鲜花盛开的尽头，便是宽广辽阔的桑托坝草原，它位于阿日扎乡境内。穿过游牧人家林立的帐篷，远处，一个黄色的小点浮在草原茵茵绿草之上，那就是号称“高原吴哥窟”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松格嘛呢石经坛城。与一般的嘛呢石堆不同，石经城中的嘛呢石堆为信众随意堆砌而成，该石经城建筑外形类似城墙，相隔一定距离即有塔式建筑，其工程之浩大实属罕见。与巴格嘛呢石经墙一样，2006年该石经坛城也被国务院批准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穿过凸凹不平的草原，人的视线与美丽而奇特的松格嘛呢石经坛城相遇的过程，犹如进行一场审美的盛宴：远观，她像麻木河边的一座圆锥塔；走近，麻木河依然轻流细淌，而石经城的身影却慢慢高大起来，仿佛一座气势磅礴的石头寺庙；最后，当你站到它的面前，石经墙的轮廓就一面又一面的清晰起来。虽历经



围着石经城转经的老人

一位老人从石经城走过，手拿佛珠，口中默念经文，表情虔诚而安详。蓝天下，人与城皆透着沧桑与坚韧。

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数以亿计的经石板堆积出的城堡，巍然屹立仍坚固、雄伟，这独特的坛城，犹如上天所赐的一座通天之城。

松格嘛呢石经城是迄今为止，我国藏区发现的惟一一处用嘛呢石垒砌的“城”状嘛呢石遗迹。石经城南北宽47米，东西长73米，城外墙高10米，城中心主体部分最高处为15米。据同行的石渠县文化馆馆长龙真介绍，在松格嘛呢石经城的石板上，都刻有不同的经文和各种不同的佛像，每一块经文都刻得工整有序，佛像雕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光彩夺目。石经城四周墙体上布满了一排排重重叠叠看似“窗口”的神龛，众多洁白的哈达悬挂其上，将神龛遮盖得严严实实，“窗口”里面摆放的



吉祥的哈达抛起来

献哈达是藏族人民最普遍的礼节。在石渠，每年夏秋之季，草原上都会举行大型民族文化活动，人们都会抛起象征吉祥的哈达。哈达在向



高空抛起的过程中，其上织有的莲花、宝瓶、海螺等表示吉祥如意的隐花图案，也随风抛送，传递出人们美好的祝愿。 摄影／吕玲珑

全是松格嘛呢石经城最为珍贵的一批古老的经石板。

由于经石板日复一日不断地堆砌，早期构筑的部分被包裹于内，因此难以判定其最早的堆积时代。但据专家在2005年7月康巴地区民族考古综合考察活动上现场采集的石经板分析，再结合藏文文献记载，基本可以确定松格嘛呢石经城大约在公元13世纪左右修建。

从布局结构而言，松格嘛呢石经城有独特的藏传佛教“坛城”的造型特点。它似城非城、似塔非塔。正面偏西位置有道城门可以进出石经城，走进城里，里面是一层层高高码放的嘛呢墙，中间有狭窄的通道，弯来拐去好似进入了一座迷宫，有些地方又让人感觉像是走进了石窟。由于石块垒得太高，城体已开始下沉，据说它地面上的部分有多高，陷入地底下的就有多深。这意味着，地上所见的松格嘛呢石经城只是它的一半，还有另一半陷入了地下。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没有任何框架支撑，也没用任何粘合剂，完全是人们你一块我一块随意堆砌起来的“城楼”，竟然能够历经数百年岿然不动，实在是一大奇迹。

高原午后的烈日从高高的石城塔顶倾射下来，阳光浸入石头构筑出的世界，一切闪耀着光芒，大大小小清凉的嘛呢石经板，在光影中或更加明亮，或灰暗朦胧，青青小草挣扎着从经石板中生长出来，一些不知名的紫色花朵如绚丽的皇冠绽放其上。微风掠过，嘛呢经石板上深入肌理的藏文佛经字句一动不动、缄默千古，而花朵与青草的枝叶轻微摇曳起来，仿佛在对石板轻声倾述出什么……这些从石头下发芽的种子，在阳光下



享受阳光，享受生活

生活在扎溪卡草原上的藏民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尽管生存条件简陋，但虔诚的信仰让他们的生活平静和快乐。 摄影/钟键



送干牛粪的少女

牛粪是石渠人生活中的主要燃料。这个藏族女孩，用板车拉着干牛粪出售。车虽然很重，但女孩脸上仍挂着笑容。 摄影/吕玲珑

尽情舒展的花蕾，终生陪伴经石板，走过春夏秋冬的轮回，经历风霜雨雪的考验，而现在，她们仿佛成为经石板神圣信仰的翅膀，石板的躯体深深扎根于大地之下，而花与草的理想浮现在空中，最终达到人类遥不可及的苍穹。那已经不是一个我们能用眼睛欣赏、用耳朵聆听的世界。"我止步，我沉默，我瞑目，直到眼睫中抽出一枝麦穗，喷出一股太阳的喷泉"，这是墨西哥诗人帕斯对石头的歌颂，而面对松格嘛呢石经城，一切诗歌的语言都是苍白的。时光如容器，惟有那些刻在石头上永恒的文字，在容器中浪花涟涟，悠悠飘荡。我的视线穿过窄长的通道，城门外，烈日下，一位老者席地而坐，正默默雕刻着石经，据说，为了虔诚的信仰，不少刻经者经常通宵达旦雕刻着石块。面对一言不发的经石板，这位老者又想表达出什么呢？或许，他想表达的每一句话语，都刻在这坚硬的石块之上。

**站在松格嘛呢石经城外，
遥望一望无垠的桑托坝，
天然大草场上，
水草丰茂、天碧草绿、烟雨苍茫，
这是典型的康北草原风光。**

相比巴格嘛呢石经墙，在当地民间的传说中，松格嘛呢石经坛城与格萨尔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相传在格萨尔时代，格萨尔王军师的儿子在霍岭之战（霍尔国国王为争抢岭国国王格萨尔的王妃而发起的战争）中被格萨尔王的大将措通所出卖，战死于此地，措通为了忏悔和让死者的亡灵得到安宁，在各方帮助下仅用七天的时间就在此地建起了白塔和地下、地上一体的嘛呢堆，并由格萨尔亲自为其开光加持。随着时间的流变，加上地形的变迁，白塔和地面的嘛呢石堆逐渐被风沙所覆盖，远远望

去，就像一座小土丘。当年，第一世普公寺活佛白玛仁青在益讲罗布扎登的草原上与僧人一起烧茶供奉时，突然从远处飞来了一只大鸟（护法善神鸟）把白玛仁青供奉时的茶杯叼走了。随从他的僧人前去追赶，活佛白玛仁青对随行人员说“别追，我们跟随它”，这时大鸟围着小丘飞了三圈，然后把供奉杯放在这小土丘上，看到这种吉兆，白玛仁青非常高兴，活佛就在此地四面立下了4个石碑，随后人们就在此基础上，不断堆积石块，便成就了今天举世无双的石经坛城。

今天，我们在松格嘛呢石经坛城中众多历史悠久、艺术造诣精湛的经石板中能看见的刻绘最多的仍是格萨尔王和他手下30员大将的佛像，这些彩绘石刻雕刻技法极为精美，种类繁多，且千姿百态、神态各异，极具考古与艺术价值，这对研究格萨尔文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个部落的田野调查

堆积嘛呢石是我在藏区田野考察时随处可见的宗教信仰仪轨，而像石渠当地，由两个游牧部落上百人集体雕刻石经板块，以供嘛呢建筑的扩建，如此大规模的建筑行为，似乎并不多见，而雕刻石经板块已成为蛮姆坝与桑托坝上游牧人家的“村落产业”。“松格嘛呢石经城石刻板材料主要来源地是石经城周边山坡，没有固定的取石地。因信教群众年复一年不断垒砌刻有经文的石块，巴格嘛呢还在不断加长延伸。”陪同我前来考察的石渠县文化馆的龙真说。“与巴格嘛呢石经墙由活佛主持扩建不同，松格嘛呢石经坛城是由信众自发垒建的，

刻经母女相依相伴

刻经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在桑托坝，卓玛带着孩子在雕刻石经，纷飞的石屑使她不时停下手中的活来照顾孩子。 摄影/梁准



一块嘛呢石经板上所浓缩的文化积淀与宗教信念同一个6岁孩童的人生前途，到底孰重孰轻呢？

所以桑托坝游牧点的刻经人家中，不少也出售雕刻好的石经板和‘擦擦’（一种小型的藏传佛教脱模泥塑品）。”龙真介绍道。

在遍布石渠的游牧部落中，松格嘛呢石经坛城外的游牧部落独特而另类，这个拥有70户共250余口人的部落，与高原上其他游牧部落一样，以游牧生活为主。但在桑托坝，对外销售石经板和“擦擦”也成为了他们家庭收入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站在松格嘛呢石经坛城外，遥望一望无垠的桑托坝，天然大草场上水草丰茂、天碧草绿、烟雨苍茫，这是典型的康北草原风光。花红草长，牛羊点缀其间似繁星点点，不时传来的一曲粗犷悠扬牧歌，令人流连忘返。走近坝中的游牧部落聚集地，四周帐篷林立，一阵阵清脆的敲击声不时回荡在四周。在一片用枯桠残枝围起的篱笆墙边，44岁的藏族妇女果果坐在自家帐篷外的平地上。她双手戴着一双破旧的劳保手套，一手拿着锤子，一手紧握刻刀，一击一打，正雕刻着一块“六字箴言”的石板。果果对龙真说道：“在这片石板上我要刻上四遍‘六字箴言’，现在，前三遍已经刻完了。”说完，她低下头又继续雕刻石板，一阵粉尘与石末在石板上如火花般四处绽放，果果的双眼下意识眯成了一条缝。她雕刻着石板，嘴唇向外一口一口轻轻吹着气，以免粉末飘入眼里。“我打一天经石板，能卖几元钱到30元不等。我们不讲价，他们愿意给多少就多少。有些打好的大的经石板，别人出一元钱，我也认了。”在她休息的空隙，果果轻描淡写地谈及与经石板有关的一切：“来石经坛城摆放嘛呢石的大多是石渠本地的人，最远的，也有青海省的。我们夫妻俩一起打石头，一人一年能



雀加的经石板

风吹日晒，6岁的雀加显出一种与他稚嫩年纪不相当的苍老，他靠在一块正在雕刻的石板上，显得很疲倦。

有一万多块的收入。”在交谈中，她反复向我声明，她们不是在“搞生意”，“打石头和别人从我这拿石头开光加持后，再放在石经坛城上，都是在敬菩萨。”她虔诚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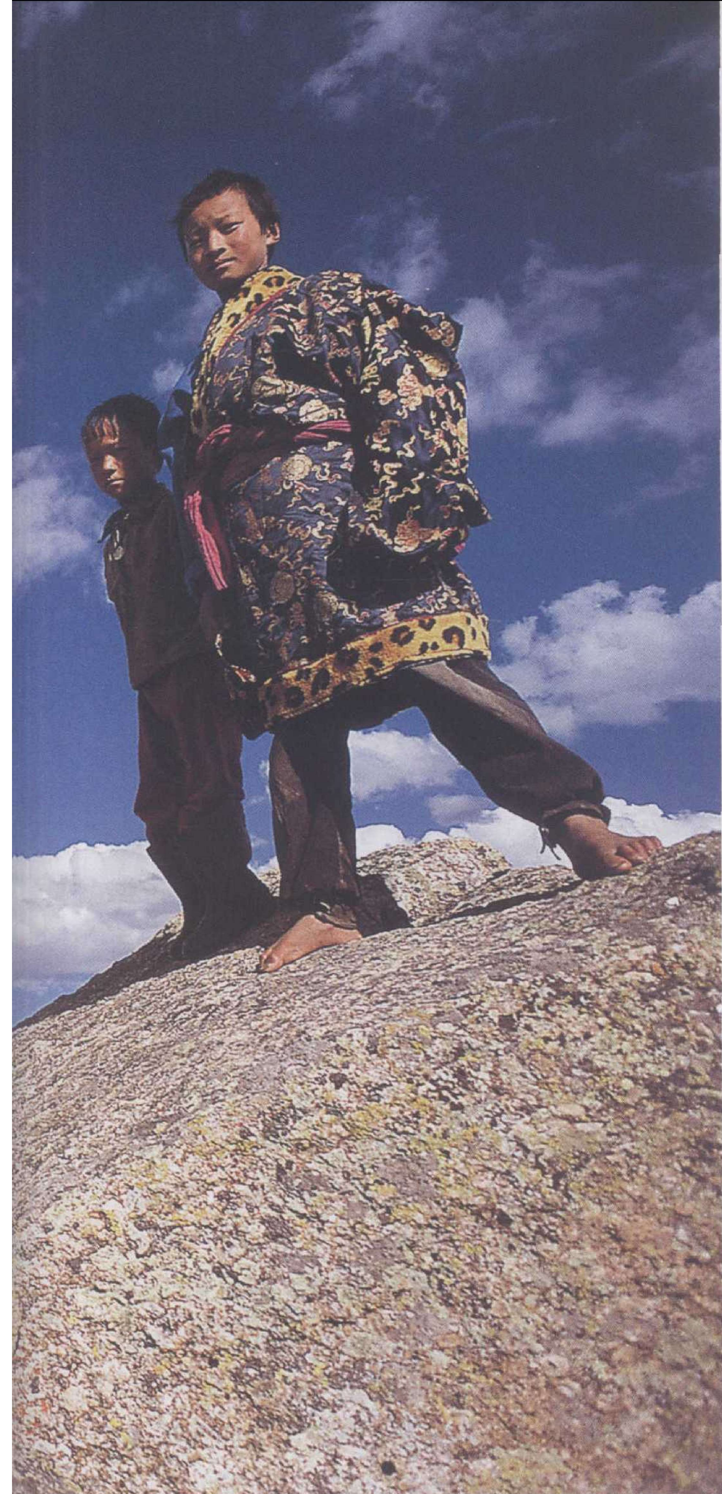
30多岁的牧民错花是桑托坝少有的除了放牧外，全家老少都集体从事雕刻经石板的“石匠艺人世家”。在离错花家白帐篷不远的一处空旷的草地上，他正头顶着高原午后的烈日，把一块块刻好的石板平铺在草地上烤晒：“我家雕像经石板是祖传的手艺。现在家中有4个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6岁。都在刻石板。”通过龙真的翻泽，错花一一为我介绍着他家的生计情况。作为牧民，错花年纪稍大的3个孩子平时都在牛场放牧他家拥有的50多头牦牛与60多只



跳跃、奔腾的童年

童年永远是无忧无虑的。图中这个孩子纵身的一跃，无疑饱含着他最简单的快乐。相比雀加那个每日刻经的忧郁小孩，这些尽情玩耍的孩

绵羊，最小的孩子雀加，只有6岁，则与父母终日在家刻经，雀加的三个哥哥在放牧的空闲时间也会从山上赶回家雕刻经石板。“我家牧业的收入一年只有5000元，上山挖虫草贝母能卖1万元左右，一年打石头，也能挣近两万多元。”雕刻经石板的收益，占据了这个家庭年收入的半壁江山，可见经石板对于错花家庭生计的意义，显得更为举足轻重。“我们的片石取材地点不固定，最远的取材于五六十公里外的山中，最近的离桑托坝也有三十多公里。我租拖拉机一次70元，一车可拉回一方石块。一方石头大约可以刻出50片石经板。”与果果不同，交谈中，错花从头至尾没有谈及他家销售经石板的定价问题。他仿佛与我更多只愿谈及雕刻经石板繁杂的工



子所拥有的，或许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摄影/吕玲珑

艺，而这也正是我感兴趣的地方。据错花介绍，石材运回家中，首先要对片石逐一检查，大致分类，有些厚石头要剥开，大石头要打碎分零，再将石板一块块人工磨制光滑，然后再雕刻，雕刻好后的经石板，还要上彩漆，讲究的还要上金粉，如是，经石板的前期制作工序方告结束。信众定购好了经石板，还要经当地喇嘛念经加持后，方可堆放于松格嘛呢石经坛城中。“大的要刻五六天时间，小的也要用一天半的时间才能刻好。我和我的儿子们，一天最多也只能打一两块经石板。”谈及雕刻经石板所耗费的精力，错花的脸上再也没有讲述工艺流程时的那种自信与兴奋。

经龙真翻译，错花同意陪同我们一起去他家看看。在错花家门前的草地上，他13岁的儿子策郎与弟弟雀加坐在地上，两个幼小的孩子分别各自在雕刻着两块比他们身躯还要高大的片石板。我拿起相机刚想按快门，错花用当地牧区通行的牛场语叫了几声，策郎与雀加马上停止手边的工作。在我的眼前，雀加，这个刚满6岁的孩子，满面尘土，疲倦地靠在经石板上，表情痛苦，两眼迷茫，他双手五指间裹满了创可贴，厚厚的粉尘像在手上戴上了一双尘埃的手套。龙真一脸尴尬，偷偷用汉语对我说：“拍照要交10元钱。”当我再次举起相机时，雀加与他的哥哥，又继续低头不知疲倦雕刻起了石板板。当我想到，这位只有6岁的儿童，每天要刻打十多个小时的经石板，他的童年生活，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内容时，我的手颤抖了。在雀加正在雕刻的一块经石板上，刻有藏文的“扎西德勒”，字体苍劲而美丽，话语吉祥而喜气。在这个因极度贫困而没有孩子能上学的游牧民聚居点，草原另一面的真实却让我心中隐隐作痛。“游牧人家居无定所，80%的孩子都无法上学，很多孩子一天书都没有读过。”谈及此点，龙真一脸凝重。

面对雀加与他的经石板，我不由得想到一个问题：一块嘛呢石上所浓缩的那种文化积淀与宗教信念同一个6岁孩童的人生前途，到底孰重孰轻呢?

窗外，白云悠悠，苍山无语。哲人说，时光带来一切，时光又会解答一切。在巴格嘛呢石经墙与松格嘛呢石经坛城，我感受到时光的停滞，大地的永恒，而那个叫“雀加”的藏族小男孩的命运，在茫茫无边的时光之中，也在一块永远沉默的经石板上，若隐若现。□

责任编辑/刘霞　图片编辑/杨剑坤　版式设计/许丽娟

大清"照会门"别有玄机

撰文、供图/ 胡忠良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中国大地上曾涌现出许多新鲜的事物。比如"顽主"。

"顽主"们实际上都是一些天真可爱的行为艺术家。

那个时代，文娱界没有今天这样发达，"顽主"就是大腕。他们独领风骚，成为公众明星、时尚风向标，是所有青涩少年追逐的对象。那种追棒的疯狂热度，即使是今天的少男少女追星族都要相形见绌。

少年们对"顽主"的顶礼膜拜是全部无条件的。尤其是"顽主"们的一些标新立异的怪举，甚至陋习，会迅速成为"粉丝"们争相效仿的首选。

我住的大院里，出过一个远近闻名的"顽主"。这厮喜欢随地吐痰，但吐得很酷。呵咳、运痰、侧脸、咧嘴、喷射，所有动作自然连贯、一气呵成。尤其致命的是，那坨口腔粘液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弧线的同时，他的头还会很大器地甩两下。一切都像是教科书一样的标致而完美。我得承认，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么潇洒、酷毙的吐痰动作。

该"顽主"这一自选动作，无意中被人发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几乎一夜之间，人们惊奇地发现，所有走在街上的男孩都开始翻着白眼咧嘴吐痰。

"顽主"们不光行为炫酷，而且还创造了许多酷语。

比如双方"茬架"，必定要先扎膀横眼"吐个门户"，双方像斗鸡一样，互相对视一阵。先礼后兵，随后才开始发起进攻。

这一进攻前的礼仪，在"顽主"的酷词典里，叫"犯照"。

我曾经百思不解这个词的含义。以后还问过许多语词方面的专家，但说法莫衷一是。

一个很有意思的朋友，一次对我这样解释：这就等于两国交战，先下"照会"（战书），然后才动兵戈。

我敢打赌，这一定不能算作标准答案。但我个人以为：这是我遇到所有解释中最具魅力的。它使人联想翩翩。

纵观天下大事，大到两国交兵，小到小孩打架，都可用"犯照"来通释。

著名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先生在《灯前谈往》中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照会，妙不可言。全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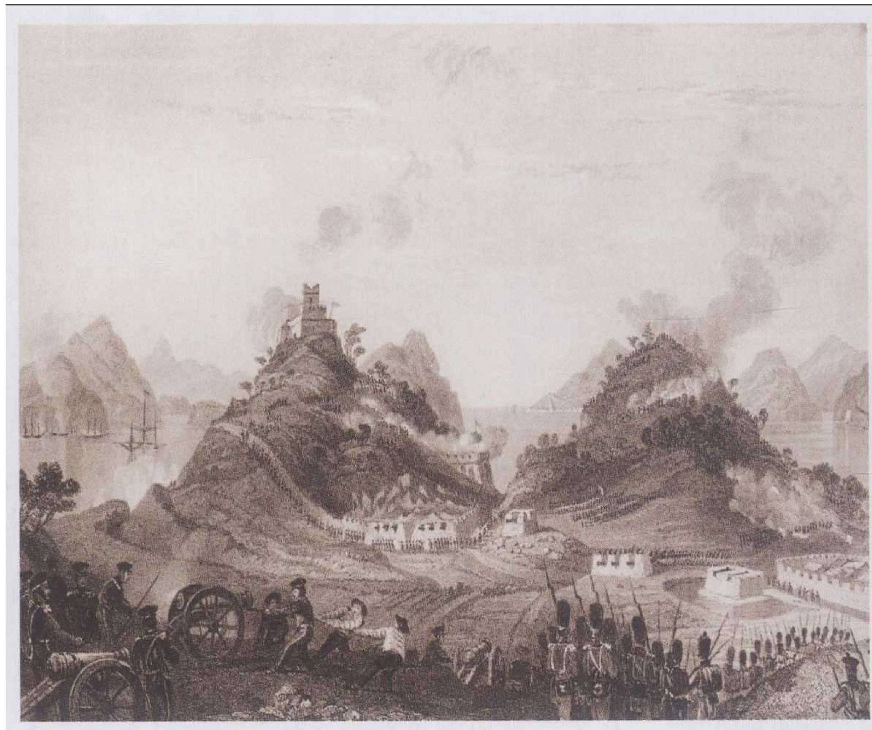
中国公文程式，向分等级，如函达，平行者；令，上致下者；呈，下致上者。又尚有札饬申请等等名词。"照会"二字，亦上级致下级之程式，清朝与外国交涉，公文不愿用函字，以其太平行也，用谕字、命字、令字等等，又恐不妥，斟酌再四，始用了"照会"二字。以为尊卑相称，颇为得体。不意你照会去了，外国乃按原样又照会回来。

当时大臣颇以此为辱，然亦无法，只好听之，此二字就用了这些年，遂成定式了。

按国际地位的高低，决不在此，而从前我国人最爱争此虚面子；近来国人的思想，是否仍有人有此毛病例？

齐如山先生所提的"照会"，应是1840年以后与西方各国打交道时发生的情况。然而，"照会"作为一种公务文书，出现得要更早。

"照会"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宋史·河渠志》载："元祐八年，张商英言：访闻先朝水官孙民先元祐六年贾种民各有河识，乞



上：鸦片战争后，照会成为清朝外交文书的主要形式。图为英国画家绘制的虎门鸦片战争交战时的情景。

取索照会。”这是“照会”二字的初见，有会同照阅的意思，而还不是文书的名称。

“照会”作为文书名称，始于明代。当时用于上级给下级的下行公文。清代沿用明代制度，但使用范围略有变动。通常用于上级机关下发给非直属的下级机关。比如地方军事官员提督发文给下级文职官员司道等职，就要用墨笔“照会”。后来到了清末，制度也不严格了，有些平行官衙间也用照会。

从现存的清宫档案来看，“照会”被作为正式外交文书。最迟在乾隆年间就已出现并定型了。当时主要用于对清朝的藩属国。

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三年（1788），安南内乱，黎、阮两姓争夺王位。阮氏得势，并争取到了清政府的承认。乾隆册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乾隆五十四年（1789），云南总督福康安曾发给安南新国王一份照会。照会中提到：

国王（阮光平）以西山布衣宠膺、永列藩封，光荣已极。不胜代为欣幸。前因国王未受封号，是以俱用檄文，以尔汝相称。今国王已经受封，是本爵阁部堂与国王同为天朝臣子，与藩王一体，嗣后改用照会，不复为尔汝之称。

安南国，是清朝的常在藩属国中“朝贡七国”之一。

福康安对安南国王使用“照会”，是大清朝廷的公文规矩。实际上，此时的“照会”还是多少有降尊下行的意思。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对于通商各国，以“天朝自居”，致外国的文书，多用敕谕或旨，外国使臣对清朝皇帝上书，要用奏折。那时，清朝与外国的往来文书，并不具有明显的外交文书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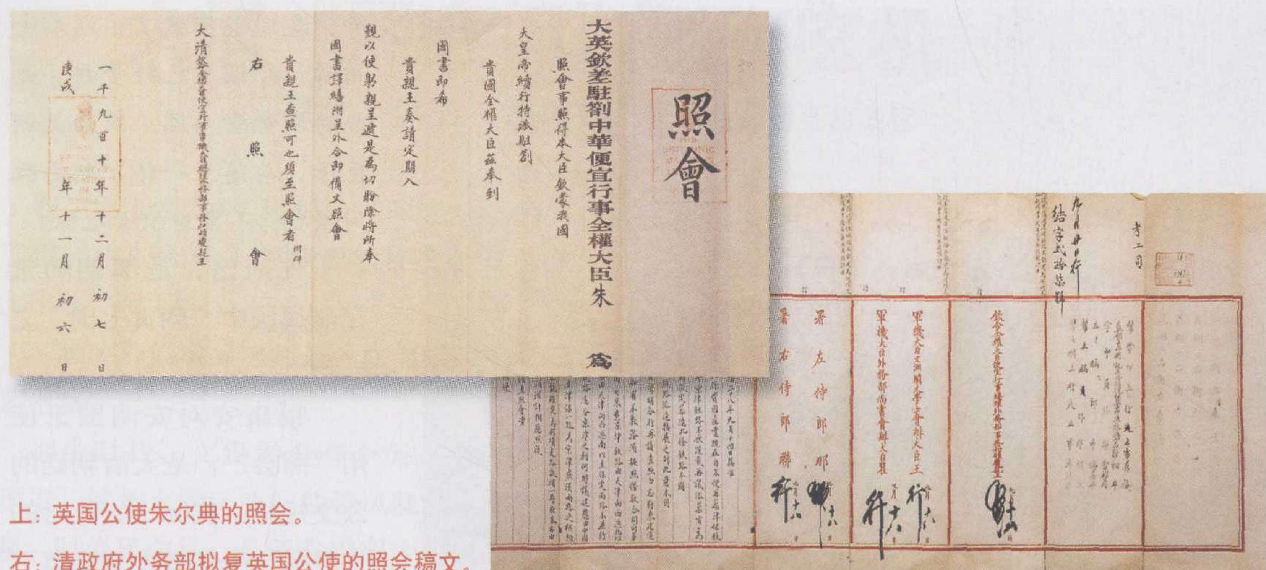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朝外交文书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南京条约》第十一款议定：“英国驻中国之总管大员，与中国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往来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此后，照会日渐成为外交文书的主要形式。

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款第一条规定：

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此次定约，汉、英文书详细较对无讹，亦照此例。

在此以前，清朝与外国的照会主要以汉文为主，至此，汉文沦落为外文的副本。

外交照会的翻译是个政治性很强的工作。



上：英国公使朱尔典的照会。
右：清政府外务部拟复英国公使的照会稿文。

鸦片战争前后，曾出现过由于当时中外译员水平不高，造成了因照会翻译不准，致使中外误解，酿成外交冲突的情形。著名者，如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因之一的“照会门”事件。

1840年8月，英国侵略军全权代表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nt）率领英船北上到达天津白河。8月15日，道光皇帝批准千总白含章登上英舰接收了英国外交大臣的一份照会。这份照会的中文文本，是查尔斯·义律的随身翻译马儒翰翻译的。这个老外当时在所有西洋人中中文算是最好的。但翻译还是很糟糕。

比如照会名称他翻译成了《巴尊麦子爵致大清皇帝钦命宰相书》，要知道，清朝是没有设宰相一职的。更严重的是，该照会内容翻译上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照会原文中第一段，说明英船此来的目的是为了向中国皇帝“要求赔偿与匡正”。而马儒翰却翻译成了“要求向皇帝昭雪伸冤”。

道光皇帝读到此照会，认为英军此来，是为了伸冤，就指示派人到广州，当着英国人的面惩罚一下叫英人受气的人就行了。而谈判中，英国人却声明不是为了报复林则徐而来的。中方抓住汉文照会上头一条就白纸黑字写着“昭雪伸冤”，认为这样办大方向是不错的。

英国人回到广州后，发觉清政府与原先在大沽答应的条件不一样。中方只答应处罚中方犯事人员，而不提赔偿。而查尔斯·义律则认为中方出尔反尔，不讲道理，没有按照照会上所提的进行赔偿，是不讲道理的。而清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琦善则认为英国人以“昭雪伸冤”为名，而提出赔偿，是贪得无厌。双方相持不下，而且英方咄咄逼人。中方不耐烦起来，认为英人气焰嚣张，“若不乘机痛剿，何以示国威而除后患？”于是道光皇帝的态度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对英的政策也从“抚”转变为“剿”。以致后来发生了鸦片战争。

这其中的奥秘，直到上个世纪中叶，学者们比较中英照会原档才揭示出来。原来是马儒翰翻译出了错。将英文照会中"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补偿”、“赔偿”），在汉文“照会”中翻译成了“昭雪”、“伸冤”。导致了英国人据英文照会，中国人按中文照会，双方各执一词，发生冲突而酿致战争。

甚至有人说，如果没有发生这次“照会门”事件，中国近代史也许会重写。

“犯照”看来绝对是个很严重的事情。□

责任编辑/杨飞龙　图片编辑/何亮　版式设计/杨东海